

中国高校编辑出版质量优秀科技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源刊
科学引文数据库(SCD)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N)网络首发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S CI-TECH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年 第42卷 第4期

Vol.42, No.4 Aug 2019

中国·杭州 HANGZHOU, CHINA



ISSN 1673-3851
CN 33-1338/TS

目次

经济与管理

- 全球价值链嵌入、研发强度与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 叶莉莉,杨君(329)
- 创业团队异质性地对机会识别的影响
- 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 杨隽萍,包诗芸,陈佩佩,许多(337)
-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洪子又,朱伟明(344)
-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城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影响因素分析
- 以杭州市为例 陆维特,朱国旺,倪训友,张春勤(352)

语言与传播

- 当代汉语新词语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的范畴化 赵艳梅(360)
- 回归假说下英语专业学生词汇磨蚀的实证研究 吴蓓蓓,刘蕴(368)
- 赤青黑白的文学世界
- 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的色彩研究 张萍(375)
- 众筹模式下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机制研究 徐丹,陈雪颂(382)

历史与文化

-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张洁(389)
- 从“平民文学”到“底层文学”的反思与追问 范家进,金丽娜(398)
- “一带一路”视角下白俄罗斯绿色发展方式及其借鉴意义 周光迅,高伟(406)

艺术与设计

- 中国园林造园理念的源流与发展 袁梦,俞楠欣,陈波,卢山(414)
- 基于体型和身体满意度的年轻女性连衣裙偏好分析 孟利云,何璜(423)

高教研究

- 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 龚素璪,张祖品,岑俊静,许丽芬,张孝凤(430)
- 结合电子设计竞赛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 杨俊秀,姚青,赵文来,张寅孩,周高峰(436)

Content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R&D intens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upply qual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YE Lili, YANG Jun(329)
-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heterogeneity o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ocial network
..... YANG Junping, BAO Shiyun, CHEN Peiei, XU Duo(337)
-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raftsman spirit value
..... HONG Ziyou, ZHU Weiming(344)
- Influential factor analysis of urban parking space use by the disabled based o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LU Weite, ZHU Guowang, NI Xunyou, ZHANG Chunqin(352)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 Categorization of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in modern Chinese
..... ZHAO Yanmei(360)
- An empirical study on lexical attrition of English majors under the Regression Hypothesis ... WU Beibei, LIU Yun(368)
- Literary world mixed with the color of red, cyan, black and white: Color study on Tanizaki Junichiro's literary works
..... ZHANG Ping(375)
- Research of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animation image symbols in crowdfunding mode
..... XU Dan, CHEN Xuesong(382)

History and Culture

- Research review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ZHANG Jie(389)
- Reflection and questioning from "civilian literature" to "lower-class literature" FAN Jiajin, JIN Lina(398)
- Green development mode of Belaru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lt and Road" and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 ZHOU Guangxun, GAO Wei(406)

Art and Design

-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 gardening concept ... YUAN Meng, YU Nanxin, CHEN Bo, LU Shan(414)
- Analysis of young women's dress preference based on somatotype and body satisfaction
..... MENG Liyun, HE Ying(423)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in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 GONG Suli, ZHANG Zuping, CEN Junjing, XU Lifan, ZHANG Xiaofeng(430)
-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based on National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s Design Contest ... YANG Junxiu, YAO Qing, ZHAO Wenlai, ZHANG Yin Hai, ZHOU Gaofeng(436)



全球价值链嵌入、研发强度与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

叶莉莉, 杨 君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利用省级层面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进行了测度, 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在研发强度的影响下, 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作用机制。主要的研究结论有: 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东降西升”和“单核集聚”的特征; 研发强度不足时, 全球价值链嵌入易导致企业陷入“低端锁定”陷阱与“资金和市场双重缺乏”困境, 不利于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 随着研发强度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收益终会超过“嵌入成本”, 进而促进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 且研发强度越强, 该促进作用越明显。研究结果可为中国突破产能过剩约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研发强度; 供给质量; 制造业; 产能过剩; 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29-08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R&D intens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upply qual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YE Lili, YANG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easures levels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data of China,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on manufacturing supply qua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D strength using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east is high while west is low, east is dropping while west is growing and single core agglomeration ar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when research strength is insufficient,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leads enterprises into the trap of "low-end locking" and the dilemma of "dual deficient of capital and market", which is not in favor of the promotion of manufacturing quality of supply;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will benefit more than the "embedded cost"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R&D, so it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upply, and the more R&D are input, the more obvious the promoting role becomes.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China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overcapacity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edness; R&D intensity; supply qualit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vercapacit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生产是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活力。但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不仅使得贸易摩擦与争端频发,还使得中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这不符合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更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蔓延导致的全球性需求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已有所抬头,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与摩擦。因此,如何在海外需求层次变迁和技术标准升级的背景下倒逼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将成为企业突破当前出口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那么,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制造业供给质量是否获得了提升呢?其提升的机制和障碍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科学地测度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并分析其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机制,以期为中国突破产能过剩约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文献综述

Kougt^[1]较早地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研究,而Gereffi^[2]则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链体系研究,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测算方法^[3]和驱动因素^[4-5]也进行了研究。随着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如何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则成了当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由于出口学习效应^[6-7]和技术外溢效应^[8]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加工贸易,便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的零部件、生产设备或学习模仿机会,进而实现产品质量提升^[9]。另外,参与全球价值链,还可以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而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10]。部分实证研究也显示,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升^[11]。吕越等^[12]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积极作用存在着时间差异,在嵌入初期最为明显,后期则可能出现不利影响。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已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发达国家占领制造行业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低端环节又被新兴起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替代^[13],面临“标兵渐远,追兵将至”的窘境,通过全球价值嵌入提升制造业质

量已变得越发困难。当前,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仍处于低位^[14],且在低技术制造业的分工地位显著高于中高技术制造业^[15],面临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16]。嵌入全球价值链低增值环节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17]。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从事组装加工等活动^[18],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代工体系的低端阶段被发达国家“俘获”,无法进行高端化的产业升级^[10]。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仍严重依赖要素投入,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全球价值嵌入过程中多处于加工组装环节^[19],因此极易陷入“低端锁定”陷阱。王玉燕等^[20]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进步呈倒U型关系的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说明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着抑制效应。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如果不尽快提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中国制造业将在全球竞争中丧失优势。除制造业外,郭晶等^[21]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对高端服务业的控制,中国服务业已处于低端锁定的格局。

现阶段,如何破解上述困境已成了学界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一旦损害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便会遭受封锁与抑制的命运^[20]。如果嵌入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则会在低端阶段被发达国家俘获^[10],供给质量提升也变得遥遥无期。如果企业能够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则有可能突破发达国家的封锁,进而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供给质量的提升,而提升技术水平的关键则是加大研发投入,如吴延兵^[22]的研究就表明了制造业研发投入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大研发投入能够减轻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后发国家的不利影响,并在后期呈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23]。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一是促进作用。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生产设备的引进与先进技术的学习来提高生产工艺,进而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另外,本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外产品丰富本国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供给,提高制造业供给的多样性。二是抑制作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工序,极易被发达国家“俘获”而陷入低端发展困境,进而不利于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长远来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还应与本国自主创新相结合,才能突

破低端技术锁定,真正实现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因此,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时期以及嵌入国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均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因此,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升制造业质量的关键仍是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创新^[24]。未来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制造业质量,仍需提高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18]。已有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有着重要影响^[25],因此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研究,应考虑研发投入这一重要因素。但已有研究鲜有涉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也未从实证层面探索研发投入在上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机制进行研究,并分析研发投入强度对上述机制的影响机理,进而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二、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测度

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可使用出口贸易中国外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值来表示^[26],而出口贸易又可以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因此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测度需根据贸易形式进行区分。本文借鉴唐东波^[27]的研究,假定加工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全都用于出口,而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价值则被均匀地分配到出口生产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中,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GVC = \frac{M_2 + M_1 X_1 / (Y_1 - X_2)}{X_1 + X_2} \quad (1)$$

其中: M_1 为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价值, M_2 表示加工贸易中进口中间品的价值, X_1 和 X_2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价值, Y_1 表示行业总产值。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由于部分省市的数据缺失,本文仅测度了2005—2014年中国24个省(直辖市)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①,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结合图1,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且地区间变动的差异明显。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可能与中国不同区域的制造业外向发展程度有关。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跨国公司密度大,全球化生产程度高,产品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国外进口的中间品,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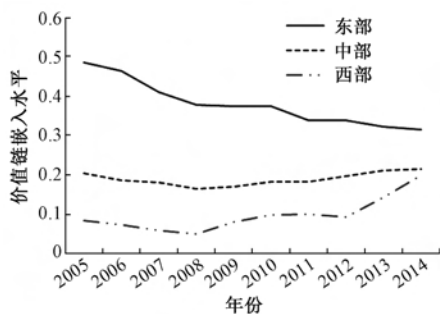


图1 2005—2014年中国各区域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

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则因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参与全球化生产程度不高,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较低。

从变动趋势上看,2005—2014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呈现出“东降西升”的特征。东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从2005年的0.486下降到2014年的0.314;中部地区相对较为平稳,基本在0.2上下波动;西部地区则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0.085上升到2014年的0.2。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加工贸易的占比逐年下降;另一方面,东部地区通过全球化生产进行模仿与学习,提高了其技术水平,对外部产品和技术的依赖逐渐下降,出口产品中的国内价值占比不断提升。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大量加工贸易企业也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上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还呈现出“单核集聚”特征。根据图1东、中、西部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数值变化可以发现,中国三大区域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差异在逐渐下降,进一步使用Kernel密度分析法也显示出这一变化趋势。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Kernel密度图(见图2)均呈现出单顶点均衡的特征,这说明中国省市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呈单核集聚状态,即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呈现出趋同特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间差异在减少。

① 由于上海、海南、内蒙古、云南、四川、贵州和西藏的数据缺失,本文没有对这些省市进行测度,另香港、澳门和台湾也不包含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之内。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广东;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吉林和山西;西部地区包括:甘肃、广西、宁夏、青海、重庆、陕西和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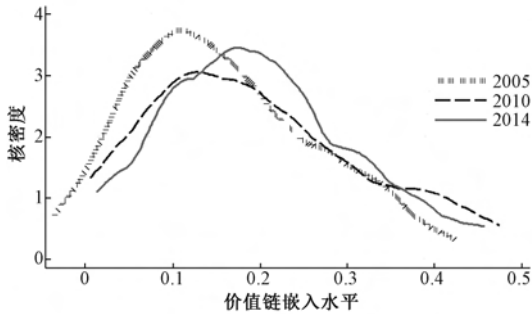


图2 部分年份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 Kernel 密度图

三、实证分析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因此制造业供给质量为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嵌入为核心解释变量。结合前文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可能还存在着研发强度门槛,因此研发强度为门槛变量。另外,本文还结合已有研究选择五个对制造业供给质量存在一定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及数据来源如下:

a) 制造业供给质量(Q)。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从质量水平与发展能力两个方面构建过测度中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数能够较好地衡量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技术与市场适用能力等特征,因此本文使用该指数作为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代理变量。

b) 研发强度(R)。提高研发能力是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大收益的关键所在^[18],因此在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影响时,还需考虑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本文使用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作为研发强度的代理变量。

c) 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带来更高层次和结构多样化的产品需求,进而倒逼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本文使用各省市人均 GDP 数据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并以 2005 年价为基期,根据 GDP 平减指数对数据进行平减处理。

d) 利用外资水平(FDI)。利用外资对国内厂商存在着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两种效应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存在着相反的影响,因此利用外资的水平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也因两种效应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结果。本文使用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与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的比值衡量利用外资水平。

e) 开放程度(T)。与利用外资的效应较为类似,开放程度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也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本文使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衡量开发程度。

f) 人力资本水平(HUM)。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增长能够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增长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资本利用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都是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本文参考杨君等^[28]的做法,使用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g) 专利数量(PA)。专利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品的创新程度,因此专利数量的增长可能促进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该指标使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项)衡量。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上数据库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	240	81.74	3.92	71.74	91.22
GVC	240	0.22	0.19	0.003	0.93
GDP	240	2.74	1.54	0.76	8.89
T	240	0.33	0.38	0.04	1.70
FDI	240	0.16	0.12	0.01	0.53
HUM	240	14.79	0.74	12.54	16.00
PA	240	9.02	1.56	4.37	12.51
R	240	1.43	1.05	0.25	6.08

(二) 门槛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受研发强度的影响,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为了探寻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形态,以及门槛值的大小,本文选择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为了确保样本区间划分的合理性并减少模型估计偏误,本文借鉴 Hansen 的面板门槛模型^[29],根据样本数据的自身特点寻找门槛值,进而建立门槛效应模型。以研发强度作为门槛值,单一门槛的实证模型可设定如下:

$$Q_{it} = \mu_i + \beta_1 GVC_{it} (R_{it} \leq \gamma) + \beta_2 GVC_{it} (R_{it} > \gamma) + \beta' X_{it} + \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μ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 β_1 、 β_2 和 β' 为待估计系数, γ 为待估计的门槛值, X_{it} 为控制变量, ϵ 为随机干扰项,公式中括号内变量表示条件关系,下同。类似地,建立双门槛、三门槛等 n 个门槛的实证模型,具体如下:

$$Q_{it} = \mu_i + \beta_1 GVC_{it} (R_{it} \leq \gamma_1) + \beta_2 GVC_{it} (\gamma_1 < R_{it} \leq \gamma_2) + \dots + \beta_{n+1} GVC_{it} (\gamma_n < R_{it})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因此,合理确定门槛值的数量是建立实证模型的前提,本文使用 Hansen“自抽样法”模拟似然比统计量的渐近分布^[29],并结合 P 值判断门槛值的数量,表 2 报告了不同门限检验类型的 F 统计量和采用自抽样法计算出的 P 值,三种门槛均在 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认为存在三个门槛值。

表 2 门槛数量检验

门槛数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单一门槛	67.42***	0.00	2.52	3.82	5.99
双门槛	29.05***	0.00	-6.80	-3.51	2.44
三门槛	8.32***	0.00	2.45	3.90	7.2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确定门槛数量后,还需依据似然比检验统计量为零时 γ 的取值,以确定门槛值的大小。表 3 报告了研发强度的三个门槛值及其 95% 置信区间,三个门槛值分别为 0.67, 1.06 和 1.67。

表 3 门槛估计值

门槛值	95% 置信区间
0.67	[0.28, 0.84]
1.06	[1.00, 1.17]
1.67	[1.51, 1.95]

据此,本文以研发强度为门槛值构造三门槛效应模型为:

$$Q_{it} = \mu_i + \beta_1 GVC_{it} (R_{it} \leq 0.67) + \beta_2 GVC_{it} (0.67 < R_{it} \leq 1.06) + \beta_3 GVC_{it} (1.06 < R_{it} \leq 1.67) + \beta_3 GVC_{it} (1.67 < R_{it})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以式(4)作为本文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并使用 STATA14 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OLS 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
GDP	1.32**	0.55	0.59
T	3.71	2.84	2.58
FDI	9.48	9.59	9.17
HUM	-2.25**	1.15	1.16
PA	-0.36	0.54	0.56
$GVC(R \leq 0.67)$	-6.19*	3.75	3.77
$GVC(0.67 < R \leq 1.06)$	-0.53	3.32	3.17
$GVC(1.06 < R \leq 1.67)$	6.67**	3.23	3.36
$GVC(1.67 < R)$	20.34***	3.47	3.09

当 $R \leq \lambda_1$ 时, GVC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供给质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在研发投入较低的情况下 ($R \leq \lambda_1$),国内制造业企业技术积累不足,主要偏向于从事加工贸易,在面对发达国家阻碍和控制其代工生产体系升级时^[10],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不利于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另外,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升,也使得国内大量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而国内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低^[20],技术研发短板导致国内制造业市场不断被蚕食,容易陷入市场和资金双重缺乏的困境,供给质量提升困难重重。全球价值链嵌入还存在“嵌入成本”^[30],如果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够高,嵌入的收益无法抵消嵌入成本,则有可能导致生产效率的损失和供给质量的下降。

当研发投入越过第一个门槛值但小于第二个门槛值 ($\lambda_1 < R \leq \lambda_2$) 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回归系数变的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研发投入的提升,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也在逐步积累,部分企业开始转型从事一般贸易,因此制造业质量出现了提升。但此时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仍相对较低,缺乏与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贸易方面竞争的能力与经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收益与不利影响大致相当,因此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不明显。

当研发投入越过第二个门槛值 ($R > \lambda_2$) 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随着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增加,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开始增长,能够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或捕获,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促进了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这也验证了技术研发对获取 GVC 福利的重要性^[31]。另外,技术型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有较强的“学习效应”^[12],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增加,除了有助于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外,还增强了企业学习、模仿国外先进产品的能力,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当 $R > \lambda_3$ 时, GVC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但系数比前一阶段更大,这也说明制造业研发投入越高,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质量提升越明显。

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 GDP 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

提升^[32],因此能够提高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人力资本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相反。一般地,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先进技术的流入^[28],且人力资本提升更容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出现,进而带来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而造成人力资本在中国出现负向影响的可能原因有:一是中国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流向人力资本充裕的地区,而是在区域“引资竞争”的影响下,流向了“政策优惠”区域^[33],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受此影响而无法充分发挥;二是本文使用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这一变量是基于受教育程度层面反映人力资本水平,而中国大学扩招可能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28,33],进而使得人力资本对制造业供给质量产生了负向影响。开放程度和利用外资水平的回归结果均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已无法提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中国已经度过了资本相对缺乏的阶段,现阶段制造行业外向发展的重点是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单纯的资本扩张已无法满足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需要。专利数量的回归结果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专利授权量虽然增长快速,但专利的质量较低,特别是许多重要的核心专

利技术仍有待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打破发达国家技术的封锁和限制。

(四)分地区回归结果

前文分析显示,当研发强度大于1.06时,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转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可以有如下推论:在高研发地区(研发强度大于1.06),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质量有着正向影响;在低研发地区(研发强度小于1.06),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当研发强度小于0.67时,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质量的影响为负,由于只有新疆、青海和广西三个省份部分年度的研发强度小于0.67,所以本文将其归入研发强度小于1.06的组别进行回归检验。

本根据各省份2005—2014年研发强度的平均值将样本分为高研发组和低研发组(见表5),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如果检验结果符合上述推论,则表明门槛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差分GMM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位系统GMM回归结果。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高研发地区,价值链嵌入促进了制造业质量的提升,在低研发地区,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符合上述研究推论,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按研发强度的分组结果

年份	研发强度 $R \leq 1.06$	研发强度 $R > 1.06$
2014年	河北、吉林、江西、广西、宁夏、青海、新疆	
2010年	河北、河南、吉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宁夏、青海、新疆	
2005年	河北、山东、广东、福建、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南、吉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宁夏、青海、新疆、重庆	其他省份
2005—2014年	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江西、山西、甘肃、广西、宁夏、青海、新疆	

表6 分地区的回归结果

变量	高研发组				低研发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GVC	5.95***	8.42**	3.15*	5.15**	-1.55	-1.58	-1.72	-7.33
T		-3.69***		0.58		-0.95		-0.36
HUM		3.02***		2.99*		2.06***		2.40*
常数项			9.22***	8.79			13.41***	5.05
OBS	104	117	117	117	104	104	117	117
AR(2)	0.52	0.54	0.58	0.59	0.64	0.72	0.65	0.81
Sargan	0.99	0.53	0.63	0.97	0.34	0.10	0.26	0.46

注:根据门槛效应计量结果,分地区回归剔除了GDP、PA和T三个不显著控制变量。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部分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加入价值链嵌入与研发强度的交叉项

存在研发强度约束时,检验GVC与制造业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可以在回归分析中加入GVC与研发强度的交叉项,通过对交叉项系数的分析检验上述门槛模型的稳健性。表7为加入交叉项后的工具面板方法回归结果。

表 7 加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GVC</i>	11.23***	-1.69	10.17**	-4.03
<i>GVC</i> × <i>R</i>		5.93***		5.84***
<i>GDP</i>			1.52**	1.21*
<i>T</i>			1.56	3.90
<i>FDI</i>			15.37	12.43
<i>HUM</i>			-3.45*	-1.99
<i>PA</i>			-0.15	-0.21
常数项	79.34***	80.45***	124.64***	105.57***
<i>OBS</i>	216	216	216	216
<i>R</i> ²	0.05	0.26	0.08	0.28
<i>F</i> 值	5.21***	3.76***	4.40***	3.39***

表 5 中的模型 1 和模型 3 为未加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此时 *GVC*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在不考虑研发投入时,*GVC* 促进了制造业质量的提升。模型 2 和 4 是加入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此时交叉项回归系数均为正,*GVC* 的系数可分别表示为 $(-1.69 + 5.93R)$ 和 $(-4.03 + 5.84R)$,该结果说明,当研发投入水平较低时,*GVC* 对制造业质量提升有负向影响;随着研发水平的提升,当突破第二个阈值后,*GVC* 对制造业质量便呈现出正向作用,且随着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GVC* 对制造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其他控制了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二)加入价值链嵌入的二次项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GVC* 对制造业质量的影响方向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比较符合 U 型非线性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 U 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考虑到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加入 *GVC* 的二次项并使用 GMM 方法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是差分 GMM 回归结果,模型 3 和模型 4 是系统 GMM 回归结果。根据表 8 可知,*GVC* 的回归系数为负,*GVC* 二次项回归系数为正,即 *GVC* 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初期不利于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升,后期则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文 U 型非线性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上文结果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05—2014 年数据,对中国省级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进行了实证测度,并以研发强

表 8 加入 *GVC* 二次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GVC</i>	-19.75***	-11.59	-20.83**	-17.01
<i>GVC</i> ²	27.02**	32.39***	28.45**	38.86*
<i>GDP</i>		0.63		-0.86
<i>T</i>		-0.79		-9.89*
<i>FDI</i>		-3.34		2.21
<i>HUM</i>		-8.53***		-5.08*
<i>PA</i>		1.89		1.94
常数项			77.00***	109.58***
<i>OBS</i>	192	192	216	216
<i>AR</i> (2)	0.18	0.50	0.25	0.10
<i>Sargan</i>	0.16	0.16	0.49	0.35

度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与启示有:

a)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东高西低”、“东降西升”与“单核集聚”的特征明显。中国区域制造业开放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部地区呈现依次递减趋势,因此对不同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造成了不同影响。从变动趋势上看,则呈现出“东降西升”特征,东部地区在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则在缓慢上升,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Kernel 密度分析也显示出明显的单核集聚特征,即大部分省市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在逐渐趋同。

b)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呈 U 型。在研发强度较低时,国内制造业的技术积累不足,多偏向于从事加工贸易,容易陷入“低端锁定”陷阱与“市场、资金双重缺乏”困境,因此供给质量提升困难重重。随着研发强度的提高,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抵消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不利影响,且技术实力的积累还为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或俘获打下了坚实基础,因而有利于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另外,技术型企业还有着较强的“学习效应”,研发强度越高,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c)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出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各地仍存在的“政策寻求型”投资和教育质量下降。人均 *GDP* 对制造业供给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程度、利用外资水平和专利数量均没有显著影响。目前中国已度过资本匮乏阶段,如何提高对外开放和引资的质量显得更为重要。另外,制造业企业只有不断提升专利技术的质量,特别是核心专利技术的研发,才能带来供给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Koug B.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5, 26(4): 15-28.
- [2] Gereffi G A. 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Global Industries[R]. Sussex: IDS Working Paper, 1999.
- [3] Humphrey J, Schmitz H.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IDS Bulletin, 2001, 32(3): 19-29.
- [4] Henderson J. Danger and opportunity in the Asia-Pacific [C]//Thompson G. Economic Dynam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1998: 356-384.
- [5] 张辉.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147.
- [6] Loecker J D. Do exports generate highe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Sloveni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3(1): 69-98.
- [7] 范剑勇,冯猛. 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之谜[J].管理世界, 2013(8):16-29.
- [8] 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605-627.
- [9] 刘维林,李兰冰,刘玉海.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 2014(6):83-95.
- [10] 刘志彪,张杰. 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 基于 GVC 与 NVC 的比较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5): 39-47.
- [11] 胡昭玲.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工业经济, 2007(9): 38-45.
- [12] 吕越,吕云龙. 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吗: 基于双重稳健-倾向得分加权估计[J]. 财经经济, 2016, 37(3): 109-122.
- [13] 尹彦罡,李晓华.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5(11):18-26.
- [14] 周升起,兰珍先,付华.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 基于 Koopman 等的“GVC 地位指数”[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2): 3-12.
- [15] 胡昭玲,宋佳. 基于出口价格的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3(3):15-25.
- [16] 吕越,罗伟,刘斌. 异质性企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基于效率和融资的视角[J]. 世界经济, 2015, 38(8): 29-55.
- [17] 王岚,李宏艳.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 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2): 76-88.
- [18]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17-1027.
- [19] 张少军,李东方. 生产非一体化与能源利用效率: 来自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2): 66-75.
- [20] 王玉燕,林汉川,吕臣.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技术进步效应: 来自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9): 65-77.
- [21] 郭晶,刘菲菲. 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重新估算: 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2): 52-60.
- [22] 吴延兵. 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 R&D: 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 2007, 24(5): 67-75.
- [23] 王岚.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 2014, 31(5): 17-23.
- [24] 姚洋,张晔. 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 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2): 67-82.
- [25] 周彩红. 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制造业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09(7): 163-171.
- [26] 刘胜,顾乃华,陈秀英. 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2016(3): 96-104.
- [27] 唐东波. 贸易开放、垂直专业化与产业升级[J].世界经济, 2013, 36(4): 47-68.
- [28] 杨君,肖明月. 价值链低端生产是否限制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GMM 方法[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6): 53-62.
- [29] 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2): 345-368.
- [30]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1695-1725.
- [31] Baldwin J, Yan B.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firms [R]. Ottawa: EA Working Paper, 2014, No.90.
- [32] 苏庆义,高凌云.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演进规律[J].统计研究, 2015, 32(12): 38-45.
- [33] 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 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2008(5):33-46.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机会识别的影响

—— 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

杨隽萍, 包诗芸, 陈佩佩, 许 多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整合高阶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 构建了创业团队异质性、社会网络与机会识别关系的理论模型, 并利用 481 家新创企业的调研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与内部异质性对新创企业的机会识别和社会网络构建均具有积极影响; 企业社会网络联系与中心性能够正向影响机会识别, 且在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机会识别二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拓展了高阶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应用, 同时也为新创企业如何提升机会识别效果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 机会识别; 创业团队异质性; 企业社会网络; 新创企业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37-07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heterogeneity o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ocial network

YANG Junping, BAO Shiyun, CHEN Peipei, XU Du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trepreneurial team heterogeneity, social network an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wa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upper echelon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the survey data from 481 new ventures were used for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ternal heterogeneity and inter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team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social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new ventures. The social network contact and network centralit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also play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team heterogeneity an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The research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upper echelon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theory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offers new ventures some advice on how to enhance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effect.

Key words: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entrepreneurial team heterogeneity;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new venture

机会识别是创业活动的起点, 亦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识别机会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绩效, 关系着企业未来的发展。其中, 机会是指创业主体探寻到的潜在价值^[1], 机会识别则是对该潜在价值进行挖掘的过程。在机会识别过程中, 高阶理论认为,

创业主体的团队异质性会对机会识别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较高的异质性意味着团队成员的认知基础存在较大差异^[2], 这使得创业团队能够获取不同成员收集的异质性信息^[3], 进而为企业识别新机会提供基础。然而目前关于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机会识别的

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以往学者更多考察团队异质性和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4-5],忽视了其与企业具体经营行为的作用关系。

同样,创业团队也是企业机会识别的战略决策者,团队异质性对企业识别机会也会产生显著影响^[6]。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结构特征的创业团队与机会识别的关系,从而为企业识别潜在机会提供理论指导。此外,创业团队的结构特征也往往决定着企业资源的获取和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进而影响机会识别的效果。

鉴于此,本文整合高阶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探究创业团队的异质性对新创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并剖析企业社会网络联系与中心性特征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以期为企业团队的组建以及企业网络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机会识别

创业团队异质性,是指创业团队成员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认知观、价值观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7]。异质性按特征是否易于观测,可分为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8]。其中,外部异质性指创业团队成员在年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内部异质性则主要表现为价值观、信念等心理方面的差异。

高阶理论认为,成员间的异质性提升了团队的认知基础,从而有助于团队在识别新机会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见解。从外部异质性来看,性别的差异使得团队成员能够从不同市场需求考虑潜在商机^[9],年龄的差异使得企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又能吸收年轻人独特的创新力,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机会识别。此外,团队成员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知识经验和经验差异,使得企业在识别潜在商机时拥有丰富的知识存量。基于图式理论,当团队拥有高经验的异质性时,意味着其储存的图式越多,有效信息的集聚越迅速^[10],企业因此能够大大提升机会识别的概率。

从团队的内部异质性来看,团队成员在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等方面的差异也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进行机会识别。一方面,内部的异质性避免了思维的固化^[11],同时又提高了团队整体认知结构的复杂度,解决了企业机会识别过程中“面不够宽”的问题。另一方面,机会识别的过程也是团队成员认知冲突的过程,认知冲突导致团队成员为此进行争辩和商讨,

使得信息的交流以及思想碰撞更为有效^[12],这也利于企业识别出较佳的商业机会。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与企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假设 1b: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与企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二)创业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社会网络

企业社会网络是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其他企业、银行、政府机构等个体或组织之间在交易、资源互换等一系列行为过程中所建立的关系的集合^[13]。高阶理论认为,企业社会网络构建会受到其创业团队异质性特征的影响。从外部异质性看,团队成员知识结构、工作经验、专长背景等方面的较大差异拓宽了企业网络的覆盖面^[14],促使企业能够与更多的组织来往,吸收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认可^[15],这不仅有助于加强社会网络主体间的联系,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从内部异质性看,由于价值观、偏好、信念等差异,团队成员对从网络中获取的信息也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见解^[16]。为了调和团队成员可能存在的不同意见,高异质性的团队主动与外部多元化组织联系,从而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也正是由于内部异质性的存在,新创企业能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市场行情,发掘更多的潜在价值来驱动创业者积极地进行价值创造^[17],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与网络联系正相关。

假设 2b: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与网络中心性水平正相关。

假设 2c: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与网络联系正相关。

假设 2d: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与网络中心性水平正相关。

(三)企业社会网络与机会识别

社会网络是新创企业进行机会识别的重要渠道^[18],网络联系和网络中心性是衡量企业社会网络的重要指标^[19]。

网络联系反映的是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联系的频繁、密切以及相互信任的程度^[20]。企业通过建立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有助于提升机会识别的效果:一方面,网络联系扩大了企业的信息来源^[21],提高了企业掌握市场动态的准确性,进而有利于企业快

速识别潜在商机；另一方面，通过网络联系也易使企业间形成信任互惠的关系，继而保证了获取信息的质量，提升了机会识别的效果。

网络中心性则是指企业处于社会网络中心的程度，反映了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对资源获取和控制的程度^[22]。企业在网络中心的位置对于机会识别至关重要：其一，较高的网络中心性水平意味着企业可通过较短的路径获取较有价值的资源，在降低搜索成本的同时又能提高获取信息的速率^[23]；其二，处于较高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能收获更高质量的信息资源^[24]，从而利于提升机会识别的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网络联系与企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假设 3b：网络中心性水平与企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四) 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

高阶理论认为，创业团队作为新创企业的高管，其特征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具有过程性^[25]。高异质性的创业团队能够给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获取途径^[26]，增加了企业社会网络的宽度和复杂度，从而有效提升了机会识别的效果。

从网络联系特征看，一方面，团队成员工作背景、知识结构等外部差异使得企业能够与不同的外界主体进行交流，继而形成多样化的网络联系，利于企业快速了解市场变化^[27]，知晓顾客需求^[28]，进而提升机会识别概率。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观等内部异质性，团队成员对信息的关注点以及对问题的认知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分歧会导致团队成员们不得不与更多的外界主体沟通，以获取更多有效的信息，调和团队内部的矛盾，进一步丰富企业的社会网络联系，从而为识别新机会奠定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a：网络联系中介了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与机会识别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 4b：网络联系中介了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与机会识别之间的正向关系。

从网络中心性看，团队外部异质性拓宽了企业的交流渠道，使企业在网络结构中能够形成多元的信息优势，占据较高的网络地位。而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一旦提高，意味着其能接触并掌握更多的关键资源^[23]，从而提升机会识别的效果。此外，由于团队成员内部异质性的特征给企业带来了更为复杂的认知结构，使得企业在通过网络搜集信息的过程中能够基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去审视所获的资

源，这有利于企业形成信息质量优势，提升企业网络地位，从而成功识别商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a：网络中心性中介了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与机会识别之间的正向关系。

假设 5b：网络中心性中介了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与机会识别之间的正向关系。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创业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社会网络和机会识别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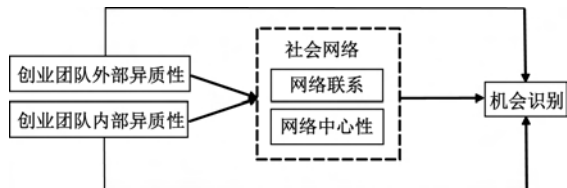


图 1 创业团队异质性、企业社会网络与机会识别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本次问卷调查针对创业团队展开，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江浙沪地区的新创企业，研究对象为新创企业的创始人或是创业的核心成员。为确保问卷发放对象的准确性，本研究按照新创企业成立时间低于 8 年的标准对企业创立年限进行了限制。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737 份，收回 602 份。经筛选，剔除创业团队人数少于 2 人以及非核心成员填写的问卷，最终搜集有效问卷 481 份，回收率达 65.27%。在有效样本中，本文调研的创业团队规模以 5 人及以上的成员组合为主（占 61.75%），2 至 4 人创业的团队有 184 个（占 38.25%）。从企业成立年限看，大部分企业成立时间在 3 年以上（占 76.72%）；从企业规模来看，员工人数大多在 200 人及以下（占 64.45%）；从所属行业来看，涉及制造、生物医药、建筑房产、IT 等行业，但总的来说 IT 和制造行业占据多数。

(二) 变量测量

1. 创业团队异质性

本文借鉴 Harrison 等^[8]的研究，将创业团队异质性分为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两个维度。外部异质性的量表主要参照张秀娥等^[29]、彭学兵等^[30]以及赵文红等^[31]的研究，通过创业者或创业核心成员评价团队中成员的年龄差异、教育背景差异、知识专长以及工作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来确定整个创业团队的异质性程度，包括“团队成员年龄差异大”“团队成员学历背景差异大”“团队成员拥有非常不同的工

作经验”等7个题项。而内部异质性则采用张宏^[32]等学者普遍采纳的指标,通过被访者评价团队成员们对生活和工作的价值观差异、对企业目标的认识差异以及是否具有相似的集体观念等内容来判断团队的内部异质程度。

2. 社会网络

本文研究的社会网络是新创企业的社会网络,在回顾以往研究基础上,最终选取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中的中心性指标进行测量。网络联系主要反映了社会网络中各组织间联系的频繁、亲密以及信任程度。借鉴 Granovette^[33]、龙静^[34]的研究,从企业与供应商、顾客等合作伙伴、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工商、税务等管理机构的联系频繁程度和亲密信任程度方面进行衡量。网络中心性则体现了企业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主导性。企业越接近于网络中心位置,将更能占据信息资源的控制优势。关于网络中心性,本研究借鉴龙静^[34]和 Freeman^[35]的研究,从企业的合作伙伴、企业的影响力以及企业信息获取三方面进行网络中心性评价。

3. 机会识别

机会识别是企业感知市场需求后,对有市场潜力且具有高收益的机会进行挖掘的过程。本文借鉴了 Ucbasaran 等^[36]及古继宝等^[25]的研究,从企业识别商业机会的数量、可行性、多样性以及创新性方面进行测量,旨在关注企业机会识别的效果。

4. 控制变量

考虑到新创企业的行为和结果产出可能受企业特征的影响,本文在借鉴赵文红等^[31]的研究基础上,选取企业年龄、员工人数、资产规模作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本研究还限制了创业团队的人数,因为团队规模对最终的组织产出也会造成一定影响^[37]。

(三) 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对量表进行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较符合内部一致性信度要求。其中,创业团队异质性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886,外部异质性是 0.853,内部异质性是 0.850。社会网络的系数值为 0.849,网络联系达到了 0.857,网络中心性为 0.719。机会识别效果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667,相对较低但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再将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创业团队异质性($\chi^2/df = 4.285$, $GFI = 0.981$, $CFI = 0.988$, $RMSEA = 0.056$)、社会网络($\chi^2/df = 2.499$, $GFI = 0.958$, $CFI = 0.967$, $RMSEA = 0.088$)和机会识别($\chi^2/df = 4.152$, $GFI = 0.945$, $CFI = 0.959$, $RMSEA = 0.081$)模型的总体效度也较好,除了个别值略高于临界值以外,其他指标都在标准范围以内,因此问卷整体的信效度满足研究要求。

(四) 共同方法偏差

对于问卷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处理,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本研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数据在未进行旋转的情况下,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 34.183%。可见,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三、研究结果

(一) 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各主要变量的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自变量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内部异质性均与因变量机会识别显著正相关,且外部异质性与内部异质性本身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此外,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和中心性作为中介变量,与机会识别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也会受到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影响。

表 1 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外部异质性	内部异质性	网络联系	网络中心性	机会识别
外部异质性	3.666	0.711	1	—	—	—	—
内部异质性	3.872	0.689	0.551***	1	—	—	—
网络联系	3.852	0.805	0.474***	0.394***	1	—	—
网络中心性	4.076	0.732	0.475***	0.448***	0.483***	1	—
机会识别	3.762	0.582	0.475***	0.503***	0.403***	0.362***	1

注: *、**、*** 分别表示在 5%、1%、和 0.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回归分析

运用层级回归分别对模型 1—13 进行实证检验,得出表 2 所示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 1 的回归结果中只包含了全部的控制变量;模型 2 和模型 3 则是在已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团队外

部异质性、团队内部异质性这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模型 4—7 分别是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社会网络这一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 8—9 为中介变量社会网络对因变量机会识别的回归模型;模型 10—13 则为包含中介效应的全效应模型。

表2 层次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成立时间	0.085	0.031	0.086*	0.083*	0.136*	0.053	0.113**	0.032	0.048	0.130	0.054	0.023	0.070
员工人数	0.006	-0.017	0.017	-0.020	0.012	-0.008	0.026	-0.003	0.001	-0.160	0.026	-0.015	0.015
资产规模	0.061	0.038	0.033	-0.046	-0.047	0.007	0.004	0.061	0.051	0.440	0.055	0.037	0.034
团队人数	0.156**	0.126**	0.085*	0.007	-0.020	0.102*	0.066	0.140**	0.111**	0.124**	0.093*	0.110**	0.075
外部异质性	—	0.467***	—	0.464***	—	0.469***	—	—	—	0.359***	—	0.391***	—
内部异质性	—	—	0.491***	—	0.394***	—	0.448***	—	—	—	0.395***	—	0.424***
网络联系	—	—	—	—	—	—	—	0.398***	—	0.228***	0.244***	—	—
网络中心性	—	—	—	—	—	—	—	—	0.347***	—	—	0.162***	0.154***
Adj-R ²	0.022	0.238	0.264	0.228	0.171	0.233	0.211	0.179	0.139	0.277	0.307	0.257	0.281
F值	12.016	76.034	84.770	72.042	50.385	73.965	64.922	53.260	39.882	62.354	71.974	56.237	47.986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模型2—3中可以看出,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对机会识别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beta=0.467、0.491, P<0.001$),表明这两个自变量确实对因变量机会识别是具正向作用的,即较高的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均有利于机会识别效果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设1a、假设1b得到验证。从模型4、5可看出,创业团队的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对企业的网络联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beta=0.464、0.394, P<0.001$),模型6、7中可知,创业团队的外部异质性以及内部异质性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也产生了正向影响($\beta=0.469、0.448, P<0.001$),这表明当企业拥有异质性的创业团队结构特征时将更有利于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假设2a、假设2b、假设2c、假设2d得到验证。模型8、9显示的是企业社会网络的联系性、中心性与机会识别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与中心性这两个维度均对机会识别有显著正影响($\beta=0.398、0.347, P<0.001$),网络联系的增强和网络中心性的提高,能够丰富网络中参与主体的数量和类型,整合并利用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机会识别的效果,假设3a、假设3b也得到了验证。

以创业团队的外部异质性和网络联系、内部异质性和网络联系、外部异质性和网络中心性以及内部异质性和网络中心性分别为解释变量,企业机会识别为被解释变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0—13)显示,网络联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28和0.244($P<0.001$),网络中心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62和0.154($P<0.001$),均是显著的。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的回归系数则从模型2的0.467($P<0.001$)分别降低至模型10的0.359($P<0.001$)和模型12的0.391($P<0.001$),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的回归系数也从模型3的0.491($P<0.001$)分别降

低至模型11的0.395($P<0.001$)和模型13的0.424($P<0.001$),但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见,企业社会网络的两个维度(网络联系和网络中心性)在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机会识别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从而假设4a、假设4b、假设5a、假设5b得到支持。

为了进一步明确社会网络中介效应的大小,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再次检验。结果显示,在创业团队外部异质性到企业机会识别的路径中,网络联系的中介效应为0.089,中介结果在置信区间内不包括0($LLCI=0.046, ULCI=0.143$),网络中心性的中介效应为0.069,中介结果也未包含0($LLCI=0.028, ULCI=0.123$)。可见,社会网络的两个维度在团队外部异质性与机会识别间确实具有中介作用,假设4a、假设5a得到检验。在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到机会识别的路径中,网络联系与网络中心性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81和0.065,且二者中介结果的置信区间($LLCI=0.042, ULCI=0.130; LLCI=0.023, ULCI=0.114$)也均不包含0,表明社会网络在团队内部异质性与机会识别间同样发挥中介作用,假设4b、假设5b也得到了证实。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以高阶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创业团队异质性、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理论模型,并通过481家新创企业的有效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创业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机会识别有正向影响。较高的外部异质性为企业拓宽了搜集信息资源的渠道,较高的内部异质性提升了企业对所获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为企业机会识别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创业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

会网络的构建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异质性扩大了企业的交际圈,内部异质性则提升了团队整体的认知水平,这对增加企业社会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均有促进作用。第三,企业社会网络的联系与中心性水平对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企业拥有丰富的网络联系加速了资源的流动与转移,企业占据网络中心度高的位置有利于提炼高质量的信息,继而助于提升企业机会识别的效果。第四,社会网络在创业团队异质性影响机会识别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当企业拥有显著外部异质性的团队时,成员之间与外界互动会使得自身的网络联系不断增强,网络中心性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利于机会识别。当企业拥有高内部异质性的创业团队时,对信息理解和关注点的不同使得成员们更为主动地搜集更多的资源来调和彼此间矛盾的观点,为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优势,进而对企业识别潜在机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研究启示

本文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创新:第一,从创业团队结构特征出发,本文将团队异质性细分为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多维度考察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机会识别的关系,弥补了以往研究中拘泥于挖掘创业团队单一维度异质性的不足。事实上,较之于外部异质性,成员间的内部异质性影响机会识别的作用更大。外部的异质性更多的是从资源的累积来达到较好的识别效果,而内部异质性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则是由创业者们思维的碰撞以及认知的交互产生,后者对市场形势的分析以及信息的把握更为深刻。第二,本研究整合高阶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探索性地将企业社会网络作为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机会识别行为的中介变量。研究发现,创业团队的异质性会提升企业的社会网络,进而更有利于机会的识别。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对企业社会网络前因变量的探究,也开拓了创业团队异质性机会识别作用机制的研究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此外,本研究对创业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其一,新创企业在组建创业团队时,可多吸纳异质性的成员,借助彼此之间的资源、知识、经验、认知等来实现企业机会识别的创新性和高质量。其二,新创企业应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工商税务等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教育机构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密切联系,善于利用多样化的网络联系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提升机会识别的概率。其三,新创企业须不断调整其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努力提高中心性水平以提

升机会识别的效率。

(三)研究局限

本文研究局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两方面衡量企业社会网络这一变量时,只关注了网络结构中的中心性这一指标,缺少对结构洞的研究。尽管中心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洞的多少,但结构洞的中介位置是中心性所不能替代的。第二,本文问卷调查的数据是创业核心成员对团队的评价数据,可能在测量创业团队内部异质性时存在主观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可采用跨层级的分析方法,从个体到企业多层次进行探讨。第三,本文调研搜集的新创企业样本属于截面数据,相对纵向研究而言,难以反映新创企业机会识别的动态变化,未来可以采取跟踪、访谈等方式进行动态研究,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 [1] 王沛,陆琴. 创业警觉性、既有知识、创业经历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J]. 心理科学, 2015, 38(1): 160-165.
- [2] 胡望斌,张玉利,杨俊. 同质性还是异质性:创业导向对技术创业团队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6): 92-109.
- [3] Hambrick D C, Humphrey S E, Gupta A. St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within top management teams: A key moderator of upper echelons prediction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6(3): 449-461.
- [4] Stam W, Arzlanian S, Elfring T. Social capital of entrepreneurs and small firm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of contextual and methodological moderato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4, 29(1): 152-173.
- [5] 程江.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10): 3-17.
- [6] 张艳,张建琦. 社会网络和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对民营企业企业家机会搜寻能力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16, 13(12): 1801-1807.
- [7] Horwitz S K, Horwitz I B. The effects of team diversity on team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eam demograph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33(6): 987-1015.
- [8] Harrison D A, Price K H, Gavin J H, et al. Time, teams, and task performance: Changing effects of surface-and deep-level diversity on group function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5): 1029-1045.
- [9] 谢觉萍,王云峰. 创业女性机会识别与创业过程管理多

- 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4):144-148.
- [10] 于东平,段云龙,张新启. 企业家一般人力资本与其机会识别能力的关系:机理分析与案例研究[J].技术经济,2016,35(4):52-58.
- [11] Alexiev A S, Jansen J J P, Van D B, et al. Top management team advice seeking and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MT heterogeneit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 (7): 345-450.
- [12] 华斌,陈忠卫. 高管团队凝聚力、冲突与组织绩效:基于创业过程的研究[J].当代财经,2013(12):69-78.
- [13] 叶英平,卢艳秋. 社会关系视角的网络权力与网络惯例形成[J].经济管理,2016,38(7):167-176.
- [14] 刘刚,李超,吴彦俊. 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路径: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J].系统管理学报,2017,26(4):655-662.
- [15] 朱丽,柳卸林,刘超,等. 高管社会资本、企业网络位置 and 创新能力:“声望”和“权力”的中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38(6):94-109.
- [16] 白景坤,红艳,屈玲霞. 动态环境下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如何影响战略变革:基于沪深两市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7(2):157-168.
- [17] Heavey C, Simsek Z.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upper echelons perspective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5, 26(4): 941-959.
- [18] 许多. 创业团队异质性、社会网络对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9.
- [19] 刘冰,符正平,邱兵. 冗余资源、企业网络位置与多元化战略[J].管理学报,2011,8(12):1792-1801.
- [20] 詹坤,邵云飞,唐小我. 联盟组合的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6): 47-58.
- [21] Todo Y, Matous P, Inoue H. The strength of long ties and 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Knowledge diffusion through supply chain networks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9): 1890-1906.
- [22] 刘善仕,孙博,葛淳棉,等. 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基于在线简历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7):88-98.
- [23] 王建刚,吴洁. 网络结构与企业竞争优势:基于知识转移能力的调节效应[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 37(5):55-66.
- [24] 陈逸同,董正英. 企业网络中心性与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2):192-204.
- [25] 古继宝,陈兆锋,吴剑琳. 创业者社交主动性对新创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38(5):169-180.
- [26] 买忆媛,杨阳,叶竹馨. 转型经济体制下创业团队的先前经验、无力感与适应能力[J].管理学报,2015,12(17):1028-1037.
- [27] Chen M H, Chang Y Y, Lee C Y. Creative entrepreneurs' guanxi networks and success: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 (4): 900-905.
- [28] Gedajlovic E, Honig B, Moore C B.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A schema and research agenda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 (3): 455-78.
- [29] 张秀娥,孙中博,王冰.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对七省市 264 家创业企业的调研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7):112-115.
- [30] 彭学兵,陈小波,杨隽萍. 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团队整合的中介作用[J].人类工效学,2014,20(4):12-16.
- [31] 赵文红,薛朝阳. 创业团队异质性、认知合法性与资源获取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2017,14(4):537-544
- [32] 张宏. 创业团队价值观异质性、团队冲突与团队凝聚力关系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4(2):90-93.
- [33]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 (6): 1360-1380.
- [34] 龙静. 创业团队内、外社会网络对创新的交互效应[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5):148-159.
- [35] 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J]. Social Networks, 1979, 1 (3): 215-239.
- [36] Ucbasaran D, Westhead P, Wright M, et al. Does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influence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J]. The 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 2003, 7(1):7-14.
- [37] 侯楠,杨皎平,戴万亮. 团队异质性、外部社会资本对团队成员创新绩效影响的跨层次研究[J].管理学报,2016,13(2):212-220.

(责任编辑:陈丽琼)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精神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洪子又, 朱伟明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基于当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和服装定制的相关理论, 通过文献查阅、专家访谈及市场调研等方法, 对工匠精神在定制服装中的价值进行模糊评价。根据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品牌、人员、服务、产品、设施 5 个维度的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一级指标, 并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定量模糊综合评价, 形成了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综合权重表。数据分析显示, 一级指标权重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 产品、服务、品牌、人员、设施; 结合指标体系, 提出服装定制工匠精神提升策略。该研究旨在为培育服装定制匠心标杆品牌提供理论支撑, 为服装定制产业强化匠心精神指明方向。

关键词: 服装定制; 工匠精神; 价值; 层次分析法; 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TS94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44-08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raftsman spirit value

HONG Ziyou, ZHU Weiming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craftsman spirit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lothing custom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and market research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carry out fuzzy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craftsman spirit in clothing custom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primary indicators of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raftsman spirit value evaluation were established from five dimensions: brand, personnel, service, product and facility. Matlab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 comprehensive weighting table of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raftsman spirit value evaluation was formed. The data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weight of the primary indicators is ranked from large to small as below: product, service, brand, personnel, and facility. By combining with the indicator system,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raftsman spirit improvement strategy was proposed.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clothing customization brands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enhancing craftsman spirit of the clothing customization industry.

Key words: clothing customization; craftsman spirit; valu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 消费方式逐步从产品消费过渡到服务型消费、从传统的物质消费过渡到精神消费, 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产品质量

和消费体验, 消费过程中的个性化因素得到充分体现。2016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在优化消费品质、提升消费能力方面, 要凸显工匠精神^[1]。这是“工

匠精神”首次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政府报告中,充分体现出弘扬“大国工匠精神”的基本诉求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工匠精神”被反复提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2]。进入“互联网+”时代,工匠精神恰恰是当今浮躁社会中各行各业都普遍缺乏的。所以,必须重视工匠精神的培育,尤其要彰显工匠精神中的人文情怀,这也与当下服装定制行业的发展要求殊途同归。

在经济新常态下,消费需求的快速迭代和差异性市场细分,促使服装定制行业蓬勃发展。中国服装定制产业从红帮裁缝的萌芽,到众多设计师高级定制品牌的崛起,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服装定制市场虽然已颇具规模,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如专业人才供不应求、协会组织以及行业规范缺失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品牌不断涌入中国服装市场,全球定制市场竞争加剧,直接影响到中国服装定制品牌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服装定制业的发展,开展行业评价体系研究十分必要。然而,工匠精神在服装设计上如何体现,尤其是在服装定制中的价值如何体现,至今尚无明确的研究。本文对工匠精神在服装定制中的价值体现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从而构建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服装定制行业提升工匠精神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对中国服装产业如何落实工匠精神和对中国服装定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文献回顾

有关工匠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匠精神的内涵特征、推崇的必要性,当前社会工匠精神的缺失原因分析和提升途径等方面^[3]。巩佳伟等^[4]从坚持、专注、踏实、勤奋、严谨、精进、创新等层面分别阐述了当代工匠必备的精神品质。李宏伟等^[5]指出,工匠精神中包含的尊师重道精神、创新精神、技术实践精神等优秀品质是当代工匠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培养工匠精神既要做好传统工匠精神的人文传承,又要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实际需求。刘建军^[6]指出工匠精神产生于手工业时代,是手工劳动者的精神遗产,其主要内容包括:爱岗敬业、积极专注、无私奉献等精神品质和始终如一、追求高品质的理念。郭霄霄^[7]结合工匠精神的内涵和研究现状,解析如何培育服装行业的工匠精神。

在当代社会,工匠精神包括工艺精神以及人文精神两个方面^[8]。其中,工艺精神具体体现在产品质量意识两个层面;人文精神即普遍性的人文关怀,表现为追求人生价值和自我实现。工匠精神的内涵包括敬业精神、德艺精神、师道精神、创新精神,核心是“匠心”。所谓“匠心”,指的是既掌握高超的技艺,又具备优良的人文素养,还能够进行有效的创新,提高匠人的技术水平;“匠心”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出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某种气质与精神,包含着他们对职业的敬仰之情。当下,全社会对工匠精神的日益重视,正是社会对产品意识和人文素养的一种关注。

服装定制领域的研究既涉及服装定制的概念特点、发展状况、工艺手法、品牌格局、运营模式、营销策略、智能制造、网络定制、产品开发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又涵盖服装定制的规模、程度、品类、层次、价值以及商业模式等多个方向。朱伟明等^[9]从定制服装品牌的起源特征及发展现状着手,基于品牌模式理论对男装定制市场进行梳理,分析比较了中国服装定制市场竞争格局与运营模式。李浩等^[10]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理论,尝试分析传统定制模式和“互联网+”背景下的O2O定制模式,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同。陈梦萍等^[11]以产品品牌价值为核心,论述了影响品牌综合价值的因素,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已有模型,建立了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服装品牌估值模型。

目前,中国服装定制市场中较为成熟的模式有两种,即传统定制市场和云定制市场。其中,传统定制市场又可以细分为纯手工定制和自动化辅助定制^[12]。纯手工定制主要是根据裁缝的实际经验来进行服装定制,具体包括测量、打版以及裁剪等多个环节,如MarkCheung(张肇达)、Maryma(马艳丽)、Ne·Tiger(张志峰)、玫瑰坊(郭培)、Grace Chen(陈野槐)等设计师品牌和隆庆祥、罗马世家、红都、永正、真挚服、W.W.Chan&Sons等传统红帮裁缝定制品牌。自动化辅助定制通常是在传统测量方式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的制版技术和裁剪技术来进行服装制作,并由人工对整件服装进行修整定型的过程,如衣邦人、量品和埃沃等上门量体定制品牌。云定制是基于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将人体尺寸参数以及服装的规格尺寸数字化,并充分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平台来实现服装设计与生产,如恒龙云定制、雅戈尔、乔治白、罗蒙等大规模集成式定制品牌。服装定制是对服装产品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在原材料、服装

版型的选择上,还是在传统手工艺制作上,都是对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因此,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又是一种精神品质,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以往对当代工匠精神内涵的概括以及对服装定制业品牌模式、定制流程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文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的指标提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工匠精神与某个专业领域结合的研究尚缺,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其与服装定制业的结合进行要素解构。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从服装定制的具体流程到工匠精神价值的抽象感知、再到具体要素提取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包括基本理论储备、评价指标遴选、评价模式优化三个基本环节。基于此思路,根据评价指标建立基本原则和层次分析法,对影响服装定制行业中的工匠精神构成要素进行解构,建立科学、实用的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层次分析法的原理是将影响被分析对象的相关因素进行量化,并建立起影响因素之间的内部层次递进关系,由此反映出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层析分析法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分析准则层、方案制定层,能够将抽象的评价对象具体化、数量化,并对不同层次进行逐级类比,从中获取最优解决策略^[13]。

本文参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准则和设计原理,首先通过文献整理制定最初的评价指标,初选指标由品牌、人员、设计、合体、设施、创新以及体验这7个层面的36个指标构成;然后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二轮优化;最后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服装定制工匠精神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优化环节,为了避免评价结果的主观性,在选择访谈专家时,考虑了以下问题:一是专家组成员应有代表性,包括设计师主导的高级定制、传统红帮裁缝定制品牌、互联网定制、大规模集成定制领域的设计师、掌门人、创始人和运营人员等角色。二是专家要对调查的问题比较熟悉,有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且有一定的权威性。三是专家要对调查的问题感兴趣,并且有时间参加调查的全过程。对专家访谈采用开放性的问题,并将所要判断的问题及有关评价要素提供给专家参考,同时给专家留出发挥的空间和意见反馈机会。进行专家筛选评定,主要目的在于对初始指标中的题项设计错误、遗漏或表达不当等问题进行修

改,以指标的重要程度为判定系数进行指标筛选,根据专家对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的意见对个别指标进行合并、增删与修改,从而建立最终的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指标体系由品牌层面、人员层面、设施层面、产品层面、服务层面5个一级指标和对应的23个二级指标,共同构成了评价体系的逐级层次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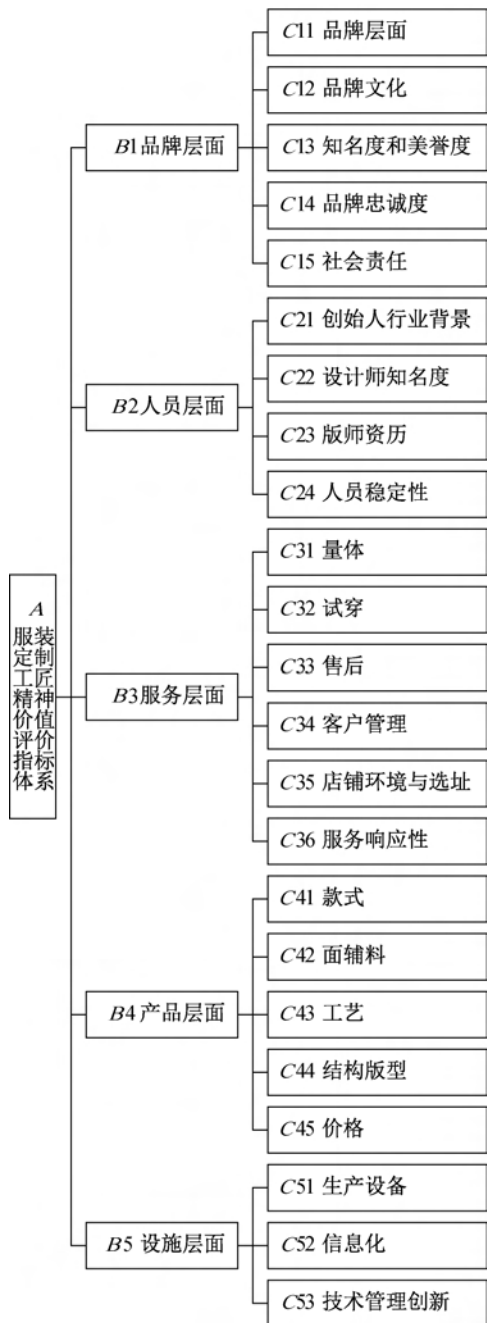


图1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的递阶层次结构

(二)构造比较判断矩阵

将递阶层次结构推导出的影响因素权重以一一

映射的方式进行比较,比较方法主要是通过一级指标的影响因素作为对比基准,通过对比一级指标 a_{ij} 来表征二级指标中的第 i 个因素和第 j 个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a_{ij} 的取值为 1~9 之间的正整数和相应的倒数,各 a_{ij} 元素构成的矩阵为判断矩阵,矩阵元素见表 1。

表 1 判断矩阵 a_{ij} 的标度及其含义

重要性等级	a_{ij} 赋值
i, j 两元素同等重要	1
i 元素比 j 元素稍微重要	3
i 元素比 j 元素相当重要	5
i 元素比 j 元素明显重要	7
i 元素比 j 元素绝对重要	9
i 元素比 j 元素稍微不重要	1/3
i 元素比 j 元素相当不重要	1/5
i 元素比 j 元素明显不重要	1/7
i 元素比 j 元素绝对不重要	1/9

判断矩阵具备以下基本性质: $a_{ij} > 0, a_{ij} = 1/a_{ji} (i \neq j)$ 。将矩阵 A 作为类比基准,设 B 层次对应的矩阵元素比较后的判定矩阵为 $A-B, C$ 层次的判定矩阵为 $B-C$ 。本文对已建立的基于服装定制的工匠精神价值要素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市场调研,请服装定制领域的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对各指标的两两比较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打分。比如,结合表 2,在矩阵 A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要素中, $B1$ 品牌层面和 $B2$ 人员层面的重要程度比较结果为 $B1$ 比 $B2$ 稍微重要,那么在判断矩阵中的分值为 3,以此类推。再通过 Matlab 软件,使用几何平均法对所有专家评判结果进行权重综合合成,得到如表 2—表 7 所示的各层判断矩阵。

表 2 一级指标对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的判断矩阵 $A-B$

指标	$B1$	$B2$	$B3$	$B4$	$B5$
$B1$	1	1/3	1/5	1/6	1/3
$B2$	3	1	1/3	1/4	1
$B3$	5	3	1	1/2	3
$B4$	6	4	2	1	4
$B5$	3	1	1/3	1/4	1

表 3 二级指标对品牌层面的判断矩阵 $B1-C1$

指标	$C11$	$C12$	$C13$	$C14$	$C15$
$C11$	1	1/9	1/7	1/9	1/7
$C12$	9	1	3	1	3
$C13$	7	1/3	1	1/3	1
$C14$	9	1	3	1	3
$C15$	7	1/3	1	1/3	1

表 4 二级指标对人员层面的判断矩阵 $B2-C2$

指标	$C21$	$C22$	$C23$	$C24$
$C21$	1	1	1	1/3
$C22$	1	1	1	1/3
$C23$	1	1	1	1/3
$C24$	3	3	3	1

表 5 二级指标对服务层面的判断矩阵 $B3-C3$

指标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1$	1	1	1	3	2	1
$C32$	1	1	1	3	2	1
$C33$	1	1	1	3	2	1
$C34$	1/3	1/3	1/3	1	1/2	1/3
$C35$	1/2	1/2	1/2	2	1	1/2
$C36$	1	1	1	3	2	1

表 6 二级指标对产品层面的判断矩阵 $B4-C4$

指标	$C41$	$C42$	$C43$	$C44$	$C45$
$C41$	1	1	1	1	1
$C42$	1	1	1	1	1
$C43$	1	1	1	1	1
$C44$	1	1	1	1	1
$C45$	1	1	1	1	1

表 7 二级指标对设施层面的判断矩阵 $B5-C5$

指标	$C51$	$C52$	$C53$
$C51$	1	1/3	1
$C52$	3	1	3
$C53$	1	1/3	1

(三) 数据分析及判断

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测,所有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均小于 0.1,一致性检测结果在能够接受的区间内。建立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综合权重表,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得出,各二级指标的组合权重为 $W = (0.0239, 0.0261, 0.0364, 0.0398, 0.0368, 0.0368, 0.0119, 0.0457, 0.0632, 0.0240, 0.0579, 0.0264, 0.0227, 0.0244, 0.0291, 0.0809, 0.0754, 0.1349, 0.0887, 0.0339, 0.0369, 0.0281, 0.0351)$ 。若某服装定制品牌的工匠精神价值评价各二级指标的结果为 $X = (x_{11}, x_{12}, x_{13}, x_{14}, x_{15}, x_{21}, x_{22}, x_{23}, x_{24}, x_{31}, x_{32}, x_{33}, x_{34}, x_{35}, x_{36}, x_{41}, x_{42}, x_{43}, x_{44}, x_{45}, x_{51}, x_{52}, x_{53})$,则该定制品牌的工匠精神价值评价分数 $y = (0.0239 x_{11} + 0.0261 x_{12} + 0.0364 x_{13} + 0.0398 x_{14} + \dots + 0.0339 x_{45} + 0.0369 x_{51} + 0.0281 x_{52} + 0.0351 x_{53})$ 。

表8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综合权重

指标层	准则层					一致性检验比例	占总目标的权重
	B1	B2	B3	B4	B5		
C11	0.1464					0.0020	0.0239
C12	0.1604						0.0261
C13	0.2234						0.0364
C14	0.2441						0.0398
C15	0.2256						0.0368
C21		0.1287				0.0012	0.0368
C22		0.0855					0.0119
C23		0.3298					0.0457
C24		0.4560					0.0632
C31			0.1300			0.0015	0.0240
C32			0.3139				0.0579
C33			0.1433				0.0264
C34			0.1229				0.0227
C35			0.1321				0.0244
C36			0.1577				0.0291
C41				0.1956		0.0010	0.0809
C42				0.1821			0.0754
C43				0.3260			0.1349
C44				0.2143			0.0887
C45				0.0820			0.0339
C51					0.3686	0.0025	0.0369
C52					0.2811		0.0281
C53					0.3503		0.0351
准则层各因素对总目标的影响	0.1630	0.1386	0.1845	0.4138	0.1001	0	

由表8中的各指标可以得出影响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要素按重要程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产品、服务、品牌、人员、设施。产品是影响工匠精神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占比高达41.38%。二级指标相对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工艺、结构版型、款式、面辅料、人员稳定性、试穿合体度、版师资历、品牌忠诚度、生产设备先进性、社会责任、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技术管理创新、价格、服务响应性、信息化建设、售后服务、品牌文化、店铺环境与选址、量体、品牌历史、客户管理、创始人行业背景、设计师知名度。其中,工艺占总权重的13.49%,明显领先于位居第二的结构版型,相比之下,价格高低对产品的价值影响较小,仅占总权重的3.39%。由此可知,若想提升定制服装的品牌价值,必须以提升产品质量为首要任务。

三、服装定制工匠精神提升策略

根据上文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得出产品是服装定制中

影响工匠精神价值含量高低的核心要素。服装定制可以从工艺、结构版型、款式和面辅料方面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服务,建设良好的品牌形象,逐步完善和提高设施的先进性,从而实现时尚匠心标杆品牌的培育。

工匠精神中的工匠精神在服装定制领域主要体现在产品层面,工匠精神慢工出细活的做事方式在服装定制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手艺人的内在品质以及传统工艺对精雕细琢的强调,成为定制服装赖以生存的法宝以及必须恪守的原则。定制是一种精工细作的意识,一件服装的每个制作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需要精心打磨。工匠精神不仅是一项技能,更是一种品质,选用极致的材料,进行用心的设计,配以完美的手工,控制每道工序的品质,把握极致的匠心,从而产生富有灵魂的产品。好的产品不是一蹴而就的,还要靠日积月累的精湛技艺。传统服装定制的核心技术是手工艺技术,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有定制工匠师傅逐渐减少,对定制手工艺的传承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定制品牌的发展需培

育优秀的工匠师傅,学习中国传统的手工缝制技术,谙习“红帮工艺”^①中的“四功”^②“九势”^③和“十六字标准”^④等独特的传统技术和方法。制作精良的产品需要工匠经过几十年的技艺沉淀,而面料作为服装最重要的感知元素,是创造品牌个性和品牌特征最重要的工具和媒介之一,也是服装品牌竞争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要发挥工匠精神,就需要将原材料、花型纹理、技术研发、设计制作做到极致。此外,中产阶级的崛起让原有的定制目标消费群趋向年轻化,年轻的消费群体易受潮流风向的影响,服装定制在面料和款式上也要不断创新,来满足顾客个性化的时尚需求。

工匠精神中的人文精神在服装定制业主要体现在服务层面,系统、全面、优质、高效的售后服务,以及拥有长期稳定的客户与渠道管理都是服装品牌竞争的新焦点。服装定制过程中,首先要在每一环节都与消费者建立及时的沟通渠道,有效解决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其次要努力突破量体的痛点,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传统的定制都是量体师为顾客量身定制,尽管当下各种3D设备期望替代传统量体师,但都无法解决量体师后继无人的问题,因此需要培育具有丰富经验的量体师。量体技术的精湛之处在于,除了尺寸要符合人的体型,还能根据人的社会属性及运动中的神态,视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工匠精神中,传统工匠对文化艺术矢志不渝的追求即是对消费者意识和思维的引导,在服装定制中体现在品牌层面,品牌文化是品牌的核心特质,是品牌价值的集中体现,表达了品牌崇尚的生活方式、礼仪规制、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精神追求。好的品牌要有深厚的人文内涵作为支撑,为相同价值观的消费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满足消费者内在的精神需求。品牌文化特性能够创造财富,赋予产品无可估量的附加价值,品牌通过文化性特质与消费者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在兼顾产品外部消费价值的同时,着重对内部精神指向价值的巩固与突显,能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消费者对品牌特色和价值观的认同可以增强对品牌的忠诚度,从而推动潜在购买行为成为现实。提升品牌文化底蕴应始终围绕品牌核心价值,在品牌定位前审视自身的发源与发展,明确品牌文化基因,以目标消费者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情感为依据,建立独特的品牌战略,循序渐进地实现品牌文化的培育。品牌的历史要素不可或缺,对于近年成立的新兴品牌可以将历史感诉求换一种形式来

表达,比如去攀缘有历史传统的事物,使品牌与历史衔接,它可以是蕴含环境氛围的历史,或对某段历史的反映和纪念。不仅仅是历史背景重要,通过衍生现代神话来创造历史,也是理想的品牌创意资源。另外,服装品牌也可以通过慈善行为、公益实践活动以及产品相关跨界行为来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

人员层面,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工匠”指含有专门技艺的手工业劳动者,不仅是传统工业的主要劳动力,而且还是传统工业的技术主体。传统工匠在长时间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会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16]。《庄子》云“技进乎道”,其中的“技”,就是当下社会倡导的工匠精神,其中包含着个人或组织对职业、对工作、对产品的一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耐心专注的态度和境界。美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17]指出,技艺越高的人在工作中越容易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达到一定境界之后,他们会将原本机械性的工作融入对事物更深入的感知和理解。因此,达到这个境界的匠人能更好地改进技术,或者有能力去创造一种新技术,并将技术与创造融为一体。当工匠把技艺做到极致时,他对行业的贡献同样也会更大。品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加强品牌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总结当代企业的精神文化内涵,制定出战略发展蓝图,让员工能够清晰认识到未来发展前景,并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努力树立和品牌共发展的价值观。必要情况下,企业应采用薪酬激励机制,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当工作中的激励和保健因素得到满足以后,员工才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从而提高自身工作积极性,减少优秀人才的流失。所以,充分发挥薪酬的激励机制,有助于打造现代化的高水平员工队伍。对于品牌核心团队成员,需要不断增加其知识和技能储备,改进其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模式,发掘潜在机会,整合资源推动创新,促进品牌发展。

当今工匠精神的内涵在服装定制中还体现在设

① “红帮工艺”是红帮裁缝在1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西服制作的“四功”、“九势”和“十六字标准”,成为中国缝制西服的经典工艺。

② “四功”指手工西服制作技艺中的刀功、车功、手功、烫功。

③ “九势”指肋势、胖势、窝势、馘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

④ “十六字标准”即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馘。

施层面,中国重视工匠精神,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也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现代社会中新兴技术的应用是每个国家创新的活力源泉。为了在服装定制业中发挥信息技术的商业价值,加快推进信息化的普及,增强定制品牌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强信息化的规范性发展,提高信息质量与水平。在服装设计过程中,企业可以运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例如使用现代化的三维CAD量身定做系统以及模拟试衣系统等等。此外,企业需加强客户信息、需求与供应、生产采购等一系列环节的统一管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发展,将现代技术真正融入到服装定制的整个过程中,实现商业模式的变革。总之,服装企业的信息化发展必须立足于企业的发展情况,明确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技术管理水平,合理利用内外部资源整合技术知识,将信息化技术转变为品牌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实现有效的产品质量提升与创新,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增强服装品牌的文化软实力。

四、结语

本文首先通过查阅文献对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要素进行初选,然后经过专家访谈对初选指标进行优化,建立由5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服装定制工匠精神价值评价体系,接着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消费者进行调研,确立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权重大小,得出一级指标权重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产品、服务、品牌、人员、设施,二级指标权重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工艺、结构版型、款式、面辅料、人员稳定性、试穿、版师资历、品牌忠诚度、生产设备、社会责任、知名度和美誉度、技术管理创新、价格、服务响应性、信息化、售后、品牌文化、店铺环境与选址、量体、品牌历史、客户管理、创始人行业背景、设计师知名度。最后围绕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分析结果,提出服装定制工匠精神提升策略。

当下,要加快推进服装定制品牌的转型升级,尽可能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让定制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必须通过现代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数字化的融合,实现商业模式变革。a)对于以红帮师傅为主的传统高级定制品牌而言,企业转型门槛较高,应开展柔性化生产,将设计研发直接与用户需求对接,在传承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的同时,开展产业形态变革,凭借互联网下的柔性化生产制造,将企业从传统制造型模式向现代化的服务型

制造模式转变。b)对于新兴网络定制品牌,要通过互联网定制平台提高核心竞争力,改进技术,转变传统价值观,关注消费者整体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实现“终端+平台+服务+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c)对于成衣企业延伸定制子品牌,主要是立足于原有渠道的产业链延伸,应在定制行业标准规范下合理利用信息化进行大数据定制,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推动定制产业的市场细分。d)对于代加工转型定制企业,应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相关平台的搭建,充分运用研发技术和生产优势,推进供给侧改革。e)对于大规模团体定制品牌,在原有技术层面的基础上,提升品牌形象建设,利用智能化制造,推进整个管理系统的集成应用,实现企业和信息化的有机融合。f)对于设计师原创品牌,应加强品牌文化内涵,增加品牌特色服务如跨界举办各类活动等,提高品牌曝光率,强化品牌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6-03-18(1).
- [2]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
- [3] 杨力,陈焕章.我国工匠精神研究述评[J].成人教育,2018,38(4):57-61.
- [4] 巩佳伟,于秀媛,张丽丽.匠心:追寻逝去的工匠精神[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4.
- [5] 李宏伟,别应龙.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培育[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8):54-59.
- [6] 刘建军.工匠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思想教育研究,2016(10):36-40.
- [7] 郭霄霄.服装设计专业现代“工匠精神”培养模式探讨[J].艺术科技,2017,30(6):5-6.
- [8] 李昌娟.职业教育使命与“工匠精神”的培育[J].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5(1):47-49.
- [9] 朱伟明,彭卉.中国定制服装品牌格局与运营模式研究[J].丝绸,2016,53(12):36-42.
- [10] 李浩,朱伟明.O2O服装定制品牌顾客感知价值的差异研究[J].丝绸,2015,52(1):36-41.
- [11] 陈梦萍,蒋晓文.中国服装品牌价值评估模型的研究[J].国际纺织导报,2014,42(1):70-72.
- [12] 王君丽.服装云定制及其发展趋势探讨[J].纺织导报,2018(7):79-80.
- [13] 邓雪,李家铭,曾浩健,等.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42(7):

93-100.

[14] Ross F. Refashioning London's bespoke and demi-bespoke tailors: new textiles, technology and design in contemporary menswear [J].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2007, 98(3): 281-288.

[15] 贾佳. 服装定制业品牌价值评价方法初探[J]. 商业经济, 2016(11): 89-91.

[16] 余同元. 传统工匠及其现代转型界说[J]. 史林, 2005

(4): 57-66.

[17] 理查德·桑内特. 匠人[M]. 李继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11.

[18] 朱伟明, 谢琴, 彭卉. 男西服数字化智能化量身定制系统研发[J]. 纺织学报, 2017, 38(4): 151-157.

[19] 朱伟明, 卫杨红. 互联网+服装数字化个性定制运营模式研究[J]. 丝绸, 2018, 55(5): 59-64.

(责任编辑: 陈丽琼)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城市残疾人 停车位使用影响因素分析

——以杭州市为例

陆维特, 朱国旺, 倪训友, 张春勤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残疾人停车位是城市无障碍停车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保障残疾人士和交通弱者的出行有重要作用。文章分析了残疾人停车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影响因素,通过收集杭州市残疾人停车位相关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违章使用次数、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以及目的地吸引指数是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主要因素。该研究可以为无障碍停车体系建设的相关规范调整或政策文件出台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残疾人停车位;影响因素;停车位使用率;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52-08

Influential factor analysis of urban parking space use by the disabled based o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LU Weite, ZHU Guowang, NI Xunyou, ZHANG Chunqi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barrier-free parking system, the parking space for the disable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afe travel of the disabled and the people with transportation weakness. The problems and potential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arking space use by the disabled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collecting the data about parking space for the disabled in Hangzhou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t was found that, number of illegal use, distance between parking space and destination entrance, and destination attraction index are the major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arking space use by the disabled.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relevant standards or issuance of relevant policies for barrier-free parking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parking space for the disabled; influential factors; parking space usage rate; linear regression

截至2017年底,中国残疾人数量已超过8600万人^[1],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34%。200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发〔2008〕7号)提出要“加快无障碍建设和改

造”,公共停车区要优先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2016年,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杭州市联合会发布的《杭州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规划(杭发改规划〔2016〕280号)》^[2]也提出要积极推动残疾

人停车无障碍环境建设。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残疾人停车体系已经成为全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城市残疾人停车位在设置和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残疾人停车位数量不足、空间分布失衡、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过远、停车位标志标示不完善、停车位尺寸不标准，以及残疾人停车位时常被占用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残疾人停车位使用效率，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课题。因此，明确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残疾人停车位使用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Paul等^[3]对美国的商场、办公楼等公共建筑的残疾人停车位配置率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发现停车位配置率的高低应当根据公共建筑的类型来确定，法律规定的残疾人停车数量占总停车位2%并不合理。Fletcher^[4]研究发现单独设置残疾人停车位地面标志对于减少违章停车、增加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作用十分有限。他认为地面标志容易被违章的车辆遮挡住，起到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这可能会导致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下降。Cope等^[5]通过反复增加或减少垂直标志标示，发现仅有地面标示的情况下停车违规率高达70%，增加垂直标示牌后降低至57%。Kiyota等^[6]通过商场实验分析了残疾人停车位标志标示对停车位违章使用的影响，认为当地面标示和垂直警示标志牌同时设置将有效抑制违章停车时间和次数，提高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Lu等^[7]通过研究日本的残疾人停车位使用次数和停车位与目的地出入口距离关系，发现两者成反比关系，即停车位与目的地出入口距离越近，残疾人停车位使用次数越多。国内关于残疾人停车位的使用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尚处初步探索阶段，仅有少数研究涉及。姜健等^[8]通过对哈尔滨主城区的地面停车场和路边的残疾人停车位进行调研，认为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和停车位附近车流量因素影响了停车位的使用。陆维特等^[9]研究发现，在商场设置齐全的残疾人停车位标志标示能够有效抑制违章停车，提高了残疾人的停车效率。

尽管国内外文献对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仅从某一因素或某几个因素角度对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影响进行研究，没有系统、全面地分析潜在的因素对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影响。此外，上述文献提到的因素是否为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主要因素，国内外的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因素是否有所不同，尚不可知。因此，本文在总结

杭州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潜在因素。通过收集杭州市残疾人停车位相关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确定残疾人停车位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城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存在的问题

城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往往隐含了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影响因素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城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现状进行分析。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残疾人出行重视，城市无障碍停车体系得到大力发展，杭州市残疾人停车位数量有了大幅提高。仅2010—2016年杭州市城区新建的303处公共项目中，建设的残疾人停车位数量达到1654个^①。然而，残疾人停车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停车位数量不足

目前，杭州市主城区的残疾人停车位主要分布在火车站、飞机场、医院和大型商场等区域，总体数量不足。根据2018年杭州市车辆管理所的统计，目前杭州市拥有C5驾照的残疾人驾驶员共有810人，每年约有200人正在驾校参加C5驾照考试培训，预计全市拥有C5驾照的残疾人数量将逐年增长。残疾人使用私人小汽车出行将呈现增长趋势，残疾人停车位数量不足将成为停车位使用的主要问题。

（二）停车位空间分布不平衡

全市已建成的残疾人停车位中，约八成停车位集中于城市新建公共区域。尽管这些区域的公共服务设施与设备较为完善，但是附近人流密度不大，附属的停车位场所位置较为偏僻，吸引力较弱，导致实际使用率偏低。而对于残疾人停车位需求量较大的老城区公共中心区域，残疾人停车位仅占总停车位的两成左右，与新建的公共区域相比，残疾人停车位供给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平衡。

（三）停车位被违规占用频繁

残疾人停车位被违规占用时有发生。如在购物高峰时间段，杭州宜家商场、家乐福超市设置的残疾人停车位经常被健康驾驶者违规使用，难以保证该类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士所用；部分残疾人停车位被改造为杂物堆放区域等，作为他用，并没有真正起到残疾人泊车作用。

^① 数据来源于杭州市交警支队车位设置科的内部资料（无障碍泊位统计）。

(四)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过远

城区内残疾人停车位虽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但不少停车位位置较为偏僻,与目的地入口距离过远。残疾人停泊到停车位后,往往需要步行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达目的地,颇为不便。

(五)停车位设置不标准

残疾人停车位宽度和设置比例不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2012》和《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规范 GA/T 850—2016》等文件规定了残疾人停车位尺寸(宽度应不小于为 3.7 m,其中轮椅通道宽度不小于 1.2 m),规定了停车位数量需占公共停车泊位数的 2.0%以上。然而,在残疾人停车位设置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停车位尺寸不达标,残疾人停车位占总停车位的比率也往往低于国家标准。

(六)其他问题

老城区部分残疾人停车位因常年没有维护修理,停车线和地面标示早已模糊不清,导致经常被误认为是普通停车位,被健康驾驶者违章占用;多数残疾人停车位标志标示缺失。全市许多大型商场的停车位只有地面轮椅残疾人标示,没有竖直标识牌。部分停车位仅在地面显示残疾人停车专用字样,并未设置国际标准通用的地面轮椅残疾人图案的标志标示。

二、城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残疾人停车位设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中国城市无障碍交通体系的发展,明确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影响因素是建立无障碍交通体系的初步要求,也是研究与构建科学、合理的模型的前提条件。根据上文提到的杭州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城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潜在影响因素归纳如下:

(一)目的地吸引指数

残疾人停车位的使用与目的地吸引有着直接关系。目的地吸引力的高低主要由目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与机动车行驶距离所决定。根据李小建等提到的“购物中心市场区分析方法理论”^[10],目的地吸引力与目的地使用用途成正比,与行驶距离成反比,则目的地吸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P_{ij} = \frac{M_j/d_{ij}^b}{\sum_{j=1}^m M_j/d_{ij}^b} \quad (1)$$

其中: P_{ij} 为目的地吸引指数,即小区*i*出行者到目的地*j*的出行概率; M_j 为目的地*j*的影响因子,主

要包括工作需求影响、购物需求影响、休闲需求影响、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 d_{ij} 为出行地到目的地的距离, b 为距离摩擦系数, m 为目的地数量。目的地吸引指数 P_{ij} 直接反映了出行者选择目的地的可能性高低。该指数越高,表明残疾人选择该目的地的可能性越高,即残疾人使用残疾人停车位的概率也将越高。

(二)违规占用次数

理论上讲,残疾人停车位使用与正常占用次数成正比关系,与违规占用(如健康驾驶者占用)次数成反比关系。残疾人合理使用该残疾人停车位次数越多,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也将越高;健康驾驶员违规使用残疾人停车位次数越多,将导致残疾人达到停车位后无法正常停车,使用停车位机会下降,停车位使用率也将降低。因此,违规占用次数可视为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一个潜在因素。

(三)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

残疾人行动不便,因此如果能够缩短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则该停车位的使用率可能将会增加。因此,本研究也把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作为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一个潜在因素,并假设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越近,使用该停车位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四)附近高峰时段车流量

目的地附近高峰时段车流量 pcu/h (pcu 为换算标准车辆数; h 为观测交通量时间,单位小时)大小直接反映到达或通过该地区的机动车流量大小。车流量越大,表明该地区的停车位需求可能越高;车流量越小,则表明该地区的停车位需求可能也就越低。残疾人停车位使用需求与地区停车位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与目的地附近高峰时段车流量存在相关性^[11]。高峰时段车流量可采用一天的早晚两个高峰期(例如早上 7:00—9:00;下午 4:00—6:00)数据进行测量,并取其平均值^[12]。

(五)残疾人停车位宽度与数量标准

残疾人停车位宽度尺寸是否符合规范 3.7 m 的标准和残疾人停车位占总停车位比例是否为 2.0%作为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潜在因素。

(六)标志标示

残疾人停车位标志标示主要包括两种:轮椅残疾人地面标示和竖直警示标示牌。在本研究中将地面和竖直标志标示设置配备是否齐全、设置是否明显作为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一个潜在因素。

(七) 外人协助

许多商场、医院等服务设施配备了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在残疾人停车位处协助残疾人士乘降,这不仅将有利于提高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和周转率,同时也将大大吸引残疾人士使用该地区的服务设施。因此,是否配备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协助也是一个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潜在因素。

(八) 停车费用

与国外免费使用残疾人停车位不同^[6-7, 13],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相关法律法规。尽管城市部分公共残疾人停车位免费对外开放,但在更多场合下,残疾人士在使用残疾人停车位时,和健康者使用普通公共停车位一样,需要缴纳停车费用。

停车位的停车费用设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公共停车位的使用率。安实等^[14]通过建立停车收费经济效益分析定价模型,指出收取停车费用将大大影响停车位使用率,且收费标准越高,停车位使用率越低。因此,本研究假设是否设置停车位的停车费用将是影响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另一个潜在因素。

三、数据来源

(一) 目的地吸引指数

由上文所知,目的地吸引指数由目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与行驶距离所决定。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杭州市区常驻残疾人群,研究目的地为市区40个大型公共停车场的残疾人停车位,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地均分布在同一区域内,因此本文可以忽略行驶距离对目的地吸引指数的影响,目的地吸引指数实际上简化为由目的地公共服务水平因素影响指数。

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由残疾人群对市区40个大型公共停车场的残疾人停车位(在城中、城东、城南、城北地区各选取了10个点;因西湖风景区在城西,可能残疾人停车位设置具有特殊性,会对统计数据有影响,因此本文没有考虑城西地区的停车位)的工作需求影响、购物需求影响、休闲需求影响,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进行打分。打分分值采用标准10分制:1分(非常差)至10分(非常好)。在指数统计阶段,先将所有问卷调查对象对于城区40个残疾人停车位的五个指标点评分数值求其算数平均值,然后在再对这五个指标点求取算数平均值,从而最终求得40个残疾人停车位的吸引指数。

研究小组于2018年7月,通过杭州市残疾人联

合会提供的信息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随机向500名杭州市区常驻残疾人士投放调查问卷。在删除明显数据缺失和存在错误的问卷基础上,共回收有效问卷467份,有效回收率为93.4%。在有效问卷中,男性占57.6%($n=269$),女性占42.4%($n=198$)。所有问卷受访人员年龄均为18周岁以上。

(二) 其他数据

研究小组在通过对40个残疾人停车位的进行两个月(7—8月)共计60天的现场观测调查,获取了以下数据:a)残疾人停车位正常使用率(次/天)^①,b)60天每个停车位的总违规占用次数。

每个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的距离由GPS测距仪求出;高峰时段周边车流量通过调取当地交警部门7—8月交通流量数据获得;每个残疾人停车位尺寸和残疾人停车位占总停车位比例、标志标示是否齐全明了由调查人员当场测量、观测确定;是否有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协助乘降、是否收取停车费用等信息从停车位所属单位或商场获取。

四、模型构建

由于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与大部分的潜在影响因素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描述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的依存关系,建立模型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beta_3 X_{3i} + \beta_4 X_{4i} + \beta_5 X_{5i} + \beta_6 X_{6i} + \beta_7 X_{7i} + \beta_8 X_{8i} + \beta_9 X_{9i} \quad (2)$$

其中: Y_i 为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 β_0 为随机误差项(常数项),包括模型中未包含的其他变量影响及随机误差; $\beta_1—\beta_9$ 为自变量回归系数, X_{1i} 为目的地吸引指数, X_{2i} 为违章占用次数, X_{3i} 为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 X_{4i} 为附近高峰时段机动车流量, X_{5i} 为残疾人停车位尺寸是否标准, X_{6i} 为残疾人停车位占总停车位比率, X_{7i} 为标志标示是否齐全、醒目, X_{8i} 为是否有外人协助, X_{9i} 为是否有停车费用产生。目的地吸引指数、违章占用次数、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附近高峰时段车流量和残疾人停车位占总停车位比率为连续变量;残疾人停车位尺寸是否标准、标志标示是否明显、是否有外人协助和停车费用为虚拟变量。

① 残疾人停车位正常使用率:当使用残疾人停车位连续超过5 min,视为使用1次。研究小组统计了每个残疾人停车位每天被正常使用的次数,并求其算数平均值。此算数平均值即为残疾人停车位正常使用率。

五、结果及分析

(一)目的地吸引指数

城市残疾人停车位目的地吸引指数分布统计见表1。课题组将停车位目的地吸引指数(由五个因素的算数平均值求得)分为三类:大于等于7.0(吸

引力较高),介于4.0到7.0之间(吸引力中)和小于等于4.0(吸引力较低)。由表1可见,吸引指数大于等于7.0的城中地区的残疾人停车位多达7处,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城南、城东地区(残疾人停车位分别为3处和1处)。城北地区排最后,所有停车位的吸引指数均小于7.0。

表1 目的地吸引指数分布统计

地点	目的地编号	工作需求因素	购物需求因素	休闲需求因素	文化因素	环境因素	目的地吸引指数
城中地区	A1	7	8	8	10	7	8.0
	A2	4	5	7	7	6	5.8
	A3	6	7	7	8	7	7.0
	A4	8	10	7	7	7	7.8
	A5	7	10	7	8	10	8.4
	A6	10	6	6	7	8	7.4
	A7	7	7	6	7	7	6.8
	A8	6	7	7	6	5	6.2
	A9	6	9	8	7	7	7.4
	A10	10	7	7	9	8	8.2
城东地区	B1	7	3	5	6	5	5.2
	B2	4	7	6	7	6	6.0
	B3	8	4	4	5	4	5.0
	B4	7	4	4	6	6	5.4
	B5	4	4	7	4	5	4.8
	B6	8	7	6	7	7	7.0
	B7	4	4	7	6	5	5.2
	B8	7	4	4	5	6	5.2
	B9	7	4	4	5	5	5.0
	B10	3	4	4	5	5	4.2
城南地区	C1	8	5	5	9	9	7.2
	C2	9	6	6	8	8	7.4
	C3	6	7	7	7	8	7.0
	C4	5	8	7	6	7	6.6
	C5	8	4	4	5	5	5.2
	C6	5	5	6	5	5	5.2
	C7	3	3	7	6	4	4.6
	C8	7	5	6	7	6	6.2
	C9	7	6	6	6	6	6.2
	C10	3	3	8	7	4	5.0
城北地区	D1	8	4	6	6	7	6.2
	D2	3	10	5	7	9	6.8
	D3	7	6	7	3	5	5.6
	D4	4	7	6	6	6	5.8
	D5	10	5	6	5	7	6.6
	D6	2	2	4	3	8	3.8
	D7	3	7	4	6	4	4.8
	D8	1	2	3	3	8	3.4
	D9	4	4	5	5	6	4.8
	D10	5	7	7	6	7	6.4

(二)数据统计

40 个残疾人停车位的各项基本数据统计见表 2。课题组将停车位使用率分为两类：大于等于 6.0 次/d(使用率较高)和小于 6.0 次/d(使用率较低)。由表 2 可见,使用率较高的残疾人停车位在城中地区最多(共有 6 处),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城南地区和城北地区分别有 2 处和 1 处;城东地区的残疾人停车位的使用率均低于 6.0 次/d。较低的残疾人停车

位使用率间接反映了杭州残疾人停车位现阶段并没有发挥出最大效用。

通过表 2 发现,观测到使用率较高的残疾人停车位往往与目的地入口距离较短;使用率较高的残疾人停车位的目的地吸引指数的较高;同时,使用率较高的残疾人停车位附近车流量的也较大。其他因素与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的关系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规律。

表 2 各项基本数据统计

地点	目的地编号	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率/(次·d ⁻¹)	违章使用次数/次	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m	附近车流量/(辆·h ⁻¹)	残疾人停车位所占比率/%	目的地吸引指数	停车位尺寸是否标准	标志标示是否齐全清晰	乘降是否有外人协助	停车是否收费
城中地区	A1	7.1	708	46	4178	3.0	8.0	Yes	Yes	No	No
	A2	4.2	297	80	2543	0.5	5.8	Yes	Yes	No	No
	A3	5.4	479	61	2912	1.0	7.0	Yes	Yes	No	Yes
	A4	6.5	495	55	3650	1.0	7.8	Yes	Yes	No	No
	A5	8.2	761	39	4472	2.0	8.4	Yes	Yes	Yes	Yes
	A6	6.7	541	61	2598	2.0	7.4	Yes	Yes	Yes	No
	A7	5.4	452	73	2877	0.5	6.8	Yes	Yes	No	No
	A8	4.3	387	90	2732	1.0	6.2	Yes	Yes	No	No
	A9	6.7	581	55	3575	2.0	7.4	Yes	Yes	No	No
	A10	7.3	763	48	4331	2.0	8.2	No	No	No	No
城东地区	B1	3.2	309	105	1845	1.5	5.2	Yes	Yes	No	Yes
	B2	4.0	365	91	2488	2.0	6.0	Yes	Yes	No	No
	B3	2.5	281	135	1456	1.0	5.0	Yes	Yes	No	No
	B4	3.3	295	95	1750	3.0	5.4	Yes	Yes	No	Yes
	B5	1.9	176	143	721	2.0	4.8	Yes	Yes	Yes	No
	B6	5.3	455	74	2815	2.5	7.0	Yes	Yes	No	No
	B7	2.8	224	112	1106	1.0	5.2	Yes	Yes	No	No
	B8	3.2	295	108	1680	1.0	5.2	Yes	Yes	No	No
	B9	2.8	270	122	1332	0.5	5.0	Yes	Yes	Yes	Yes
	B10	0.7	69	148	788	2.0	4.2	No	No	No	No
城南地区	C1	6.3	547	45	3245	1.0	7.2	Yes	Yes	No	Yes
	C2	7.1	698	38	3973	1.5	7.4	Yes	Yes	No	No
	C3	5.6	421	60	2669	2.0	7.0	Yes	Yes	No	Yes
	C4	5.2	395	62	1744	2.0	6.6	Yes	Yes	No	No
	C5	2.6	233	103	978	2.0	5.2	Yes	Yes	No	No
	C6	3.7	280	91	1437	1.5	5.2	No	Yes	No	No
	C7	1.2	98	125	692	1.0	4.6	Yes	Yes	No	No
	C8	3.4	289	74	1250	2.0	6.2	Yes	No	No	No
	C9	4.5	415	69	2726	3.0	6.2	Yes	Yes	No	No
	C10	2.4	197	95	971	2.0	5.0	No	Yes	No	No
城北地区	D1	5.0	504	61	2467	1.5	6.2	Yes	Yes	No	Yes
	D2	7.2	714	53	4085	1.0	6.8	Yes	Yes	Yes	Yes
	D3	2.3	181	105	1452	1.0	5.6	Yes	Yes	No	No
	D4	2.4	226	93	1589	2.0	5.8	Yes	Yes	No	No
	D5	3.9	401	74	2010	2.0	6.6	Yes	Yes	No	No
	D6	0.8	91	148	593	0.5	3.8	No	Yes	No	No
	D7	1.7	185	122	975	1.0	4.8	Yes	Yes	No	No
	D8	0.4	95	158	513	2.0	3.4	Yes	No	No	Yes
	D9	1.6	212	96	881	2.0	4.8	No	Yes	No	Yes
	D10	4.1	370	63	2274	2.0	6.4	Yes	Yes	No	No

(三)线性模型结果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 SPSS 21 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统计和分析。表 3 为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回归模型 5 的拟合效果最好($R^2=0.977$)。模型假设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停车位使用率”建立的线性关系回归模型具有较为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显著性 $P<0.01$)。

表 3 中自变量“违章使用次数”“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和“目的地吸引指数”的回归系数的 P 值均小于 0.05, 即自变量“违章使用次数”“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目的地吸引指数”与因变量“停车位使用率”呈线性关系, 且较为显著。三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系数 $Beta$ 值分别为 0.407、-0.207 和 0.244。该结果表明违章使用次数对停车位使用的影响性最大; 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对停车位使

用存在反向作用, 即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的距离越远, 负向影响越大。此外, “违章使用次数”因素为主要影响因素并未在外国文献提及, 这也暗示了国内残疾人停车位违章占用存在一定的普遍性, 政府部门须加大力度保障残疾人停车位的正常合法使用。

其他自变量诸如“附近车流量”“残疾人停车位所占比率”“停车位尺寸是否标准”“标志标示是否齐全清晰”“乘降是否有外人协助”“停车是否收费”的 P 值均大于 0.05, 未显示出显著关系。“标志标示是否齐全清晰”因素在外国文献被认为是重要影响因素, 但未在本研究发现。这可能是许多国人对残疾人停车标志标示含义尚不了解有关。该结果也表明了国内外的残疾人停车位的使用影响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违章使用次数/次	0.008**	0.006**	0.006**	0.005**	0.004**
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m	-0.019**	-0.019**	-0.010**	-0.012*	-0.013*
附近车流量/($pcu \cdot h^{-1}$)		0.000	0.000	0.000	0.000
残疾人停车位所占比率/%		0.132	0.155	0.119	0.119
目的地吸引指数			0.483**	0.458*	0.416*
停车位尺寸是否标准			0.122	0.038	0.052
标志标示是否齐全清晰				0.146	0.133
乘降是否有外人协助				0.381	0.408
停车是否收费					-0.065
常数	2.810**	3.007**	2.921**	2.470**	2.243**
R^2	0.961	0.966	0.974	0.975	0.977
F	456.675	251.694	203.025	163.869	141.837

注: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01$ 。

(四)模型检验

图 1 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标准化残差直方图。从图 1 来看, 左右两侧并不完全对称, 但从分布总体趋势来看, 可认为呈现正态分布。图 2 显示了回归标准化残差的 P-P 图。从图中散点分布来看, 并没有完全与斜线重合, 因此并不完美。但在现实分析当中, 理想状态的正态并不多见, 接近或近似即可考虑接受。

最后, 对模型残差独立性进行检验。Durbin-Watson 值为 1.661, 通过查询 Durbin Watson 表发现本研究回归分析的 Durbin-Watson 值恰好出在无自相关性的值域之中, 认定残差独立, 模型通过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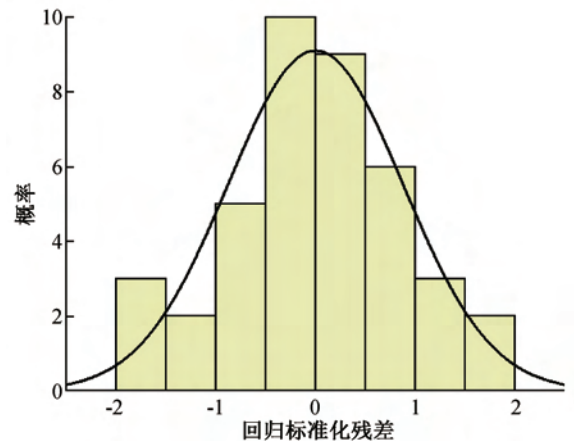


图 1 标准化残差直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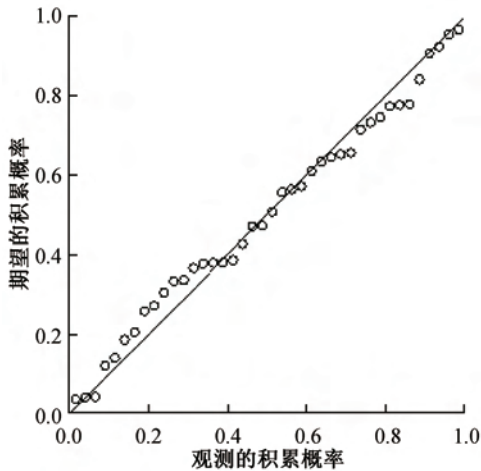


图2 回归标准化残差的P-P图

六、结 论

本文对杭州市残疾人停车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目的地吸引力、违规占用次数、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等因素为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的潜在影响因素。根据市区残疾人停车位设置的实地调研和观测,本文建立了以停车位使用率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求解与分析发现,自变量违章使用次数、停车位与目的地入口距离、目的地吸引指数与停车位使用率具有显著关系。其中违章使用次数因素的影响作用最大。其余自变量诸如附近车流量、残疾人停车位所占比率、停车位尺寸是否标准、标志标示是否齐全清晰、乘降是否有外人协助和停车是否收费均未显示出显著关系。最终本文通过对检验图和残差独立性进行分析,检验了模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有着较好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该模型易于理解,且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为城市规划学者与决策者制定科学合理的无障碍停车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主要针对杭州市城区残疾人停车位进行影响因素研究,在后期研究中将增加国内其他城市的停车位样本进行研究,以期增加结论的普适性。另外,本文并未从残疾人自身需求角度(例如残疾等级、身高体重等因素)对停车位的使用进行分析,下一阶段可通过建立基于个人社会和出行特征的逻辑回归模型与本文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和修正,这也将是完善本研究的一个潜在方向。

参考文献:

- [1]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残联发(2018)24号][A/OL]. (2017-12-30)[2018-06-01]. http://www.cdpf.org.cn/zcwj/zxwj/t20180426_625574.shtml.
- [2] 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杭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杭发改规划[2016]280号][A/OL]. (2016-08-02)[2018-06-01].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17/1/20/art_1256297_5294590.html.
- [3] Paul C, James E. Handicapped parking supply[J].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Journal, 1988, 58(6): 57-60.
- [4] Fletcher D. Illegal parking in spaces reserved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1996, 8(2): 151-159.
- [5] Cope J G, Allred L J. Community intervention to deter illegal parking in spaces reserved for the physically disabled[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013, 24(4): 687-693.
- [6] Kiyota M, Ishibashi K, Inohae T, et al. Making a new design concept of disabled parking considering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for able-bodied drivers[J]. Journal of the City Planning Institute in Japan, 2016, 51(3): 1213-1219.
- [7] Lu W, Vandebona U, Kiyota M. Analysis of experience with formalizing handicapped parking system[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Psychology & Behaviour, 2014, 26(26): 62-71.
- [8] 姜健,程文,李天扬. 科学规划引导下的残疾人停车位建设初探:以哈尔滨主城区为例[C]//2013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青岛:城市道路与交通规划, 2013: 1-14.
- [9] 陆维特,杨云芳,张春勤,等. 残疾人停车位认识度及标志标示对停车行为影响[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17, 38(3): 257-263.
- [10] 李小建,李国平,曾刚. 经济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336-337.
- [11] 谢莹,程宝洁,董凯,等. 基于用地的停车需求预测模型研究[J]. 交通运输研究, 2014, 19(42): 13-18.
- [12] 王伟,过秀成,等. 交通工程学[M]. 2版.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44-45.
- [13] Nishidate A, Mizuno T, Tokuda K. Clar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for promoting proper use of parking spaces reserved for persons with handicaps[J].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ffic and Safety Sciences Review, 2005, 29(4): 296-302.
- [14] 安实,马天超,尹缙瑞. 我国城市停车收费定价模型研究[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0, 32(2): 65-69.



当代汉语新词语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的范畴化

赵艳梅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前空型表人词语模”是一种造词能力强大的结构,从当代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它应属于范畴中的基本层次范畴。近十年来,“X族”“X客”“X男”“X哥”“X控”等前空型表人词语模已经成为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根据这些典型成员模标的语义特点和模槽的聚合功能,可从以往类似研究中未曾尝试的角度,即泛指性、关系性、隐喻性,对其进行分类探讨。同时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改变,这些典型成员也是可以“转移”的。

关键词: 范畴化; 认知; 前空型表人词语模; 新词语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8-0360-08

Categorization of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in modern Chinese

ZHAO Yanmei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is a kind of structure with powerful word-building capacity. We analyz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It should belong to the basic level category. In recent ten years, "X-zu" "X-ke" "X-nan" "X-ge" "X-kong" and other front-empty-type patterns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have become the typical members of this category.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pattern markers of these typical members and the aggregation function of pattern cavities, they were classified and discussed from generic, relational and metaphorical aspects, which has not yet been tried in previous similar studies. But we should also be realiz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people's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se typical members can be transferred.

Key words: categorization; cognition; front-empty-type pattern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noting person; new words

在现今这个彰显自我、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总体人群的显著特征就是族群化,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小族群用代码固定下来,便形成了以语言为表征的“人以群分”。在表人词语群中,有部分词语群得益于“词语模”对这些各具特点的人群的描写和固化作用。

“词语模”是李宇明^[1]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具有造词功能的框架,由不变的“模标”和中空的“模槽”两部分组成。在前空型表人词语模(简称“前空表人模”)中,“模标”是每个小族群的共同特征,“模槽”是其区别性特征,族群之间通过“模标”相区别,通过“模群”相联

系,族群内部通过“模槽”相区别,通过“模标”相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表人词语模网络。在认知视角下,它们之间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在词语模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认知角度进行的探讨很多,但多集中于隐喻转喻、概念整合、意象图示、句式语法,较少涉及到范畴。具体到表人模,一般是对个体模的认知研究,鲜少涉及模群。因此本文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基于当代认知语言学对范畴的基本认识,对近年产生的“X族”“X客”“X男”“X哥”“X控”等十个典型前空表人模进行分类探讨。

一、前空表人模的构词概况

类推是词语模的形成方式和运作机制。词语模的基式是一簇词语,从历时观点来看,词语簇的产生具有“时段”性,是语用主体有意或无意通过“类推”不断创造具有相同模式词语的过程,最后逐渐达到一种“约定俗成”,模式识别最终完成;从共时角度来

看,模式从基式中概括和析取出来后,语用主体有意依据模式通过“类推”快速、批量生产新词语,这种词语群的形成具有“时点”性。因此,可以说词语模的形成是“弱意识”类推的结果,词语模的运作按照“强意识”的类推原则。

词语模类推造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个同义类的大“模群”,和一个个以“模标”为标记特征的小“族群”。本文选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侯敏、周荐等编著的《汉语新词语》2009—2016年的年度新词语(正文部分词条)为语料。据统计,这8年产生新词语(包括新义和新用法)共计4024条,其中表人词语共958条,占新词语总数的23.81%,接近四分之一,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构词理念。其中“X族”“X哥”“X客”“X男”“X女”“X帝”“X姐”“X奴”“X控”“X二代”十个前空表人模构造的词语共计451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47.08%。2019—2016年这十个词语模的造词情况见表1。

表1 “X族”等十个前空型表人词语模构成新词语的数量概况(2009—2016年)

年份	词语模数/个										合计
	X族	X哥	X女	X男	X客	X二代	X帝	X奴	X控	X姐	
2009	60	1	15	14	6	9	0	2	0	1	108
2010	56	22	9	11	8	8	7	9	4	4	138
2011	31	30	6	2	4	6	5	0	4	2	90
2012	12	8	3	4	3	1	0	1	2	2	36
2013	24	2	4	3	2	0	2	0	0	0	37
2014	14	0	1	3	1	1	0	0	1	0	21
2015	7	1	0	0	5	1	1	0	1	0	16
2016	3	0	0	0	1	1	0	0	0	0	5
合计	207	64	38	37	30	27	15	12	12	9	451

分析表1可知:从横向来看,2009—2016年“X族”词语模的产量最高,8年共计产生新词语207条,其次是“X哥”“X女”“X男”等;从纵向来看,2009—2011年总产量较高,其后年份总产量出现较大下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X族”“X客”外,其余的表人模在某些年份造词上都出现了空缺;除了2010年外,其他年份某些表人模的造词也都出现了空缺。其原因总结起来有三:一是某些表人模的造词能力还没开始显露,如“X帝”“X控”在2009年造词空缺;二是一些表人模的造词能力由于其他模式的分摊、新兴模式的出现、语用主体关注度的改变而呈现不同程度的消减,如“X奴”“X姐”的造词均在2013—2016年出现了空缺,2016年模式造词空缺最大;三是因为选取模式的时段问题,不能反映其造词的全貌,但“窥一斑可见全身”,“点”也可以反映“面”的某些特质。

二、范畴理论视角下的前空表人模分析

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对世界万物的概念归类,当然这种归类既取决于事物的客观特征,又有赖于人的主观感知,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就是范畴形式化的结果,也是对各种事物范畴化的工具。

Ungerer和Schmid在范畴化的具体探讨中,提出了两种范畴化方式^[2]:原型参照方式和家族相似性参照方式。以原型为参照要注意基本层次范畴成员应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即属性特征和外形特征。也就是说这些成员应属性相同,外形相似,其中的典型成员不仅共同属性最多,而且外形上应更具代表性。以家族相似性为参照是相对上位范畴而言的,建立基础是组成它的基本层次范畴之间具有相似性。综上可知,基本层次范畴是原型范畴,上位范畴是家族相似性范畴。

(一)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

根据 Ungerer 和 Schmid 的观点^[2],本文所讨论的前空表人模属于一个大的基本层次范畴,因为模标成分的固有性和位置的固定性,“X族”“X哥”“X男”“X女”“X二代”“X客”“X帝”“X奴”“X姐”“X控”“X粉”“X领”“X爷”“X叔”“X替”“X漂”“X妹”“X妈(妈妈)”“X爸(爸爸)”“X宅”“X霸”“X奶奶”“X人”“X民”“X员”“X师”“X一代”“X党”“X派”“X工”“X军”“X手”“X模”等是表达该层次的词语,即“基本层次词”,“族”“哥”“女”“男”“二代”“客”“帝”“奴”“姐”“控”“粉”“领”“爷”“叔”“替”“漂”“妹”“妈(妈妈)”“爸(爸爸)”“宅”“霸”“奶奶”“人”“民”“员”“师”“一代”“党”“派”“工”“军”“手”“模”等是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身份标记”,是“形形色色的‘人’”,这些前空表人模之间拥有很多共同的语义属性,即共同的语义特征。根据邵敬敏等^[3]对语义特征所作的分类,以上这些前空表人模基本范畴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自然性语义特征和组合性语义特征。自然性语义特征是从最基本的概念、逻辑意义分解出来的,它是语义特征的主体,数量多且杂。基于词语模是对基式的抽象和概括,一经产生便具有定型性,即“能够标示模标成分与模槽成分的性质”,“还制约着所生成词语的语义走向”^[4],因此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自然性语义特征表现在[+具体]、[+可感知]、[+生命]等多方面,而且从理论上说这种列举是无限的;而所说的组合性语义特征,是指影响到“模标”和“模槽”搭配的语义特征,即“能够限定模标成分与模槽成分的位置”且“制约所生成词语的语法性能和结构关系”^[4],因此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成员的组合语义特征是[+模标后置]、[+名词性]、[+定中结构]等。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具有相当多的共同属性,且在“外形”上相似,可以把这种“外形”理解成“形式的”和“语义的”,形式上都是“X+N”的定中结构,语义上都是“具有各色特点的人”。因此从属性特征和格式塔特征来看,可以把前面列举的所有“X+N”式前空表人模界定为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

(二)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

依据前述 Ungerer 和 Schmid 的观点,原型理论中的原型既可以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也可以是从范畴成员中概括出来的图式^[2]。在对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的分析中,本文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即认为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能够

很自然地成为范畴化的原型,也就是认知参照点。这里所探讨的原型主要是在基本层次范畴上起作用,属于“世界上本身就存在的事物”,而非“人们创造的事物”的原型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范畴化的原型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人们的认知机制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中,成员的典型性在不断发生变化。各式各样的“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这是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但对各种“人”的归类因此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人们认知上的改变,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以语言为表征。反映在前空表人模的基本层次范畴中,“X人”“X民”等本应是其中的典型成员,这是由模标“人”和“民”的语义特征决定的。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的释义(取基本义或常用义)为:“人,指某种身份或职业的人”^{[5]1096},”民,指某种人”^{[5]908}。它们的语义所指宽泛,语义等级不明显,是最接近于科学定义上“人”的语义特征的模标。因此从历时来看,“X人”“X民”等都是比较古老的词语模,早已有之。凭此模式产生的词语确实也相当多。在《汉语大词典》中,“X人”词语有1100余个,“X民”词语有300余个,如“官人”“匠人”“商人”“见证人”“边缘人”“草民”“顺民”“游民”“渔民”“烟民”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发展至今,以“人”“民”等为后置模标构成的新词语大量减少,虽然以它们为后置模标仍构造了一些新词语,但已经不足以触发人们的认知,这些词语辨识度已经不高,未被当作新词语,因此从2009—2016年《汉语新词语》年编收词情况来看,此类新词语的条目很少,如只收录了“养卡人”“状态人”“煎饼人”“矮星人”“微民”“学民”“核灾民”等,而“X族”“X客”“X哥”“X男”“X女”等已经逐渐取旧有词语模而代之。

至此,笔者注意到原型理论在认识论方面对语义范畴的解释力问题。原型理论认为,原型成员通常具有认知上的凸显性,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从原型成员到非原型成员,其凸显性等级呈递减趋势^[6],但这是“对语义范畴的理性内容的忽视”^[7]。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在范畴中,典型性不是决定认知凸显的唯一原因,新奇性、多元性、经济性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会出现“典型转移”。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知焦点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表现在语言中,人们会用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词语把客观存在的某类事物或正在发生的某种现象纳入到某个已经存在的范畴中来。这个范畴中的原“典型成员”退居次位,耳目一新的“非

典型成员”跃居主位,“典型”发生了转移。至于这种转移的时效性问题,要依据社会文化条件和人们的主观心理而定。所以吴世雄等^[8]认为语义范畴的原型应有其文化基础,即语义范畴的原型分析应结合语义范畴演变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同时现代范畴理论也认为,范畴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对主观心理意愿的满足”^[9]。

因此,在前空表人模构成的词语中,“X族”“X哥”类词语明显增多,这是社会文化因素和人们认知心理在前空表人模原型范畴起作用的结果。新的事物和现象不断涌现,它们各自彰显自己的特点,而对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如果还是用原来的模标标记身份的话,这些特点的独特性、新奇性等就无从表达,因此要“推陈出新”。于是就出现了表1中所列出的近几年使用较频繁的十个前空表人模,它们也就成为了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

三、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典型成员的特点分析

表1所列出的前空表人模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成员,并非认知随意性的结果,而是由其模标语的特征性和模槽功能的聚合性决定的。对这些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典型成员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泛指性

从表1中可以看出,“X族”类词语最多,与其类似的还有“X客”,以二者为模式构成的新词语达到了237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24.74%,其造词能力之强不可小觑。究其原因,二者处于“典型转移”的中间地带,语义表现上既有“传统风范”又不失“现代气息”,这是由模标“族”“客”的身份特点和二者模槽的聚合功能决定的。

首先,从模标“族”“客”的特点来说,二者在指“人”的意义上都具有群指性,而且都经历了一个泛化的过程。“族”是一个来自日语汉源词的模标,其表人性在《现汉》中的释义是:“①家族;③种族;⑤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5]1749}。从中可以看出“族”的语义经历了“具有较近的血缘关系①→具有较远的亲缘关系③→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特征⑤”这样一个语义逐渐泛化的过程,“族”的内涵越来越小,外延越来越大。所以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追星族”以来,以“X族”为词语模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词语,仅从8年的统计语料中就发现了207条“族”类新词语。而“客”是一个英源性的音节语素化模标,来自于英文“hacker”的音译“黑

客”,以后在类推的过程中,又逐渐加入了意译的成分,“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呼”^{[5]741}。这样,汉语引入后固定下来便成为前空表人模“X客”,依据此模式创造的汉语新词语就形成了一个“客”族群,指具有各种行为特点的人,“客”就成为了这个族群的身份标记,意义越来越空灵。从8年的统计语料中,可以找出30条“X客”类新词语,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不及“族”类新词语,但二者作为模标的共同语义特征最为接近,都表示具有某种特点的人,而且从来源上说,都是外源性模标,本身很新奇,传入本土后又具有了地方特征。综上分析,可以表明为何以二者为模标构成的前空表人模具有很高的能产性,“X族”“X客”也成为“典型转移”的重点前空表人模。

其次,从模槽“X”的聚合功能来看,因为“族”和“客”都是名词性模标,因此形成的词语模必定是名词性的,是“X+族/客”式的定中结构,其中“X”起修饰限制作用,无论它是动词、名词还是形容词,其语法功能都相同,这也是模槽聚合功能的第一点体现。模槽聚合功能的第二点体现是其中各个成分深层语义的相关性上,它们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或特征,可以互相替换,聚合成群。以表1的207条“X族”新词语为例,“X”为动词性的有137条,“X”为名词性的有60条,“X”为形容词性的有10条。具体举例分析如下:

动词性“X”。

a)突出行为动作的对象,如爱鲜族(喜爱新鲜食品)、抄号族(抄下商品的货号)、出海族(走出上海)、嫁碗族(嫁给公务员)、啃嫩族(依赖子女)、淘港族(购买港产的货物)、恐二族(害怕生二胎)、隐贷族(隐瞒助学贷款)、恐聚族(害怕聚会)、退盐族(退掉食盐)、抢包族(抢红包)、未富先奢族(没有富起来而购买奢侈品)等。

b)突出行为动作的方式,如鬼旋族(像鬼一样在外逗留)、秒杀族(在极短时间内拍下货品)、男就族(依靠男朋友就业)、蚁居族(像蚂蚁一样聚居)、全漂族(完全在外漂泊)、海囤族(海量囤货)、年清族(在过年时花光积蓄)、网课族(在网上听课)、自给族(自己供给)、月光退休族(每月花光退休工资)等。

c)突出行为动作的重点,如刷刷族(刷分)、团团族(团购)、囤囤族(囤货)、装装族(装出某种状态)等。

名词性“X”。

a)某种生活状态,如蚁族(生活状态如蚂蚁一样)、蜂族(生活状态如蜜蜂一样)、草族(物欲如草一

样)、柜族(居住在集装箱里)、锚族(子女如锚一样)、电茧族(网络编织的茧)、婚活族(以结婚为目的的各种活动)、密码族(热衷于各种密码)、时彩族(热衷于买彩票)、车车族(用汽车后备箱卖东西)等。

b)某种性格或心理,如榴莲族(职场中里香外臭)、刹那族(重视每一个瞬间的价值)、摆婚族(摇摆的婚约)、斑马族(生活要求简单)、花草族(职场中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脉客族(善于利用人脉)等。

c)某种“人”,如换客族(在网上交换技能的人)、虚客族(只看不买的人)、房托族(从房产交易中获利的人)、财盲族(缺乏理财常识的人)、工漂族(四处漂泊的农民工)等,因为“客、托、盲、漂”等已有虚化倾向,以它们为模标已经构建了一批表人词语模。

d)某种事物谐音,如庐舍族(loser)、麻豆族(model)、考拉族(koala)、汉堡族(hamburger)、3A族(爱情、家庭、事业都达到最高一级)、BMW族(bus、metro、walk,指乘公交车、地铁或步行上下班)、围脖族(微博)等。

形容词性“X”。

a)突出某种状态的特点,如孤族(孤独的)、准老族(即将跨入老年的)、安安族(追求食品安全的)等。

b)突出某种性格、行为的特点,如:死扣族(极其抠门的)、恼火族(因为节假日开支大而烦恼、生气的)、扣扣族(注重节俭的,“扣”是“抠”的谐音)等。

因为“X客”与“X族”的语法结构关系类似,此不另论“X客”。综上所述,“X族”中模槽“X”的结构关系和语义特点非常复杂,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X”与“族”的组配能力非常强,几乎可以说只要有某方面特点的人,都可以用“X族”来指称,这也形成了“X族”极强的造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有爆发性的特点,因此短短几年中产生了如此多的“X族”新词语,也成为“典型转移”的重点。

(二)关系性

这里所说的“关系”,是基于表1中前空表人模模标的语义特点而言的,可以分为“对应关系”和“预设关系”。根据语义特点的不同,又可把具有对应关系的模标细分为“性别对应关系”和“亲属称谓对应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 性别对应关系——“X男”和“X女”

从词性上来说,模标“男”和“女”在《现汉》中被标注为属性词,只能充当修饰限制性成分。但从词语模的角度看,“男”和“女”作为模标,表示“某一类男性”和“某一类女性”,已经充当了定中结构的中心语。从语义角度看,“男”和“女”这两个模标都属名

词性,语义比较实在,但二者的内涵和以前相比却有了很大不同。

以“X男”为例。严格来说,“X男”是当代汉语中才出现的词语模。从表1中可以看出,8年共产生“X男”新词语37条。模标“男”的语义特征具有群指性,具有特指性的个例极少,37条新词语中只有“戳车男”和“抢车男”两例。从具有修饰限制作用的“X”的语义特征来看,多表示某类男子行为、性格或自身条件方面的特点,一般通过减缩或隐喻构词,语义透明度很低,而且不少具有外源性。根据“X”深层语义的相关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a)某种事物,如便当男(指年轻男性上班时携带的饭盒,源自日本)、“快餐男”(感情来去匆匆)、月亮男(对外人热情,对家人冷淡)、奶瓶男(心理上没有断奶)、灯笼男(打着灯笼也难找)。

b)某种动物,如牛奋男(像牛一样辛苦劳作)、鸡贼男(小气,精于算计,源于北京话)。

c)某种“名号”,如玩具男(取名于韩国20世纪90年代一个流行音乐组合“玩具”)、顺滑男(《我的兄弟叫顺滑》中的男主角)、乙男(日本电视剧《乙男》中的男主角)、余味男(《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男主角)。

d)某种外貌、性格特点,如丑帅男(长相不符合传统审美,但整体感觉很帅)、女子男(穿着打扮像女人)、标配男(认为只结婚不谈恋爱是标准配备)。

e)某种谐音或字母,如贝塔男(音译于希腊字母“β”,表示在“最优、第一”的“α”之后)、阿尔法男(音译“α”,表示各方面条件很好)、极客男(音译于“geek”,智商高、情商低)、4D男(具有多维度特征,“D”指“dimensions”)。

与“X男”相对的就是“X女”,“X女”是早已有之的词语模,在21世纪前比较多见^[4]。然而在近年,“X女”又有发展壮大趋势。从表1中可以看出,8年共产生“X女”族新词语38条,在数量上与后来居上的“X男”族旗鼓相当。因为前面已经讨论了“X男”中模标“男”和模槽“X”的语义特征,而“X女”与其在“某一类人”这一语义场中构成对义关系,所以这里“X女”中“模标”和“模槽”的语义特征不再赘述。但要注意的是,“X男”与“X女”族新词语呈现出互补分布的特点。一种是模槽没有变化而模标有变化,如:三不男/三不女;另一种是模槽与模标都有变化,如:经济适用男/简单方便女、经适男/杠杠女、素养男/单贵女、豪华男/兴盛女。也正是因为模标“男”“女”的性别限制性和相辅相成性,模槽“X”

语义上的隐喻性,使得“X男”“X女”这组对应前空表人模构造的新词语大多指男性或者女性性格、行为、自身条件方面的特点。因此,“X男”“X女”在表人方面不及“X族”“X客”那么广泛,相应的在能产性上也不及后者,但还是可以作为“典型转移”的中坚力量。

2. 亲属称谓对应关系——“X哥”和“X姐”

从语义上来看,二者的模标“哥”“姐”在“亲属称谓”这一语义场中构成对义关系,而且语义都经历了由特指到泛指乃至脱落的过程,即:亲属称谓(表哥、表姐)→类亲属称谓(张哥、张姐)→泛亲属称谓(咆哮哥、咆哮姐)→亲属称谓义脱落(空哥、空姐)^[10]。从两个词语模创造新词语的数量上来看,表1中“X哥”类新词语是64条,“X姐”类新词语是9条,前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究其原因,除了词语出现的时段性原因之外,本文认为还有一种原因不容忽视,即“X嫂”“X妹”等词语模分摊了“X姐”的部分造词能力,而却极少有“X姐夫”“X弟”之类的词语模分摊“X哥”的造词能力,因此导致了在数量上“X姐”类新词语不及“X哥”类新词语。基于此以“X哥”为例来具体分析。

在搜集到的64条“X哥”类新词语中,发现具有特指性的有44条,具有群指性的只有16条,还有4条既可以群指也可以特指。特指性词语占比较高,而模标“哥”的语义演变中只有“亲属称谓”和“类亲属称谓”具有特指性,如果没有亲缘关系,那只能是“类亲属称谓”。这种语义演变中的“逆转”现象可以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中去探寻原因,而模槽“X”正是这种因素的体现。积极的、正能量社会事件中,人们对事件参与者持认可、褒扬的态度,自然想表达更多的敬谢之意,因此只有通过最靠近“亲属称谓”的“类亲属称谓”来实现,如:高考哥、上墙哥、蹭课哥、锦旗哥、垫钱哥、浇水哥、收碗哥、抱抱哥、公益哥、麻袋哥、街净哥等。相较而言,群指性词语中,模标“哥”就是“泛亲属称谓”或“亲属称谓义脱落”,有些甚至是“男性义脱落”,当然也显示出人们对事件参与者的一种或中立或贬抑的态度^[11],如力学哥、励志哥、齐全哥、公交哥、咆哮哥、外语哥、回收哥、U哥、厅哥等。同样的,“X哥”与“X姐”族新词语也呈现互补分布的特点,如动哥/动姐、房哥/房姐、U哥/U姐、淡定哥/淡定姐、犀利哥/犀利姐、笑脸哥/微笑姐。

3. 预设关系——“X二代”

“预设”属于语用学术语,叶蜚声等^[12]认为,句

子传递信息所依赖的、说话者设定为自己与受话者都知道的那些知识就是“预设”。预设属于背景知识,是一种附带信息,这里借用来分析模标“二代”。从表1中可以看出,8年共产生“X二代”新词语27条,“二代”作为前空表人模的模标,说明其是“一代”的下一代,与上一代有血缘关系或继承关系,语义上具有群指性,并且有某种预设性,这种预设性又是和模槽“X”相联系的。因此模槽“X”不仅对模标“二代”起着修饰限制作用,而且也体现了其中各个成分深层语义的相关性。具体分析如下:

a)“一代”具有的某种特点,如单二代、民二代、贫二代、官二代、权二代、名二代、团二代、微富二代、小康二代。

b)“二代”具有的某种特点,如拼二代、房二代、仁二代、新二代、强二代、坑二代。

c)“一代”和“二代”共有的某种特点,如文二代、写二代、笑二代、流二代、漂二代、游二代、导二代、商二代、油二代、垄二代、职二代、喜二代。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代”具有的某种特点,主要是由模槽“X”体现的,它标示着“一代”的生活境遇,也预设着“二代”的成长或生活环境。“二代”具有的某种特点,也是由模槽“X”体现的,它标示着“二代”的生活境遇,也在更深层次上预设着“一代”的生活境遇。“一代”和“二代”共有的某种特点,依然是由模槽“X”体现的,它标示着“一代”和“二代”共同的成长或生活环境,也预设着“一代”和“二代”共同的生活境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X男”“X女”“X哥”“X姐”“X二代”等前空表人模由于模标“男”“女”和“哥”“姐”的语义对称性、性别限制性和称谓限制性,以及模标“二代”在语义上的职业、身份限制性,使得进入模槽的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也必然受到局限,因此此五类前空表人模的新词语产量略逊于“X族”“X客”类前空表人模。

(三) 隐喻性

“隐喻”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现象和语言表达现象,它是“两个相似认知模型之间的‘投射’”。语言中的“隐喻”最常见的就是用—个比较具体的概念隐喻—个比较抽象的概念。^[13]在前空表人模中也存在这种“隐喻”现象,如表1中的“X帝”“X奴”“X控”。其中“帝”和“奴”都是名词性模标。“帝”的表人义在《现汉》中的解释为:a)宗教徒或神话中称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b)君主;皇帝^{[5]287}。而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专长或突出特点的代表人物”(意义源自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2010 汉语新词语》17 页,有改动)。“帝”语义的泛化经历了“天神中的主宰者→人世间的
主宰者→某个领域的主宰者”三个阶段,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点就是“权威性”,语用主体依靠逻辑推理和联想,用“神界的权威”来隐喻“某个领域的
‘权威’”,实现了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具有特指性,也具有群指性。模标“奴”的语义泛化也经历了
“阶级社会中被役使的人→被役使的人→被某种事物束缚的人”三个阶段,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点是
“被束缚”,因此用具体时间、具体阶层的“被束缚”隐喻经济或心理上的“被束缚”,实现了从源域到目标
域的投射,具有群指性。

至于二者模槽功能的聚合性,要分别来讨论。首先来看“X 帝”,模槽“X”对模标“帝”有修饰限制作用,表示某个领域的代表事物,按照“领域”的特点,可以作出如下分类:

a) 心理领域,如淡定帝、预测帝、表情帝。

b) 专业领域,如房帝、口误帝、练摊帝、听证帝、特长帝、打工帝。

c) 影视领域,如贺岁帝、龙套帝、收视帝、合影帝、酱油帝、霸屏帝。

而在“X 奴”中,模槽“X”的语法功能也是修饰限制,但在语义上是施事,是模标“奴”的施动者,构成了“X—束缚—奴”这样一个语义框架。根据“X”的语义特点,可以把“X 奴”作出如下分类:

a) 心理施事,如上班奴、码奴、屏奴。

b) 经济施事,如菜奴、坟奴、果奴、团奴、发票奴、险奴。

c) 经济、心理双重施事,如孩奴、网购奴、年奴。

最后,来看一下“X 控”。“控”是一个来自日语英源词的模标,其语义也经历了一个泛化的过程。它最初产生于 ACG(动画、漫画、游戏)领域,因此一开始由“控”组成的控族词通常是 ACG 领域的专业用语。受到语源的影响,“控”在语义上表示“具有某种情结或极度喜欢某事物的人”,而且这种情结或喜欢有很极端、变态的味道,如“妹控”。后来随着使用领域的扩展,“控”语义上的消极、贬义色彩逐渐淡化,成为了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模标,泛指“非常喜欢某种事物的人”,具有群指性。表 1 中的 12 条“X 控”,都是“控”语义泛化后形成的新词语。从词性上来看,“控”具有动词性,但作为前空表人模的模标,它又具有名词性中心语的身份,可以用隐喻来解释。“控”在《现汉》中的释义为“控制”^{[5]748},而“X 控”中的“控”表达的是“控制主体的心理特点”,即“沉迷,

不能自拔”,所以是用具体的动作来隐喻较抽象的动作发出者的心理,从而实现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X 控”中模槽“X”的语法功能依旧是修饰限制,但整个模式形成的语义框架却是“人—控—X”,根据“X”的语义特点,可以对“X 控”作如下分类:

a) 某种事物,如中国控、微博控、穿越控、四叶控、推特控、侦探控、攻略控、弟控、颜值控。

b) 某种行为,如街拍控、签到控、辟谣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X 帝”“X 奴”“X 控”等前空表人模由于模标“帝”“奴”“控”在语义上的隐喻特点,造成进入模槽的词语在语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也必然受到局限,因此此类前空表人模的新词语数量逊于泛指性和关系性前空表人模。

四、结 语

本文以范畴理论为主导,对当代汉语新词语中的前空表人模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的改变,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发生了转移,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的表人模成为了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本文从模标语义和模槽功能两个方面,对其中的典型成员“X 族”“X 哥”“X 女”“X 男”“X 客”“X 二代”“X 帝”“X 奴”“X 控”“X 姐”作了分类探讨,结果表明:“X 族”“X 客”的模标具有泛指性,在语法聚合的基础上二者的模槽具有较强的语义聚合功能;“X 哥”“X 姐”“X 男”“X 女”“X 二代”的模标具有关系性,即对应关系或预设关系,五者的模槽具有潜隐的语义聚合功能,体现在每个模式模槽词语深层语义的相关性上;“X 帝”“X 奴”“X 控”的模标具有隐喻性,三者模槽的聚合功能分别体现于意义领域的不同。

在前空表人模基本层次范畴认知的过程中,还有一点要注意,即在把“具有某类特点的人”是归入“X 族”“X 客”,还是“X 男”“X 哥”,抑或是“X 控”或其他的过程中,就已沾染了主观色彩,亦所谓的“主观化”。这既是一个共时概念,又是一个历时概念,前空表人模研究也应遵循此法,以更好地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词语模[C]//邢福义.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146.
- [2] Ungerer F,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6: 72-98.
- [3] 邵敬敏, 任芝镛, 李家树, 等. 汉语语法专题研究[M]. 增

- 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2-235.
- [4] 苏向红.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6] 江桂英.原型范畴理论缺陷再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42-48.
- [7] 吴世雄,纪玉华.原型语义学:从家族相似性到理想化认知模式[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57-64.
- [8] 吴世雄,陈维振.论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28(4):14-19,80.
- [9] 俞建梁.模因范畴论[J].外语学刊,2016(2):23-27.
- [10] 涂海强,杨文全.媒体语言“X+哥”类词语的衍生机制与语义关联框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24-30.
- [11] 赵艳梅,杨文全.当代汉语新词语表人词语模主观性解析[J].新疆大学学报,2018,46(1):139-144.
- [12]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5.
- [13]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5.

(责任编辑:陈丽琼)



回归假说下英语专业学生词汇磨蚀的实证研究

吴蓓蓓, 刘 蕴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为验证回归假说的适用性及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 对浙江理工大学英语专业四个年级共 100 名学生的词汇磨蚀情况进行测试和调查。研究表明: 全体受试者的词汇测试结果符合回归假说, 且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词汇受蚀情况严重; 总体来说, 磨蚀前英语水平、词性和英语接触量这三个因素都与词汇磨蚀存在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 磨蚀前英语水平对词汇磨蚀有显著影响, 而词性和英语接触量对词汇磨蚀影响较弱。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如果学生的词汇磨蚀得到合理控制, 那么其语言习得效率将有所提高。

关键词: 词汇磨蚀; 回归假说; 语言习得;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8-0368-07

An empirical study on lexical attrition of English majors under the Regression Hypothesis

WU Beibei, LIU 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applicability of Regression Hypothesi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xical attrition, lexical attrition situations of 100 English majors from four grades i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were tes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results of vocabulary test for the subjects conform to the Regression Hypothesis. Besides, the students in lower grades experience more serious lexical attrition than the students in higher grades. Generally speaking, all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English level before attrition, parts of speech and exposure to English are related to lexical attrition. Howeve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English level before attrition is a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lexical attrition. By contrast, parts of speech and exposure to English have weaker effect on lexical attri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if the lexical attrition rate of students can be controlled rationally, their efficienc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 be improved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lexical attrition; the Regression Hypothesis; language acquisition; empirical study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高等学校英语教育虽然历经了几十年的蓬勃发展, 但在教学过程中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广大教育者和学习者。如在一段时间减少英语使用的情况下, 学生的英语能力下降, 最明

显的表现是遗忘了许多已学过的词汇, 该现象被称为词汇磨蚀。显然词汇磨蚀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但作为一个研究命题, 它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只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海外学者率先探

收稿日期: 2018-09-2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14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14B117); 浙江省语委科研项目(ZY2011B19); 浙江理工大学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示范课程建设项目(spc1415);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432091); 浙江理工大学学科竞赛培训模式创新与改革项目(XKJS1812); 浙江省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kg20160119)

作者简介: 吴蓓蓓(1980—), 女, 安徽淮北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索其背后的奥秘,近十年来中国学者才开始踏足该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以介绍和总结国外词汇磨蚀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和数据支持。

为弥补国内对英语专业学生词汇磨蚀相关实证研究的不足,验证国外理论体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本文基于回归假说理论,通过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掌握情况进行测试和数据分析,验证该群体的词汇磨蚀现象是否符合回归假说,并探讨影响这一现象的相关因素,冀以对当前词汇磨蚀与语言习得研究有所启发。

一、词汇磨蚀和回归假说相关研究

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系统,不仅可以习得、保持,也会磨蚀或忘却^[1],其中,词汇磨蚀是语言磨蚀的一种外显形式^[2]。词汇磨蚀主要是指学习者在习得的词汇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由于缺少或停止使用目标词汇,导致词汇运用能力减弱的现象。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Wilkins 曾说过:“没有语法,人们可以传递极少数信息;然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传递任何信息。”^[3]由此可见,词汇在语言学习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词汇因其材料的真实性、遗忘的时效性和成果的应用性而更受研究者青睐^[4]。值得一提的是,语言磨蚀中较大程度的磨蚀首先会在词汇层面反映出来^[2],词汇磨蚀主要表现为词汇遗忘、语义特征丧失和语言运用能力下降^[5]。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外有关词汇磨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词汇和其它语言成分(如语音)的磨蚀差异对比为研究重点。例如, Seliger^[6]认为,词汇知识比语音和形态句法的相关知识更有可能被磨损。另一类则以词汇本体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磨蚀词汇的语言学特征。例如, Weltens 等^[2]探讨磨蚀词汇多属于产出性词汇还是接受性词汇, Ferguson 等^[7]认为在字形词的文化背景下,字母词习得效率低。虽然国外的词汇磨蚀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以往研究重点过于集中于磨蚀词汇语言学特征的单一因素分析,如词频、词义或词性等,尚未将多种特征置于同一框架中进行逐一分析,并且尚未显现出磨蚀词汇的综合群体特征^[8]。

为探究语言磨蚀的具体规律,国外研究者提出了关于语言磨蚀的若干假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雅克布逊回归假说(Jakobson's Regression Hypothesis, 简称回归假说)^[9]。回归假说最早由 Ribot 提出,该假说认为,最后习得的语言知识是最先磨蚀的,反之,最先

习得的语言知识是最后磨蚀的^[10]。该假说后由雅克布逊系统地整理归纳,最终被命名为雅克布逊回归假说。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接受回归假说,验证回归假说的语言磨蚀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例如,1986年 Cohen^[11]对词汇磨蚀的研究中,以及1999年日本学者 Hayashi^[12]和 Hansen^[13]对日语否定形式和数量词的损耗研究中,均对回归假说进行了验证。但在探讨回归假说的过程中,一些国外学者也发现了若干不符合该假说的语言现象,回归假说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挑战。例如,有研究^[14-15]发现,德语的格标记和瑞典语磨蚀顺序与习得顺序并不完全相反,无明显的回归性特征。目前,国内关于回归假说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理论分析层面,如王湘云^[1]总结了回归假说的发展历程,董延彪等^[16]从理论上分析语言磨蚀和自然遗忘的异同,而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理论验证的很少。

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语言因素主要讨论词的语言特征,如词性、词频和词长等。在数量上,非语言因素远远多于语言因素,包括情感与动机因素、性别、年龄、词汇磨蚀发生时间、磨蚀前英语水平、接触目标语言的时间和社会环境等。结合受试的具体情况,同时鉴于对实证研究的适用性,本文将从词性、磨蚀前英语水平和英语接触量三个方面分析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旨在找出能够有效控制大学生英语词汇磨蚀的方法。

二、研究对象、工具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浙江理工大学英语专业四个年级的在读学生作为样本,发放问卷102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其中每个年级均为25份。此外,所有受试者在寒假假期之后参加此次词汇测试和问卷调查,词汇使用的“缺少或停止”时期长达两个月,符合词汇磨蚀的定义和特点。

(二)测量工具与方法

1. 词汇测试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国内词汇磨蚀领域研究先驱——倪传斌教授设计的词汇测试量表^[17]来测试研究对象的词汇磨蚀情况。该量表词汇全部从上海交通大学语料库(JDEST)中选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验证回归假说,该量表所涵盖的72个单词都是从研究对象已学过的英语教材中选取,其中初中词汇24个,高中词汇24个,大学词汇24个,分别代

表词汇习得的先后顺序。同时,这72个词也可按词性划分成不同的组别,即24个名词,24个动词和24个形容词,用于观察词性作为语言因素如何影响词汇磨蚀。计分方式是将受试者在测试中答题的正确率换算成百分比,满分为100分。得分越低,说明词汇磨蚀情况越严重。

2. 英语接触量及磨蚀前英语水平问卷调查

英语接触量问卷调查用于收集学生在过去两个月的假期里接触英语的情况,该问卷涉及英语专业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使用英语的10种场景,如“看英语电视节目、戏剧”“听英文广播和歌曲”,或“用英语与他人面对面交谈”。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8]按照接触频率评分,“总是”为5分,“经常”为4分,“偶尔”为3分,“很少”为2分,“从不”为1分,每个项目的得分累计为总分。满分为50分,最低分为10分,10分意味着该研究对象在整个词汇磨蚀期间没有接触英语。

关于磨蚀前英语水平,鉴于我国英语教育的现状和特点,本研究以以下四种考试作为衡量标准:全国高考英语考试(NCEEE)、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和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依据四门考试的词汇密度和词汇难度,这四种考试的难度由高到低分别为:TEM-4、CET-6、CET-4和NCEEE^[19]。本研究中受试者通过的最高难度的英语考试代表他们的磨蚀前英语水平。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 英语词汇磨蚀与回归假说

1. 英语词汇磨蚀现状对回归假说的验证

基于回归假说的定义和前一节所提到的词汇测试量表设计,量表中的三组词(每组24个词)分别代表初中、高中、大学三个不同阶段习得的词汇,分别用阶段1、2和3表示,以对应回归假说中词汇习得的先后顺序。首先,为了探讨英语词汇磨蚀现状是否符合回归假说,需要确定受试者在阶段1、2和3所习得词汇的测试成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三个阶段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初中、高中和大学三阶段习得词汇测试成绩的单因素 ANOVA 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量	显著性
组间	30944.080	2	15472.040	108.188	0.000*
组内	42474.045	297	143.010	—	—
总数	73418.124	299	—	—	—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从表1中可以看出,显著性值为0.000($P < 0.05$),这意味着受试者对在初中、高中和大学这三个不同阶段所习得词汇的测试成绩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继续进一步分析数据以验证英语词汇磨蚀现状是否符合回归假说,三个阶段的多重比较见表2。

表2 初中、高中和大学三阶段习得词汇测试成绩的多重比较(LSD)

词汇习得顺序	均值差	标准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阶段1—阶段2	8.29170	1.69121	0.000*	4.9634	11.6200
阶段1—阶段3	24.45833	1.69121	0.000*	21.1301	27.7866
阶段2—阶段3	16.16663	1.69121	0.000*	12.8384	19.4949

结合表2来看,通过组间数据的多重比较,可以补充说明每两个阶段之间均存在重大差异。具体而言,初中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与高中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不同,高中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与大学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不同,而初中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与大学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也存在不同。从均值差的数值来看,多重比较中阶段1—阶段3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较突出,均值差达到24.45833,为三组中最大均值差,表明受试者在初中阶段和大学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具有最明显的区别。三个阶段词汇测试成绩的平均分和描述性分析见图1和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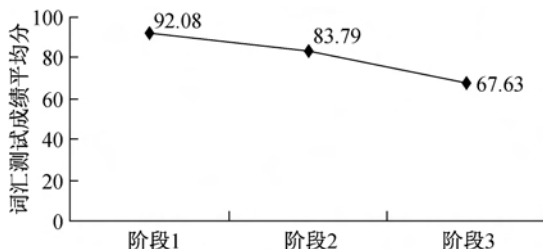


图1 初中、高中和大学三阶段习得词汇测试成绩平均分

表3 初中、高中和大学三阶段习得词汇测试成绩的描述性分析

词汇习得顺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阶段1	92.08333	5.93703	79.17	100.00
阶段2	83.79167	10.91843	37.50	100.00
阶段3	67.62500	16.57016	25.00	100.00

图1以折线图方式直观地展示了受试者对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阶段所习得词汇的测试成绩的平均分。该图清楚地说明越早习得的词汇越晚磨蚀,而越晚习得的词汇反而越容易磨蚀,这个发现符合回归假说内容,验证了其正确性。

受试者在每组单词获得的分数显示了他们每个

阶段的词汇磨蚀情况。如表3所示,阶段1的平均分为92.08,阶段2为83.79,阶段3大幅下降至67.63,这说明受试者大学阶段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最为显著,即对大学词汇的习得效果低于对高中和初中词汇的习得效果。

标准差反映了样本分布的离散程度。标准差的值越小,样本越紧密地聚集在平均值周围,那么研究中原始数据的分布也就相对密集。从表3可以看出,阶段1的数据分布最密集,标准差的值仅为5.93703,表明阶段1的词汇磨损情况比较稳定。阶段2和3,随着标准差的值逐渐增加到10以上,表明高中和大学中习得词汇的磨损情况更加不稳定,以致后习得的英语词汇更有可能遭受词汇磨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回归假说。

2. 不同年级学生词汇磨蚀情况对比

图2呈现了英语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在阶段1、2、3习得词汇磨蚀的具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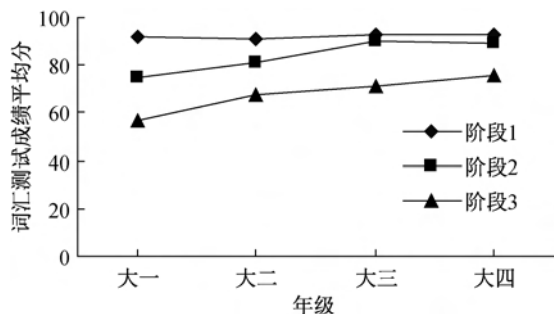


图2 英语专业各年级学生三阶段习得词汇的测试成绩平均分

图2显示,英语专业各年级学生的词汇测试表现都验证了回归假说。无论哪一年级,受试者在阶段3的词汇测试中表现最差,四个年级的平均得分在56.33到75.50之间,说明大学习得词汇的磨蚀最严重。相较之下,受试者在阶段2表现较好,四个年级的平均得分在75.17到90.17之间,说明高中习得词汇的磨蚀稍有缓和。各年级学生在阶段1普遍获得了相当高的测试分数,四个年级的平均得分不低于91分,说明初中习得词汇的磨蚀情况最轻微。也就是说越早习得的词汇,越晚遭受磨蚀,其习得效果越好。

另一方面,已习得词汇的保持效果与学生所在年级成正比,即年级越高,词汇磨蚀越少。这一趋势在阶段3尤其明显。阶段3中大一学生的平均得分仅为56.33,而大四学生的平均得分达到75.50。这说明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经历的词汇磨蚀更少。此外,年级越高,语言学习者对在不同阶段所习

得词汇的磨蚀差异越小。例如,对于大四学生,在本次词汇量测试中,不同于其他年级样本词汇测试成绩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他们从阶段1到阶段3的平均分分别是92.83、88.83、75.50,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不同阶段都获得高分。因此与低年级学生显著的回归性相比,高年级学生词汇磨蚀的回归性特征相对较弱。

由此可见,虽然不同年级情况略有不同,但所有年级受试者在词汇测试中的表现均符合回归假说,即先习得的词汇后磨蚀,后习得的词汇先磨蚀。此外,词汇磨蚀与大学生的年级呈负相关,即高年级学生的词汇磨蚀程度低于低年级学生。

(二) 英语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

1. 词性

根据词性类别,词汇测试中的72个单词可划分为名词(N)、形容词(A)和动词(V)三大类,每类均含24个单词。单因素ANOVA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词性的单因素ANOVA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统计量	显著性
组间	2832.292	2	1416.146	11.796	0.000*
组内	35655.208	297	120.051		
总数	38487.500	299			

表4中,显著性值为0.000($P < 0.05$),说明三种不同词性对英语词汇磨蚀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所以要进一步探究词性对英语词汇磨蚀的影响,表5通过多重比较显示了每两种词类之间的具体差异。

表5 词性的多重比较(LSD)

词性	均值差	标准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A-N	7.25000	1.54952	0.000*	4.2006	10.2994
A-V	1.87500	1.54952	0.227	1.1744	4.9244
V-N	5.37500	1.54952	0.001*	2.3256	8.4244

表5数据显示A-V组内的显著性值高达0.227($P > 0.05$),即形容词和动词的词汇磨蚀情况无显著差异。而A-N组内的显著性值为0.000($P < 0.05$),V-N组内的显著性值为0.001($P < 0.05$),说明名词与其余两种词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6展示了英语专业学生对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种常用词类的测试结果。显然,形容词的得分在三种词性中是最高的,平均分为84.21。这表明与其他两种词性相比,形容词出现词汇磨蚀的几率较小。尽管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屈折变化将使动词

更有可能遭到遗忘,但是受试者在测试中的动词词组部分表现较好,获得 82.33 的平均分,稍低于形容词;而名词的得分为 76.96,远低于形容词和动词,意味着相较前两者名词更容易发生词汇磨蚀。

表 6 词性的描述性分析

词性	均值	标准差
N	76.95832	11.50585
A	84.20831	11.24127
V	82.33333	10.06990

为了解词性和词汇磨蚀之间的关系,对词性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双侧)值为 0.001($P < 0.01$),表明词性与词汇磨蚀存在相关性,所以词性可以被看作是影响英语词汇磨蚀的因素之一。而词性和词汇测试平均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赋值为 0.194($0 < 0.194 < 0.3$),表明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极弱正相关。即词性会影响词汇磨蚀的发生,但这种影响非常微小。

2. 磨蚀前英语水平

图 3 直观呈现具有不同磨蚀前英语水平受试者的词汇测试成绩。通过全国高考英语考试(NCEEE)的学生在词汇测试中的平均分为 74.59,相较于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的学生(平均分 75.56),两者差距并不明显。但通过 CET-4 的学生在词汇磨蚀方面比通过 NCEEE 的学生更稳定,其词汇测试成绩的极大值与极小值差距相对较小,最高分为 86 分,最低分为 65 分。相较之,通过 NCEEE 的学生,极大值与极小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分别为 93 分和 58 分。此外与通过 NCEEE 和 CET-4 的学生不同,由平均分可见,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81.04)和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85.87)的学生遭受的词汇磨蚀较少。总体来说,磨蚀前英语水平越高,经历的词汇磨蚀则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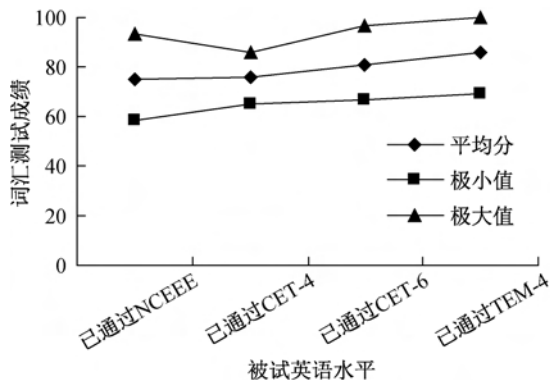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磨蚀前英语水平受试者的词汇测试成绩

为调查磨蚀前英语水平和词汇磨蚀之间的关

系,对磨蚀前英语水平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双侧)值为 0.000($P < 0.01$),表明磨蚀前英语水平与词汇磨蚀相关,因此磨蚀前英语水平属于英语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以外,磨蚀前英语水平与受试者在词汇测试中获得的平均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赋值为 0.529($0.5 < 0.529 < 1$),表明该变量与测试结果呈较强正相关。这意味着,磨蚀前英语水平极大地影响了词汇磨蚀的速度和程度。如果英语专业学生在发生词汇磨蚀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英语水平,他们将经历较少词汇磨蚀。这一发现与该领域 2018 年最新研究^[20]结果一致。

3. 英语接触量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受试者的英语接触情况量化,结果如图 4 所示。英语接触量由 10 分至 50 分递增,按接触程度依次分为四个区间:10~20、21~30、31~40 和 41~50 分。总体来看,受试者英语接触量均值为 27.06,表明在 2 个月的寒假假期中,几乎所有的受试者都有一定的英语接触量。极值上存在较大的差距(极大值 43,极小值 10)说明个别受试者在英语接触量上有明显差异,即有些学生寒假期间勤于英语学习与巩固,也有学生丝毫没有接触英语。不过从相对较低的标准差(6.16248)来看,受试者之间英语接触量的差距相对较小。由图 4 可见,受试者中较为经常接触英语(31~40)的只有 27%,密切接触英语(41~50)的只有 1%(即 1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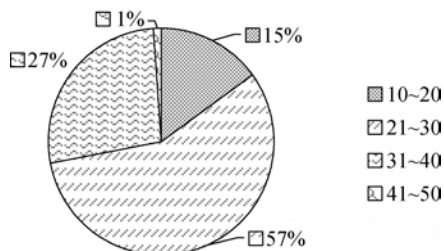


图 4 英语接触量的区间分布

为分析英语接触量和词汇磨蚀之间的关系,对英语接触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双侧)值为 0.013($P < 0.05$),表明英语接触量与词汇磨蚀存在相关性,英语接触量会对词汇磨蚀造成影响。然而,英语接触量与词汇测试平均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赋值为 0.249($0 < 0.249 < 0.3$),说明该变量与词汇磨蚀呈极弱正相关,即学生是否经常接触英语与词汇磨蚀的联系不够紧密。Krashen 的语言输入假说(Comprehensible input 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的有效语言输入对二语

习得具有重要作用^[21]，而接触英语是语言输入的必要手段，可见英语接触量会影响语言习得的效果，也是影响词汇磨蚀的因素之一。所以，英语专业学生应该注意保持英语接触量，以有效减少词汇磨蚀。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词汇测试和分析，结合问卷调查，本文主要探讨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磨蚀是否能够验证回归假说，以及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磨蚀特点与回归假说相符，其英语词汇磨蚀规律可概括为“先学后忘，后学先忘”。相较于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的词汇习得效率更高，体现为对初中、高中、大学三个阶段中习得词汇的磨蚀率都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相比在校学习时间更长，经过系统的课堂教学和语言训练后，语言能力得到相应提升，词汇运用能力也相对纯熟；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显示，年龄也是影响词汇磨蚀情况的因素之一^[22]。高年级学生有着相对成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能够有效防止词汇磨蚀的发生。

第二，在词汇磨蚀的三个影响因素中，磨蚀前英语水平对词汇磨蚀的影响最为显著。高水平语言学习者很有可能比低水平语言学习者经历更少的词汇磨蚀，从而取得更好的词汇习得效果。虽然显著性低于磨蚀前的英语水平，词性和英语接触量这两个因素依然对词汇磨蚀存在影响。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点建议以期改善大学生词汇磨蚀率高的问题：

a)改进词汇学习策略。根据词汇磨蚀的回归特性，越是新学习的词汇越容易遭受词汇磨蚀，这也解释了很多大学生在习得英语词汇时的一个困惑：在语言输出时，总感觉词汇贫乏，表达受限，使用的都是初中和高中时期的词汇。而大学阶段新学的词汇则多为消极词汇，语言输出时无法自如使用，从而大大限制了语言的表现力和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提升。鉴于此，学习者应该加强对新习得词汇的重视，通过不断练习和循环，使消极词汇转化为积极词汇，从而使其变得稳固，最终有效改善新习得词汇易遭受磨蚀的情况。

b)倡导自主学习理念。增加与目标语言的接触也是词汇学习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要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增加目标词汇接触量，仅通过外在因素促进是远远不够的。应将“终身学习”及“自主学

习”理念引入词汇学习中，激发学生主动接触英语的内在动力。在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中，教育者应树立并向学生时时灌输对语言的终身学习意识，因为防止外语能力流损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简单地靠增加外语接触并不够^[23]。只有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学习动机，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的^[24]，才能有效提升其英语接触量。

c)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提高词汇习得效率与教学模式的恰当运用密不可分，而创新英语课堂教学方法是吸引学生踊跃参与课堂教学的必胜法宝，同时也是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关键组成部分。本研究结果指出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种词性中，名词最容易遭遇词汇磨蚀。因此，教师在相关课程教学时，如讲授综合英语课程和词汇学课程时，应注意教学内容和重点的合理设计，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尽量做到让学生对不同词性的习得获得均衡发展。而针对更容易遭受词汇磨蚀的低年级学生，教师应该从课程设置、大纲设计等方面给予更多考量，加强学生的语言输入和词汇训练，以有效减少词汇磨蚀，提高语言习得效率。

此外，应该为学生创造更多课堂外接触英语的机会，例如，鼓励学生参加英语科学竞赛，开展与英语相关的第二课堂活动，举办英语角或英语沙龙等，为英语学习创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和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将“互联网+”概念引入英语教学，把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有效结合，延伸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为增加学生的英语接触量、夯实其语言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词汇习得在语言习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词汇磨蚀将有助于提升英语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师的教学效果。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索词汇磨蚀规律和顺序，发现“先习得的词汇后磨蚀，后习得的词汇先磨蚀”；同时探讨了词汇磨蚀的三个影响因素：磨蚀前英语水平、词性和英语接触量。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回归假说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进一步拓宽了回归假说的应用范围，为有效解决目前大学生词汇磨蚀率高的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词汇磨蚀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囿于测试量表和问卷的篇幅限制，本研究无法全面覆盖。计划在将来的研究中对情感与动机因素、词汇学习方式等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期对词汇磨蚀的规律和特点有更为全面的研究，从而有效助力英语教学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 [1] 王湘云. 语言磨蚀假说综述[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35(6): 57-62.
- [2] Weltens B, Grendel M, Schreuder R. Attrition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J]. *The Bilingual Lexicon*, 1993 (6): 135-156.
- [3] Wilkins D A.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111.
- [4] 倪传斌. 外语词汇磨蚀的动态过程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6): 909-921.
- [5] Sands B, Miller A, Brugman J. The lexicon in language attrition: The case of Nluu [C]// Payne D, Pena J.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Annu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Linguistics*. Somerville: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2007: 341-343.
- [6] Seliger H W. Primary language attrition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language loss and mixing [J]. *Language*, 1985, 42(11): 45-50.
- [7] Ferguson C A, Grainger P. Attrition in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at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J]. *Studies in Learning, Evalu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128(3): 77-88.
- [8] 金晓兵, 倪传斌. 外语磨蚀词汇的语言学特征[J]. 外语学刊, 2011(4): 45-50.
- [9] Jakobson R. *Child Language, Aphasia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M].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1980: 64-69.
- [10] Ribot T. *Les Maladies de la Mémoire* [M]. Paris: Alcan, 1881: 8.
- [11] Cohen A. Forgetting foreign-language vocabulary [C]// Weltens B, De Bot, Van Els T. *Language Attrition in Progress*.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214-219.
- [12] Hayashi B. Testing the Regression Hypothesis: The remains of the Japanese negation system in Micronesia [C]// Hansen L.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 in Japanese Con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06-414.
- [13] Hansen L. Not a total loss: The attrition of Japanese negation over three decades [C]// Hansen L.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 in Japanese Con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2-227.
- [14] Jordens P, Bot D K, Trapman H. Linguistic aspects of regression in German case mark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9, 11(2): 179-204.
- [15] Hakansson G. Syntax and morphology in language attrition: A study of five bilingual expatriate Swed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 5(2): 153-169.
- [16] 董延彪, 何木英. 国内外语言磨蚀和遗忘文献研究分析[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3(3): 101-104.
- [17] 倪传斌. 外语词汇磨蚀的回归性分析[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4): 21-28.
- [18] Likert R. A techniqu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J]. *Archives of Psychology*, 1932(7): 1-55.
- [19] 张安. 国内主要英语测试的效度研究综述[J]. 鸡西大学学报, 2016, 16(7): 94-96.
- [20] 宁建庚, 赵丽. 语言磨蚀现象与成因的实证研究[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2018, 26(2): 140-142.
- [21] Krashen S. We acquire vocabulary and spelling by reading: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input hypothesi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9, 73(4): 440-464.
- [22] Hansen L, Kurashige R A. Investigating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 An introduction [C]// Hansen L.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 in Japanese Contex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20.
- [23] 吴微. 语言磨蚀研究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J]. 中国新通信, 2017, 19(16): 138.
- [24] 吴蓓蓓, 李吉. 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动机与自主性的实证研究[J]. 海外英语, 2018(22): 257-260.

(责任编辑:韩 玮)



赤青黑白的文学世界

——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的色彩研究

张萍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 成都 611137)

摘要: 作为唯美派的代表作家, 谷崎润一郎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以及视觉中融合嗅觉、味觉、触觉的表现技巧, 勾勒出他对文学世界的丰富感受力; 同时赋予色彩独特的审美情感和价值意蕴。谷崎的文学作品中, 赤色是让女主升华、男主沦陷的法器, 具有魔性的力量; 青色总是伴随妖女的登场, 象征诱惑力和想象力; 黑色通过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 具有多重象征性; 白色通过女性的肉体象征生命的活力和激情, 并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 演绎东方古风幽玄的回归。谷崎润一郎的色彩世界源于他对东方文化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的内化吸收。

关键词: 谷崎润一郎; 色彩; 表现手法; 价值意蕴;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75-07

Literary world mixed with the color of red, cyan, black and white: Color study on Tanizaki Junichiro's literary works

ZHANG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aestheticism school, Tanizaki Junichiro is adept at applying the colors with subtle changes and the expression techniques of combining the senses of sight, smell, taste and touch in visual sense to demonstrate his rich feeling of literary world. At the same time, he endows color with unique aesthetic emotion and significant value. In Tanizaki's literary works, the red color is a magic weapon to sublimate the female leading role and submerge the male leading role. The cyan color always accompanies the appearance of a siren, symbolizing temptation and imagination. The black color demonstrates its multiple symbols by comparing or combining with other colors. The white color symbolizes vitality and passion of life through the female body. In his early works, dazzling pure white and snow white gradually fade into shadowy obscure white and milk white presented in lunar halo in his middle and late works, showcasing the return of the oriental ancient mystery. The color world of Tanizaki Junichiro stems from his strong identity for oriental culture and internalized absorption of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 Tanizaki Junichiro; color; expression techniques; value impli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1910年前后,日本文坛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追求写实主义和赤裸裸的表白,整个文学界弥漫着通向悲哀现实的虚无人生观,文坛一片灰暗。在自然主义风靡文坛的“单色调”的时代,1910年,唯美派

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刺青》华丽登台,在日本文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谷崎对感知和官能的极致追求,冲击了自然主义的文坛。奔放的想象力、浓艳的格调、强烈的色彩,使谷崎的文学宛如盛开在自然主义

阴翳之下的一朵绚丽牡丹。随后他发表的《麒麟》《少年》《秘密》《恶魔》等初期作品更是以绚丽的色彩,颠覆了世人对善恶的理解。1923年谷崎移居关西之后,他的中、晚期作品《春琴抄》《各有所好》《滋干少将之母》等又呈现一个静寂、淡定、纯色的世界,赋予世人心灵的慰藉。

目前有关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文本研究成果丰富,但对其文学世界的色彩研究论述屈指可数。宇佐見英治^[1]认为谷崎润一郎在《刈芦》和《盲目物语》两部作品中,讲述了音乐带来的色调和触觉变化引发的想象故事,在作品《阴翳礼赞》中赞美了潜藏在昏暗中的白色和金色之美。波多野完治^[2]以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细雪》为文本,从冒头开始选出100个色彩词,统计涵盖100个色彩词篇章的总字数,进而计算出单个色彩词出现时的平均字数,该平均数低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得出谷崎润一郎是一位色彩词丰富的作家的结论。张能泉^[3]认为谷崎润一郎色彩词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丰富的内涵,通过静态的文学图像呈现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文学、艺术及语言学角度分析谷崎作品文本,但缺乏对其文学世界的色彩表现及象征意义研究。本文将以其文本细读为基础,以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常用色彩词为切入点,分析其文学色彩表现手法的特征及其常用

色彩蕴含的文化意义,探讨谷崎式的唯美主义思想及其文化认同。

一、谷崎文学中色彩的表现手法

色彩是一切视觉要素中最活跃、最有冲击力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它能更多地唤起人们情感的反响。色彩是各种艺术形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全面诠释了人的视觉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和主观感受。夏目漱石^[4]认为“在我们的感觉世界里,再也没有比色彩感更能给予我们更丰富多变的快乐了……色彩给我们带来的快感远远超然于对占有欲的满足之上,从而使人达到高尚美的境界。”色彩展现出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特定文化语境下作家的内心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发挥重要作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正是如此。笔者选取谷崎润一郎的11部代表作中的主人公,包括初期作品《刺青》的少女,《麒麟》的孔子和南子夫人,《少年》的光子、信一和仙吉,《秘密》的女人和“我”,《人鱼的叹息》的人鱼,《富美子的足》的富美子,中期作品《痴人的爱》的奈绪美,《各有所好》的阿久,《春琴抄》的春琴,晚期作品《滋干少将之母》的北氏,《疯癫老人日记》的疯子,围绕以上人物的身体、服装以及饰品的色彩词统计,得到谷崎润一郎不同时期作品的色彩词分类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谷崎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色彩词分类统计

色彩	初期	中期	晚期	总次数
白	真つ白、真つ白、白霓、白足袋、白い、真白、玉肌、珠玉、純白、石膏、白く、白く、お白粉、白く、真白、お白粉、真珠の色、純白、雪白、純白、白い、真白、白過ぎる、白い、白さ、白毫、銀色、白皙、真白、白い、白い、白さ、真白、色の白さ、白すぎる、お白粉、真白、白い、白眼、ほの白さ、生白く、白い、象牙、白く、象牙、白い、白い、白い、白木	白つぼい、白、銀糸、白足袋、真つ白、白い、真つ白、白さ、白、白い、白い、白さ、白い、白さ、真白、真つ白、真つ白、白さ、ほの白い、ほんじろく、ほのじろい	白い、白い、白い 絹、白い、白、銀	76
赤	うすべに色、琉球朱、瑪瑙、緋、赤い、爪紅、紅絹裏、猩猩緋、紅毛、珊瑚の玉、赤う、紅、朱紅、赤み、薔薇色、薄紅い、覆盆子	鴉色、薔薇色、蝦色、蝦色、朱、赤い、紅、朱の色、紅さ、桜色	紅梅、薄紅梅、罌粟 か牡丹の花、ピンク	31
黒	緋布、黒塗り、黒羽、黒い、黒く、真黒、黒眼、黒髪、黒い、真黒、黒髪、黒髪、真黒、黒さ、黒眼、黒眼、黒眼、黒眼	黒い、黒み、黒く、黒い、黒い、黒い、黒、黒餅	—	26
青	青雲、青く、青白い、納戸色、青大将、お納戸、藍色地、空色、紺碧、青く、淡藍色、藍、淡藍色、青々、青貝色	青み、紺淡い水色、うすい水色、青さ	ブリュー、ブリュー	21
黄	金色、黄八丈夫、浅黄、金、肉色、金緑、銀杏の色	金紗、黄色く	—	9
紫	紫、紫	薄紫、薄紫、紫色	紫	6
緑	翡翠、緑、暗綠色	緑	—	4
茶	狐、茶格子	—	—	2

从表1可见,谷崎润一郎11部作品中白色出现次数最多,为76次,其他颜色依次是赤色31次、黑

色26次、青色21次、黄色9次、紫色6次、绿色4次、茶色2次。谷崎润一郎大多运用以上8种颜色

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结合涵盖色彩词的作品篇章细读,笔者发现谷崎文学世界的色彩表现手法主要突显三大特征。

(一)视觉色彩与嗅觉、味觉、触觉相互交融

谷崎润一郎笔下的色彩往往通过触觉、味觉和嗅觉切实感知,使读者在真实的形象中产生对描写事物的审美联想。在赋予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谷崎更激发读者的其他感官功能,使其身临其境,置身于他的文学世界里。《春琴抄》中,春琴的脸带着花或珍珠的细腻,让读者在嗅到花香的同时看到如珍珠发出的柔光;《富美子的足》中富美子小姐的脚让人想起覆盆子融入白色牛奶的夏日饮料,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分泌唾液,产生品味人物奥妙的愿望;《人鱼的叹息》中,人鱼雪白的肌肤上长着白色的绒毛,让读者产生想要触摸人鱼柔软毫毛的触觉反应。谷崎打通了视觉与嗅觉、味觉、触觉的通路,模糊了眼与鼻、舌、身各个官能的界限,让色彩似乎有气味、有形象、有冷暖。谷崎通过细腻的色彩描写丰富了作品的感官元素,激活了读者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让读者沉浸在丰富且真实的官能想象之中。

(二)五彩缤纷到单一色彩的转变

谷崎在其初期作品中,使用了大量色彩,比如《刺青》中的朱红和琉球红,《秘密》中的宝红、绯红、金色和天蓝色,《人鱼的叹息》中的雪白、纯白、翡翠、暗绿和黑色,《少年》中的金黄、银杏色、紫色和海蓝色,色彩明亮夺目、丰富大胆。但是中、晚期作品色彩趋于单一,比如《各有所好》中出现桃红色、灰白色和黑色,《春琴抄》中出现白色和青色,《滋干少将之母》中出现了乳白色、桃红色、深红色和紫色。色彩变迁最显著的是白色,白色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

(三)微妙的色调演绎色彩的渐变

总体来看,谷崎润一郎作品中使用的色彩种类并不多,但他对色彩词的描绘精雕细琢。从“海岛边捡来的淡红的贝壳般的双脚”(《刺青》)、“像被红纽扣锁住的嘴巴,如石膏般的裸足,似咬着牡丹花瓣的红唇”(《少年》)、“比珍珠还洁净百倍的眼泪及比珊瑚更鲜红的心脏”(《人鱼的叹息》)、“如狐一样的白色肩膀、手腕”(《痴人的爱》)等描写不难发现,比起原色,谷崎更倾向运用有微妙变化的色调;但又不直接地使用这些色彩,而是借助能暗示不同色调的植物、动物、矿物等生活中常见物体婉转地将色彩的渐变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知五彩缤

纷的世界。

总之谷崎润一郎并不对自然界中所有色彩都感兴趣,只是甄选部分色彩来构筑自己的文学天堂。但这点并不会导致其文学色彩的单调,相反,谷崎润一郎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借助感觉器官的相互沟通调合出更具感受力的色彩世界。

二、谷崎文学中赤青黑白的意蕴

色彩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同的色彩表达着作者不同的情感,唤起读者不同的生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当作者在作品中偏爱某种特定色彩时,这种色彩便打上了作者个性和心理的鲜明印记。佐竹昭広^[5]指出上代日语色名中只有赤青黑白四个颜色沉淀到今。日本最早的历史书《古事记》将此四色作为基本色彩,可见赤青黑白是日本最古老的传统色彩。从笔者的色彩词统计来看,谷崎主要甄选赤青黑白四种色彩来构筑自己的文学天堂。他对四种色彩的运用看似随意拈来,实则是自发而缜密的选择,无不蕴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蕴。

(一)赤色的价值意蕴

日语的“赤”是源于太阳的颜色。从物理特征说,赤色是一种暖色调,从情感属性上说赤色代表着热情、奔放和炽热。日本文化中,赤色惯用于驱邪除魔,庆祝喜事;日本文学中,赤色一般表现女性的妩媚多姿和含蓄羞涩,代表着积极向上的情感。但在谷崎作品中,尤其是在其初期作品中,谷崎自觉地屏蔽赤色的审美传统,并赋予赤色反传统的象征意义。

《刺青》的故事在弥漫着颓废而浓烈的赤色背景中展开,其主色调不单是赤色,还有琉球朱,以及被比喻成火焰、珊瑚、朝日的红色。故事的高潮在太阳的红光和刺青的朱红色中上演。“年轻刺青师的灵魂溶入墨汁中,再渗透到肌肤。混合着烧酒刺入肌肤的一滴一滴的琉球朱都是他的生命的甘露。他在这里看到了他灵魂的颜色。”^[6]“墨汁”“烧酒”“甘露”“灵魂”四个意象词的转变勾勒出一幅动态画面,图像中赤色的墨汁混合烧酒从女孩的身体外部渗透到身体内部,隐喻刺青师的灵魂传送到女孩的体内,二者完成生命的合体。当每一滴朱红的墨汁渐渐地在女孩身体上爬成一只隐隐约约的蜘蛛时,少女心中的怯弱被彻底抛弃,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双眼闪着利剑般的光辉。同时完成夙愿的刺青师也失去灵魂,心甘情愿地沦陷为祭拜女神的第一肥料。谷崎用妖艳华丽的红色蜘蛛实现了刺青师和少女之间精神的相互反哺,借助色彩的描绘艺术地传递了图像

背后隐匿的“女性跪拜”文学思想。《少年》中光子在玩伴之间的新奇游戏中总是扮演最惨的角色,比如扮演狐狸精被捆在走廊的栏杆上,脸上被嚼碎的糕饼弄得污秽不堪;涂着红色的颜料,浑身鲜血淋漓,痛得满地打滚;扮演母狗趴在房间的地板上争抢散落在房间的食物。可是在西洋馆探秘的晚上,光子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如石膏般的裸足套着肉红的拖鞋,……好似咬着牡丹花瓣的红唇煽动的一刹那,……我眼前红霞闪烁闪烁。”^[7]“肉红”“牡丹花瓣”“红霞”三个意象词的变化描述了光子从人到花再到神的升华过程,暗示原本毫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成为盛气凌人女魔头的蜕变,彰显出神秘的美感,赤色喻示女性能降服男性的力量之美和恶魔之美。之后光子的嚣张一天胜过一天,变本加厉地对待玩伴,最终成为王国的女魔王。

(二)青色的价值意蕴

“青”是一个典型的日语词汇,“青”饱含着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海,因此,青色被视为大自然的颜色,是世代代日本人生活的颜色。自古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青山”“青垣山”“青垣”“青紫垣”“青沼”之类的词语,反映日本民族对青色的喜欢。张波^[8]指出受日本风土人情的影响,对于日本人来讲,青色是一种亲近、随和和稳定的颜色。

但谷崎在作品中颠覆了青色的传统意义,在他的11部作品中大部分女主人公都被固执地画上青色。《麒麟》的女主人公南子夫人身着青云色的华服;《少年》的女主人公光子在肖像画中身披海蓝色外套,旁边匍匐着一条青蛇;《秘密》的女主人公全身裹在淡蓝色的披风里;《人鱼的叹息》中男主人公贵公子最不能抵抗的是人鱼淡蓝色的双瞳;《痴人的爱》中从平凡少女变身为命运女人的奈绪美出场时穿着淡水色的法国丝裙;《疯癫老人日记》中勾起老人性欲望的儿媳妇穿着蓝色的长睡袍,脚上是同样蓝色的缎面绣粉红花拖鞋。而这些女主人公或傲慢、或放荡、或残忍,被归类于谷崎笔下的“妖妇”“娼妇”“恶妇”,与传统青色意义截然相反。谷崎有意识地将象征精神稳定和安详的青色涂裹在放荡的妖妇身上,暗示在沉稳和冷静的外表之下,燃烧着意想不到的欲望火焰,凸显妖妇的诱惑力。谷崎通过女主人公外表色彩与内心性格的巨大反差,将千姿百态的妖妇形象深深地印刻在读者的脑海。同时,谷崎描述女主人公时通常使用单一的青色,构成如同水墨画般的境界。水墨画本没有色彩,但墨色在白纸

上的浸润和渲染使得画面更具张力,充满着无限的想象力。谷崎润一郎以色塑人,以色言情,用寥寥几抹青色塑造一个充满诱惑力和无限想象力的世界,使读者如同所有的男主人公一样,为之魂牵梦绕,无法释怀。

(三)黑色的价值意蕴

日本文化中黑色往往象征着绝望和死亡,带给人一种负面的情感效应。日本民俗学将黑色称为“黑不净”,将其与罪恶、黑暗与恐惧的事物相联系。由于黑色特殊的色相,日本审美传统更多是将其看作消极和负面的情感色彩。谷崎基本继承日本文学对黑色的审美传统,将黑色视为丑陋、病态、变态的代名词,加以渲染,营造一种压抑和阴郁的气氛。例如,在《少年》中,爱虐待、爱捣蛋的信一登场时穿着黑羽平织的礼服,具有被虐待倾向的仙吉是一个肌理粗黑、又肥又丑的小子。《痴人的爱》中,初见面的奈绪美的皮肤好像几张无色透明玻璃板重叠在一起呈现的深沉色调,看起来并不健康。

虽然谷崎认同日本民族传统的黑色审美定义,但他并不完全将其视为贬义的色彩,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黑色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表现不同情境下的情感意义,赋予黑色多重象征意义。例如,在《麒麟》中,谷崎通过黑色与其他色彩的对比,暗示黑色像深色的大海一样,掩盖一切色彩,吞噬掉一切污秽。《麒麟》开场,孔子头戴布满灰尘的黑色帽子,脚穿黑色草鞋,这不单是当时的历史的风俗,更为塑造一位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哲学老者埋下伏笔。故事发展到高潮,服饰色彩斑斓的南子夫人,使用一切手段诱惑孔子,试图让他放弃政治抱负。但孔子没有像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口若悬河,而用沉默和面无表情来坚决抵制南子夫人的引诱。南子夫人豪华的色彩和孔子单一的黑色形成强烈视觉冲击,画面中的黑色既沉默于色彩斑斓之中,又屹立于五光十色之外。可见,《麒麟》中的黑色摆脱固有的负面意义,象征孔子刚强、不屈不挠、坚持自我的高尚品质。此外,《各有所好》中的阿久仿佛是穿着“黑饼家徽碎花纹窄袖便服”的木偶,黑色和白色组合的日式传统家纹与个性深藏不露、谨慎谦恭的传统女性的特性相得益彰。黑白相间的木偶式的女性象征日本传统观念中“永恒女性”的容貌。《痴人的爱》中,奈绪美“黑色天鹅绒帽子”配上“五彩发光的水晶项链”、“洁白的鼻尖”、“红色的嘴唇”的妆容是当时街头最流行的“西洋女性”时尚。可见,黑色和彩色的搭配,既象征东方的传统之美,又体现西方的时尚之美。

(四) 白色的价值意蕴

在日本,白色是至高无上的色彩,自古以来就受到日本人的崇尚和喜爱。在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中,白色象征圣洁和神圣。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白色是至高、至真、至善的色彩。谷崎润一郎继承了日本尚白的民族色彩审美传统,在其11部作品中白色出现76次,远超居于次位的赤色。白色在谷崎的文学色彩世界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1. 白色的载体

“一双雪白的裸足”(《刺青》)、“雪白的手臂”(《秘密》)、“宛如皎月般熠熠生辉的肌肤”(《人鱼的叹息》)、“宛如细心削刻的原色木材的小腿”(《富美子的足》)、“如苹果的果实般洁白的后背”(《痴人的爱》)、“丰润白皙妙不可言的脸蛋”(《春琴抄》)、“在黑暗角落里朦朦胧胧浮现的白色脸庞”(《各有所好》)、“朦胧月色中乳白色的人影”(《滋干少将之母》)等关于白色的描写可见谷崎笔下的白色具有相同的特点,即通过面容、肌肤、小腿、后背、裸足展示出白色的肉体之美。如果说谷崎笔下的赤色、青色、黑色是人物服饰的主要色彩,那么白色一定是女性的肉体色彩。谷崎一生追求女性的肉体之美,笔下的东方女性或者西方女性,“妖妇”或者“圣母”,都拥有肤色洁白的丰腴体态。在对女性肉体的追求中,谷崎尤其对女性的双脚怀有极大的偏执,是一位典型的“恋脚癖”作家,白色裸足频繁出现在诸多的作品中。《刺青》中,刺青师邂逅一双露在轿帘底下的雪白裸足,皮肤光洁犹如被山涧清冽泉水洗涤多年,能够在这美丽的肌肤上刺画是他最高的艺术追求。《富美子的足》中,小妾富美子有一双如笔直白木雕琢般纤细的脚胫,老人想方设法以油画的艺术形式刻画富美子之脚的美丽。《疯癫老人日记》中,老人吮吸儿媳的双脚得到生理快感,生前希望将儿媳的双脚雕刻成佛脚石,死后埋葬其下。当谷崎的尚白精神与“女性跪拜”及“恋脚癖”结合时,白色的裸足必然变成白色佛脚石浮现在读者面前。在没有佛像的时代,佛脚石遂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见佛之足跣而参拜,如同参拜生身之佛。读者通过白色的佛脚石感受到谷崎唯美思想及对女性的至高崇拜。可见,对白色裸足的艺术追求是谷崎对女性肉体美的极端表现,而白皙肉体是谷崎审美意识的载体。

2. 白色的演变

谷崎的初期作品《刺青》《少年》《人鱼的叹息》中充满大量的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刺青》中,刺青师并没有见到女孩的长相立刻被她雪白的双足吸

引。《少年》中,主人公认为肌肤雪白的光子如同神话故事中的天使,被迷得神魂颠倒。“最让贵公子感到惊讶和消魂的是她纯白、不带一丝污点、皎洁无垢的肤色。很难用白色来形容她雪白肌肤的光泽。由于过度洁白,似乎‘光辉照人’比白色更加贴切,她全身皮肤的表面如瞳孔般散发着光芒。”^[9]《人鱼的叹息》中,谷崎反复使用“纯白”“雪白”“过度洁白”等色彩词堪称完美地形容了人鱼的白色肌肤。中、晚期作品《春琴抄》《各有所好》《滋干少将之母》中,初期的西洋风情的女主被扎根东方古典世界的人物取而代之,明亮刺眼的纯白、雪白逐渐淡化成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他突然发现仿佛在壁龛旁边的黑暗角落里朦朦胧胧浮现出阿久的脸庞,心头不觉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具身穿黑饼家徽碎花纹窄袖便服的木偶戏旦角木偶。”^[10]黄昏的雨夜,灯座十分暗淡,男主人无所事事,隔着蚊帐凝视山水画,突然在物影的重叠中浮现一张微白的脸庞。虚实模糊的阴翳中,让读者似乎看见或是传统文人偶或是传统女性的面庞,微妙难测,玄而又玄。“他跪在地上,从下边仰视母亲,靠在她的膝盖下。母亲那白帽子下边脸,在透过花而来的月光烘托下,显得小巧可爱,似乎脸四周有一道毫光。”^[11]阳春三月的夜晚,一片盛开的樱花林和刚刚发出几分柔光的新月交相辉映,滋干寻母的故事被微朦的月色幻化出神秘幽远的气氛。月夜寻母的场景色彩单纯,光线柔和,虚实结合,气氛静谧、幽远、虚幻。这种色彩描绘既是日本传统的自然美的体现,亦是作者静寂、幽玄的日本传统审美情趣的流露。谷崎通过明暗相称的色调,调和出冷色调的乳白,让读者想象母子团聚相拥而泣的浓浓亲情。

3. 白色的意蕴

白色的肌肤、白色的手臂、白色的面容、白色的裸足,谷崎对女性肉体的极致描述,给读者带来生理的、官能的快感,同时让读者感受到艺术不是精神的东西,而是完全实感的东西。张能泉^[12]指出,在谷崎的文学世界里,他以女性肉体的官能享受,代替伦理判断,以官能的书写代替道德的审视,将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尽可能排除在其艺术世界之外。因此为了实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谷崎将自己生命的活力与激情注入白色肉体之中,通过浓郁的官能书写极力地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气息;同时赋予白色超越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使其游离在现实世俗世界之外。在摆脱道德束缚的谷崎世界里,女性白色的肉体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作者创作灵感的源

泉,完美演绎艺术至上的文艺思想。可以说,谷崎的文学世界中,白色惯以女性肉体的形式出现,代表作者追求艺术的生命活力与激情。同时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说明作者笔下的白色色调并非一成不变。从赞誉代表西洋文明的纯白转而褒奖物体与物体的阴翳之间的幽暗之美,体现作者从西洋文明崇拜到日本传统古风幽玄的回归。

三、谷崎的色彩世界及其文化认同

鲁道夫·阿恩海姆^[13]认为“色彩能够表现感情,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假如在致力于研究与各种不同色彩相对应的不同情调,和概括它们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不同象征意义时,不注重探索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根源,就会走入歧途。”文学中色彩的运用既与特定语境中人物、环境、情感相适应,又是作家对色彩来自情感与心理上的选择,而此种选择往往与作家文化身份紧密联系。

(一)对东方文化身份的认同

谷崎出生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富贾之家,从小接受母亲严格的家庭教育,爱好日本古典文学,研习汉诗,这使他具备了传统东方文化素养,而父亲自由散漫、崇尚享乐的生活方式则让他对江户旧式氛围感触颇深。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东西方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日本人几乎全盘接纳了西方的文化,看上去似乎被同化了,……可是我认为几乎所有憧憬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人会在某个时候回归日本情趣,……虽然会有暂时崇拜西方的时代,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再次回归祖先传承的思想。”^[14]可见,谷崎对日本情趣持有强烈依恋,认为文化的回归是必然趋势。谷崎的回归,并非表面意义的日本或者东洋回归,而是内心深处强烈的本族文化认同。刘含力^[15]指出,东西方社会半个世纪的较量中,东方传统文化国家的集体败北让许多东方知识份子怀疑或批判东方文化,但他们内心的深处仍然流淌着东方传统文化的血液。谷崎长达55年的创作生涯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代,期间的挣扎和矛盾验证了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对近代日本文化的合围,经历东方文化的摒弃和西洋文化的向往的反复较量,谷崎内心始终钟情日本传统古典文学,情系东洋古典美学。

日本传统审美风格偏重素朴,很少追求华美和艳丽,这种崇尚素雅的特质对谷崎润一郎的色彩审

美情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色彩运用上,谷崎依据日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潜意识地从古典文学千百年积淀的色彩词中选择喜爱的赤青黑白四种色彩作为自己感情的对应物,其中尤其尊重和偏爱代表日本传统的青色和白色。谷崎描述女主人公服饰时通常使用单一的青色,勾勒如水墨画般的世界,用寥寥几抹青色,刻画出优雅动人之美,表现神圣的美感。同时通过白色的肌肤、白色的手臂、白色的面容、白色的裸足一丝不苟地演绎了日本民族的尚白精神。在色彩表现手法上,借用日本古老审美对象如文乐木偶、月色、樱花和物体之间的阴影,描绘出极具日本传统古典风雅幽玄的和谐世界。谷崎继承赤青黑白四色的传统审美情感,勾勒出或者神秘幽玄、或者静谧淡雅的唯美世界,使其文学世界呈现同《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一脉相承的日本民族色彩观和审美情趣。

(二)对西方文化的内化吸收

谷崎在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部求学时,正值文明开化后的脱亚入欧一边倒的时期,大量西方作品被译介到日本。谷崎深受希腊、印度、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影响,热爱爱伦·坡、王尔德、波特莱尔的著作,力图从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中获得创作的灵感。郝金梅^[16]指出,谷崎借用西方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思潮和西方的叙事、人物塑造和写作技巧,打破当时的沉闷世界。于是他在初期作品中习惯用浓艳、华丽、富有张力的色彩构思荒诞怪异的虚幻物语,通过浓厚的官能书写让艺术凌驾于生活之上。在初期作品色彩的运用上,谷崎强调突破传统,打破色彩的常规艺术法则和传统意义。《刺青》《少年》《秘密》中的赤色显然印证这点。赤色完全摆脱代表女性婉约含蓄的东方审美意识,变得奔放妖艳,演绎女主升华为女魔降服男性的过程,象征魔性的力量。在色彩的表现手法上,谷崎运用视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相融合的方式,调动读者全面而真实的官能享受。可见,在激进的社会变革中,谷崎以反传统的色彩意义、奇特的构思和西方的叙事技巧华丽登场,其文学作品显然带着日本近代文明初期文化殖民下的西方崇拜色彩。当西方文化的过度崇拜和日本近代文明的滞后出现矛盾时,作者追求的艺术和现实生活发生不协调。谷崎内心强烈的本族文化认同促使其创作中不断对近代文明进行内化和反思。关东大地震和移居关西后,谷崎的创作风格发生巨大转变,他消化吸收西方叙事技巧,转而扎根古典文学世界,运用古代物语体的行文手法,描写工业

文明下传统江户市井的社会风俗,彰显传统古典的审美情趣。在色彩运用上,谷崎放弃了五彩缤纷的色彩,转而运用单一色彩,其中色彩变化最显著的是白色,由初期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变为中、晚期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象征传统古风幽玄的回归。在色彩表达技巧上,谷崎将象征的手法和传统的行文手法相融合,运用“东方”和“西方”、“古化”与“欧化”、“单色”与“复色”相融合的叙事技巧,赋予传统色彩新的文学价值,构造出独特的文学世界。

四、结 语

本文以谷崎润一郎文学世界的色彩为中心,尝试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色彩的表现手法、赤青黑白的价值意蕴及其产生的根源三个方面分析谷崎的代表作品,深入了解谷崎文学世界的审美情感和价值意蕴。首先通过谷崎的色彩表现手法分析发现作者最喜好赤青黑白四个日本传统色彩,并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和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相结合的表现技巧,刻画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描绘出具有丰富感受力的文学世界。其次通过对谷崎色彩意蕴的分析得出赤色是让女主升华、男主沦陷的法器,象征魔性的力量;青色总是伴随妖女、魔女、恶妇的登场,象征诱惑力和想象力;黑色通过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具有多重象征性;白色通过女性的肉体象征生命的活力和激情,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中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象征作者对东方古风幽玄的回归。最后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总结谷崎润一郎作为中西方文化的接受者,继承日本色彩的审美传统和文化内涵,借用日本古老审美对象,描绘出风雅幽玄的古风世界;同时内化吸收西方高超叙事手法,使象征的手法和传统的行文手法相融合,赋予色彩新价值,创造出别出心裁、独树一帜的审美世界。谷崎润一郎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手法开辟了先河,更为可贵的是他建构了一个开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空间。

参考文献:

- [1] 宇佐見英治. 闇・金・灰: 谷崎潤一郎の色調[A]//大岡信. 日本の色. 東京: 朝日新聞社, 1983: 12.
- [2] 波多野完治. 作品と性格[A]//波多野完治. 性格診断の技術. 東京: 金子書房, 昭和 35: 43.
- [3] 张能泉. 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语言的绘画性[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5, 18(1): 170-175.
- [4] 夏目漱石. 文学論[M]//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 東京: 岩波書店. 昭和 41 年: 42-43.
- [5] 佐竹昭広. 古代日本語に於ける色名の性格[J]. 国語国文. 1955, 24(6): 331-346
- [6] 谷崎潤一郎. 刺青[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一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69.
- [7] 谷崎潤一郎. 少年[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一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179-180.
- [8] 张波. 中日熟字中“青”的色彩意象比较[J]. 学术交流. 2017 (12): 179-183.
- [9] 谷崎潤一郎. 人魚の嘆き[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四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203.
- [10] 谷崎潤一郎. 蓼喰ふ蟲[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十二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186.
- [11] 谷崎潤一郎. 少将滋幹の母[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十六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281-282.
- [12] 张能泉. 在艺术与道德之间游走: 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文学伦理解读[J]. 社会科学. 2017(3): 183-191.
- [13]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尧, 朱疆源,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460.
- [14] 谷崎潤一郎. 支那趣味と云ふこと[A]//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二十二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121.
- [15] 刘含力. 论谷崎润一郎对传统的回归: 以《细雪》为中心[J]. 群文天地. 2011(3): 44-47.
- [16] 郝金梅. 耽美与享乐的空间叙事: 对谷崎润一郎小说创作的解读[J]. 语文学刊. 2017, 37(1): 161-164.

(责任编辑:楼倚杉)



众筹模式下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机制研究

徐丹¹, 陈雪颂²

(1.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杭州 310012; 2.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综合运用符号学、传播学、复杂网络等理论, 对众筹模式下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对众筹中粉丝角色进行归纳分类, 然后讨论粉丝行为对话语网络结构的影响及不同话语网络结构下动画符号创作和传播效率差异, 最后从“神话”理论出发, 提出动画众筹模式颠覆了“上一阶段的意指转化为下一阶段的能指”的顺序。通过对粉丝经济下动画创作规律的理论探索, 希望更好地实现动画的文化和商业价值。

关键词: 动画形象; 话语网络; 符号创造; 众筹

中图分类号: J9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8-0382-07

Research of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animation image symbols in crowdfunding mode

XU Dan¹, CHEN Xuesong²

(1. Hangzhou College of Early-Childhood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theories of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and complex network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creative mechanism of animation image symbols in crowdfunding mode. Firstly, fan characters in crowdfunding are classified and classified.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fan behavior on discourse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difference of animation symbol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discourse network structures are discussed. Finally, based on "myth" theory, it advocates that the crowdfunding model subverts the order of "the last stage of the meaning of the index into the next stage of the signifier". This thesis i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ules of animation creation under the fan economy, which helps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animation.

Key words: animated image; discourse network; symbol creation; crowdfunding

目前,动画众筹在国内外已经非常普遍,其最初主要是为动画创作筹集资金,后来则转变为一种有效吸引粉丝关注的手段^[1]。参与众筹的粉丝主要起到两种作用:第一,转化为意见领袖,通过二次传播帮助作品吸引更多粉丝;第

二,帮助制片方在上映前检验影片是否符合市场需求。

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传播必定是双向的。众筹使得粉丝在创作阶段就和创作团队建立起联系,那么粉丝必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创作本身。罗兰·巴

特在其著作《写作的零度》和《作者之死》中提出,作品的诞生意味着作者的死亡,作品中相关符号的解释权力就移交到了读者的手里。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粉丝经济的发展,创作团队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两者共生的特点日益显著。动画众筹中,创作团队通常会将样片、人设、故事架构、衍生产品等原创内容(这些也构成了动画的核心符号系统)上传至网络来吸引粉丝和投资人,而受众通过这些信息也足以判断动画的价值。现有研究往往将动画众筹包含在影视众筹中,对二者并无特别的区分^[1-3]。但如果从动力机制入手,会发现真人扮演的影视作品和动画有所不同。对于前者,粉丝关注的往往是导演或者演员,明星粉丝很自然能转化为作品粉丝,从而获得流量^[2]。对于后者,粉丝则更为关注人设、造型、故事架构、人物关系等原创性内容,或者说核心符号系统,其众筹过程也就成为吸引早期粉丝、打造意见领袖、构建传播网络的核心环节^[4]。因此,有必要对动画众筹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采用符号学、传播学、复杂网络等理论,对众筹模式下动画符号形成的主要机制进行研究,重点探讨话语网络结构、传播行为、符号创作和演化(神话)过程等内容,以期对现有动漫传播研究有所补充和发展。

表1 中国近年来众筹成功的动画片

项目名称	众筹时间	获得资金	支持人数	众筹平台	票房
十万个冷笑话	2013年	137万元	5258	点名时间	1.2亿
大鱼海棠	2013年	158万元	3510	点名时间	5.6亿
大圣归来	2014年	780万元	89	朋友圈	9.5亿
纳米核心	2014年	168万元	8987	官网	(电视动画)
大护法	2015年	2万美元	79	Kickstarter	8760万
魁拔4	2017年	271万元	27380	摩点网	(未上映)

注: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归纳整理,下同。

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文创众筹平台有点名时间、摩点、开始、投黑马、希望树(已关闭运营)等。其它如支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平台也设有众筹板块,不定期发布影视类众筹项目。由于股权众筹在中国还存在法律障碍,大部分众筹项目提供给用户的回报主要有三类:实物类,如周边衍生品等;虚拟类,如游戏内测资格、兑换码等;体验类,如成为联合制片人、与主创团队聚餐、定制动画角色、首映门票等。

众筹的过程包含三方,分别是募资人、投资人、众筹平台。一个众筹项目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项目的安全性和回报模式是否让投资人满意;

一、文献综述

(一)众筹与动画众筹

众筹是通过互联网向大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它基于社会化媒体,能够拓展融资渠道并有效控制项目的财务风险^[1-2]。众筹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众筹解决了他们融资困难的问题。早期的互联网众筹大多通过论坛、社交网络等平台开展,世界上第一家专业众筹平台 ArtistShare 于2003年在美国创建,主要用来支持文化艺术创意项目。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创业公司融资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称《乔布斯法案》),这使创业公司股权众筹合法化。目前绝大部分众筹项目分为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两类,且以前者居多,主要包含设计、影视和音乐等作品^[1,3]。目前规模最大、管理最完善、作品质量最高的众筹平台是 Kickstarter 和 Indiegogo。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2月,已有五万多个影视项目(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动画)、两万多个游戏项目、六千多个漫画项目在 Kickstarter 平台上发布众筹^[5]。

中国目前文创类众筹平台规模较小,且缺乏像《乔布斯法案》那样明确支持股权化众筹项目的法律规定。尽管如此,近年来中国还是产生了一批众筹成功的动画项目,见表1。

二是平台能否吸引足够的(投资人)流量;三是募资人能否获得投资人的信任^[1]。项目募资人、投资人、众筹平台三方的行为与交互特性,构成了众筹的动力机制。

(二)话语网络理论与动画形象符号创造

动画形象是动画产业中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核心载体。符号学大师 Eco 在1972年分析超人形象时将超级英雄当作一种现代神话,他创造了集体梦境(oneiric climate)理论,这一理论成为现代流行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6],因此也有人将动画产业称为形象符号产业^[7]。

根据符号域理论,一定范围之内已有符号之间的碰撞会产生新符号,而这种碰撞被称为批判^[8]。话语(discourse)理论则是对符号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所谓“话语”,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包括说话人、听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是语言和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也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9]。也就是说,话语理论中不仅包含符号本身,还包含掌握符号的人和组织,体现了符号互动通过人的互动来实现这一特点。

如果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复杂网络理论,将话语中的主体(人、组织等)视为行动者,那么所有行动者及其关系之和就构成了话语网络^[10]。社会文化语境中各主体在话语网络中的互动,推动了他们所掌握的符号之间的碰撞,最终导致了新符号的产生。

以上解释隐含着结构主义前提,即话语网络的结构决定了符号创造和传播的效率。从这一视角出发,动画众筹行为会使得部分受众提前与创作者产生互动,改变传播结构,最终影响到动画形象创造的过程。

随着行动者网络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发展,目前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网络结构和动力学研究方法,引入这些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动画符号创造的过程。

二、动画众筹案例分析

(一)《大圣归来》案例分析

《大圣归来》由田晓鹏导演,路伟出品,制作成本约为6000万元人民币。从2012年开始制作,2014年下半年当制作接近尾声时还存在资金缺口,路伟决定发起一期众筹来募集资金。由于中国还没有类似于《乔布斯法案》的众筹法律,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公开平台进行股权众筹。如果通过公开平台进行众筹,给投资人的回报只能是电影票、衍生产品等,而不是项目利润的分成,并不利于大资金的募集。因此,路伟决定通过微信朋友圈来进行众筹,由于朋友圈不是公众平台,故符合私募股权的法律规定。通过此次众筹,最终有89人出资,共计获资780万元,这是动画众筹中获得的较大数额资金。投资人以金融圈人士、上市公司高管和电影圈同行等为主,除了金钱投入以外,他们还不遗余力地为作品宣传,如提供免费的户外广告、在自己朋友圈里推广、组织包场观影等。《大圣归来》最终收获近10亿元票房,平均

每位投资人获利约25万元^[4]。

《大圣归来》的众筹收获了一批种子用户,其中大部分具备线上或者线下意见领袖的特点,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该动画在上映之初就构建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粉丝网络,极大地推动了作品的口碑传播。除《大圣归来》外,路伟出品的影片《冈波仁齐》和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了成功的口碑营销。

(二)《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案例分析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由多洛塔·科别拉和休·韦尔什曼联合导演、编剧和制作,预算仅为550万美元,远远少于实际执行经费,所以两人决定通过众筹来解决人手和经费紧缺等问题。他们在2014年发起两轮众筹。第一轮是人力众筹,即从全球招募画家来共同完成这一影片。出于对梵高的崇敬,全球共有5000名画家自费来到波兰参加面试,最终被挑选出125名画家,共绘制6万5千幅油画。第二轮则是在Kickstarter网站为参与这部电影的画家筹集训练资金,出资人可得到画家在训练时绘制的油画或其他电影衍生产品。

2017年影片上映后获得北美票房550万美元,中国大陆票房7000万元人民币。而在影片创作期间的6万5千幅油画被留存下1000幅,除200幅用于展览,其他800幅以每幅数千欧元的价格在线销售,目前已经基本售罄,折合也可以收回数百万欧元。

《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众筹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筹集了部分资金;二是在艺术家圈子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也构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传播网络;三是所招募的画家直接影响了创作过程。

(三)《大鱼海棠》案例分析

《大鱼海棠》由梁旋和张春联合执导。两人在2004年共同创作了一个7分钟的flash动画(本片的前身),2005年共同创建彼岸天公司,2006年获25万美元投资并完成了15分钟版本的《大鱼海棠》样片。2013年梁旋将样片上传到“点名时间”平台并发起众筹,获得来自4000名支持者的158万元资金。虽然这笔资金不足以支撑制作,但却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也吸引了光线传媒的3000万元人民币投资。电影在2017年上映后获得5.6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

《大鱼海棠》贴吧在2006年就已建立,2013年众筹后贴吧用户数量暴涨超过十万人,这些粉丝构成了后来传播这部动画的主体。此外,该电影的主创人员经常在贴吧和粉丝们沟通互动,所以粉丝对

影片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部动画电影在还未上映时就已有了十万名粉丝,这在传统传播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

(四)小结

从以上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动画众筹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资金。《大圣归来》获取一批种子粉丝,通过二次传播来构建粉丝网络;《至爱梵高》全球招募合作画家、共同完成创作,是一种内容众筹;《大鱼海棠》则类似于通过众筹完成一次用户投票,宣告其在艺术和商业上的潜力,从而吸引有力的合作伙伴。但三个案例的共同点是,这三部动画影片都通过众筹有效改变了自身话语网络结构,构建了有一定规模的粉丝网络,不仅有利于传播和筹资,而且对创作本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相比之下,普通的影视众筹主要利用海报宣传,通过明星导演或者演员来吸引投资人,实际上利用了以明星为核心的话语网络的影响力,但并未重新构建一个新的话语网络,也无法对创作本身产生较大的影响。

下文将分析众筹行为对话语网络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导话语网络结构影响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机制。

三、话语网络结构及其对动画符号创作与传播的影响

(一)话语网络结构分类

常见的网络结构可以分为孤岛网络、小世界网络、无标度网络三种^[11]。这三种网络结构都可以在动画创作和传播相关的话语网络中找到对应。

孤岛网络指的是创作者只和其他少量行动者之间产生联系,类似于整个海洋上的一个孤岛。当然在互联网时代,真正的信息孤岛并不存在,至少创作者可以查阅到大量资料,这也是某种形式的符号碰撞。不过由于缺乏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近似闭门造车,很难产生优秀的作品。

小世界网络则指通过同事、同学、同行等关系形成的一个熟人小圈子。小圈子里的行动者们彼此熟悉,或者通过很少几个中间人就能产生联系,因此能进行充分的交流。在大部分商业动画片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话语网络结构都属于小世界网络。

举例来说,《大闹天宫》的创作者万氏兄弟成长于民国时代的上海滩,先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和《良友》杂志社(当时最优秀的设计师、画家、作家、编辑等文创工作者的集聚地)^[12]。这个朋友圈对《铁扇公主》和《大闹天宫》的创作都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而

中国当代的动画圈子也具备小世界网络的特性。

欧洲动画的独立工作室、制作人、投资人和政府机构通过会展、私人讨论、项目合作等方式彼此联系,产生资助和创作行为^[13]。这个圈子并不大,也是一种典型的小世界网络。

日本动画制作发行则实行“制作委员会模式”,由多家公司根据具体动画项目临时组建项目组,项目组为项目而生,项目结束即解散。该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产生了许多跨公司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了动画界的小世界网络,从而推动了围绕整体构思、世界设定、人物设定等的交流惯例^[14]。

小世界网络的结构特点是决策效率高,因此有助于提升动画形象的创作;缺点是网络中包含的行动者主要是圈内的,和观众联系少,因此在传播中存在缺陷,容易形成“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比小世界网络更高一个层次的是无标度网络,其特征是网络中节点的重要性符合幂律分布。粉丝经济下的话语网络就是一种典型的无标度网络,少量明星、意见领袖等连接了大量其他行动者,而普通人跟他人则只拥有少量连接。

(二)不同结构下的动画形象符号创作与传播效率

当代影视的明星制即建立在无标度话语网络的基础上。如鹿晗和杨幂在微博上各有数千万粉丝,粉丝中又有数量颇多的意见领袖,那么任何与他们相关的作品至少可以获得这批粉丝的关注,然后进行二次传播。由于受众基数大,即便只有一部分选择观看作品或购买衍生产品,也能形成对票房的保证。明星既是话语网络中的行动者,也是传播中的关键符号,所以其主演的这一部影片虽然和上一部没有关系,但粉丝会把对明星的关注转化为对最新作品的关注。

相比之下,动画形象符号很难跨越作品,最多只能影响自己的续集。但美国的动画企业通过体系化运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采用成熟的企业管理制度,导演、主创、漫画家等角色都是电影工业中链条的一部分,这些人根据市场数据分析的结果,不断挖掘和拓展动画形象的价值。如迪士尼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漫威英雄系列都是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动漫形象,卡通动漫明星因为无需高额报酬,反而比真人明星更具优势,能为企业带来稳定的回报。因此美国动画公司通过动画明星制,构建了一个包含海量粉丝的无标度网络,形成了创作和传播中的巨大优势。

上述三种话语网络结构及其对动画符号的影响

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话语权力内嵌于网络结构,因此创作团队在享受创作和传播效率的时候,也必然失去部分的话语权力。在孤立网络中,作者可

以完全掌握创作的权力;在小世界网络中作者不可避免受到各方的影响;而在无标度网络中作者创作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表2 不同的话语网络结构及其对动画符号的影响

话语网络类型	结构特性	例子	创作效率	传播效率	话语权力分布
孤岛网络	网络规模小,彼此缺少联系	学生动画	低	低	完全属于作者
小世界网络	网络规模适中,行动者彼此熟悉,或者通过少量中间人即可获得联系	中国、欧洲、日本的动画圈	高	低	创作团队受到朋友圈较大的影响
无标度网络	网络规模大,少量行动者拥有大量联系	美国的动画明星制	高	高	创作团队受到更为广泛的影响和约束

四、从小世界到无标度:众筹下话语网络的结构演化

不难发现,除了学生动画和实验作品以外,大部分动画作品在创作中分别依托于小世界和无标度两种话语网络结构。表3对这两种不同结构的话语网络的传播特点和权力结构进行了对比。在小世界网络中,关键角色是业内专家,他们会根据自身经验来

对动画创作充分提供专业意见,多数还会遵循一套既有的标准和流程;而在无标度网络中,关键角色则是意见领袖,他们会从直觉出发,从多角度提供一系列意见,有些意见可能彼此矛盾,或者充满噪音。两者相比,小世界网络的主要作用是告诉创作团队什么是对的,而无标度网络的主要作用则是试错。简而言之,无标度网络可以看成是一个投票机,可以明确看到用户对动画形象符号的态度。

表3 两种不同结构的话语网络的传播特性对比

话语网络类型	时间特性	空间特性	交互特性	评价机制	关键角色
小世界网络	慢工出细活	有限开放,多重壁垒	各种思想(符号)的充分交互	专家根据经验进行评价	业内专家
无标度网络	快速迭代	无限开放,跨界传播	简单交互、噪音多	粉丝主导的试错过程	意见领袖

从话语网络结构的视角出发,众筹的作用就是将作品创作所依托的话语网络从小世界网络改造成无标度网络,从而提升其创作和传播效率。在动画众筹过程中,通常会发布包括样片、人设、造型、衍生产品等一系列与动画形象密切相关的符号系统。网站用户通过对这些核心形象符号的审美判断,会产生以下几种不同的行为:a)不感兴趣、不再关注;b)感兴趣、关注;c)参与众筹;d)推荐给朋友。除了第一种行为以外,其他三种本质上都是获取了粉丝。其中一部分粉丝会通过贴吧、微信群、QQ群等社交平台组织起来,转化为意见领袖。成功众筹的作用就是将小世界网络演化为一个无标度网络。举例来说,参与《大圣归来》的众筹者虽然只有89人,但他们基本都属于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能直接影响到上万人,以此为基础进行二次传播则有可能影响到数十万人,由此构建了一个无标度网络。

论一直较少,在2013年众筹后粉丝和讨论数量都突然爆发,并出现了大量热帖,在电影上映前贴吧粉丝达到了10万人左右的规模。以上充分说明,动画众筹的确能在创作阶段就产生吸引粉丝、培养意见领袖的作用,从而改变话语网络的结构。

五、众筹模式下的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机制

(一)被颠覆的“神话”过程

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神话”就是指以动画形象为核心的整个符号系统的意指结构不断扩张,在传播中不断产生新的解释和符号,是“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向系统和信仰的复杂系统”^[15]。

根据“百度趋势”的搜索结果,《大鱼海棠》在发起众筹之前关键词“大鱼海棠”的搜索指数为600左右,而在2013年众筹后迅速上升到3600左右,影响力扩大了6倍。从《大鱼海棠》百度贴吧也可看出此次众筹的影响力:该贴吧成立于2006年左右,但讨

传统的动漫形象符号“神话”过程分三阶段走。第一阶段是“官方设定”,也就是创作团队来解释这个动漫形象;第二阶段是对动漫形象的再创作,如衍生产品设计等;第三阶段是“同人创作”,即爱好者们自由无约束地对动漫形象进行加工,甚至大大偏离官方设定,形成“外传”、“资料片”、“同人小说”等。如此,“上一阶段的意指转化为下一阶段的能指”,直到符号链延伸到文化和经济领域,从而创造出经

济价值。

这一过程还是循环的。当“同人创作”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之后,可能又反过来影响最初的官方设定,从而催生了全新官方作品的产生,如此循环。但在众筹制度下,以上神话的过程被颠覆了。

首先,“官方设定”和衍生品设计同步。由于众筹通常以衍生品作为回报,两者会同时发布在众筹网站中。其次,由于众筹中公布了“官方设定”,并吸引了众多粉丝,“同人创作”在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大鱼海棠》2017年上映前,许多粉丝接受媒体采访说:“从看到样片开始我就喜欢上了里面的角色,一直在想象他们在完整影片中的故事和情感是怎样的。”而主创人员也会以各种方式来关注粉丝之间的讨论,甚至会直接参与进来。这样创作团队和粉丝之间通过频繁互动,必然对后续动画形象符号的创作产生影响。

表4 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过程^[8-9,16]

创造过程	符号系统分析(解释)		新符号的想象(想象)	
	文化情景分析	讨论	建立批判能力	设想用户体验
主要行为	在社会文化环境下发现并分析有价值的符号	对动画形象符号所处的情境进行迭代讨论	从大量的创意和概念中进行挑选	根据选定情境,设想用户的反应
话语网络的作用	提供知识、概念和创意	提供参与讨论的解释者	提供批判者	参与想象
小世界网络	解决方案导向	优化解决方案	从经验和审美出发	由专家来想象用户的反应
无标度网络	问题导向	促使更多的符号碰撞	从直觉出发	粉丝行为直接体现,类似于投票

在“解释”过程中,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各有优势。无标度网络可以提供丰富的多元化观点和视角,产生更多的符号碰撞,提出更多的问题;小世界网络则有着更为丰富的解决问题的经验,有利于创造出符合艺术标准的新符号系统。在“想象”过程中,无标度网络在商业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小世界网络中的专家是根据经验来猜测用户会不会喜欢动画形象,而无标度网络是直接根据粉丝行为(类似于一个用户投票过程)来反映真实情况。

(三)动画形象符号创造机制

动画形象符号创造这一机制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第一是前因,其核心是动画众筹行为对话语网络结构特点的影响。互联网使创作者和受众建立相互影响的关系,使得受众有可能反向影响创作过程。而在动画众筹过程中,创作者通常需要发布样片、人设、造型等符号性很强的内容,以此吸引包含投资人在内的众多关注者。这些关注者和创作者又会以各种形式产生关系,如此通过众筹模式可将话语网络的结构从小世界类型改造成传播效率更高的无标度类型。

内容众筹则更进一步。如《至爱梵高》的人力众筹吸引了5000名画家报名,制作方从中选取125名加入创作团队。无论入选与否,这些画家彼此间本身就存在各种社会联系,如同事、同学、好友等,从而构成了一个支撑动画作品创作的社会网络。

(二)动画形象符号创造过程

动漫形象创造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创造过程,可分为“解释(符号系统分析)”和“想象(新符号的构建)”两个过程^[16],具体如表4所示。前者指通过对外部社会文化和技术等背景的认知和探索,构建一系列新的符号体系(如世界设定、人物设定等);后者指在此基础上根据对用户和市场的理解对此符号体系进行批判性、创造性运用。其中“解释”是一个构建过程,又可分为“情景设计”和“讨论”两个子过程;“想象”则是一个解构过程,又可分为“建立判断能力”和“判断用户体验”两个子过程。

第二是众筹模式下的话语网络动力机制。无标度网络开放性比小世界网络更好、容纳的符号数量更多、互动性更强,因此可以显著提升动画形象符号创造的效率。在无标度话语网络的动力机制下,动画形象符号的创造过程特点如表4所示。这就要求动画创作者能够充分利用无标度话语网络的特点,和受众保持有效的联系,推动更多符号之间的互动,并从噪音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是众筹模式下动画形象符号的“神话”过程。在传统的小世界话语网络中,动画形象符号的“神话”过程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在无标度网络中,这三个阶段被压缩在一起,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意指和能指之间的快速迭代特性凸显,也即创作者的符号创作还没有完成,受众就在此基础上开始直接进行二次创作,创作出新的符号,又反过来影响创作者。

总之,在互联网众筹模式下,动画形象符号的传播呈现了新规律。如能加以妥善利用,则能大大提升动画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效率,增加动画形象符号的商业和文化价值。

六、结 语

众筹的兴起构建了创作团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使得粉丝以多种形式影响到创作过程。同样,以上关系也使得创作团队在作品正式发布(上映)后仍能在后续的神话过程中体现自己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生与死已经不再遵循罗兰·巴特所说的规律,作者与粉丝之间也变成了共生关系,理解这一问题已成为理解当代动画创作规律的关键之一。本文从符号学、话语理论、复杂网络理论出发,提出众筹不仅是一种单向的营销传播渠道,也会对动画创作本身产生影响,并依次得出以下结论:

a)通过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归纳出参与众筹的粉丝具有三种重要的潜在角色,分别是意见领袖、评判标准、直接参与创作(内容众筹)。

b)提出话语网络结构决定动画符号创作和传播效率,其中三种主要的话语网络结构分别是孤立网络、小世界网络、无标度网络,并对其特点和对应的主要动画创作模式进行归纳。众筹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创作阶段提前将粉丝纳入话语网络,使小世界网络升级为无标度网络,起到提升创作和传播效率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真人电影在明星制下很容易借助明星的个人影响力构建无标度网络,但动画明星很难打造,因此众筹在构建无标度网络中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c)提出动画众筹模式颠覆了“上一阶段的意指转化为下一阶段的能指”的顺序,使得粉丝以多种方式参与到创作中,形成意指和能指之间的快速迭代,推动了动画形象符号的快速成熟。在这一背景下,正确理解动画符号的创作过程中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的特性,有助于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动画符号系统。

本文从话语网络分析出发,通过案例比较、理论分析等方法,对众筹下动画形象符号创作的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文中虽然应用了一些互联网数据,但主要还是以定性分析为主。未来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是构建相关模型,对众筹下用户的微观行为特点及由此导致的话语网络结构演化进行仿真,并将结果和现实中的数据对比,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二是深入剖析具体案例,研究话语网络的具体结构特性(如中心性、结构洞、关系桥、网络密度、网络规模等)对动画符号创作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 [1] 焦微玲,刘敏楼.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众筹:国外研究述评与展望[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5):65-71.
- [2] 虞海峡. 众筹:电影内容运营风险管理的试金石[J]. 当代电影, 2014(8):9-13.
- [3] 王宇琼. 电影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模式研究[J]. 当代电影, 2014(9):99-104.
- [4] 三文娱.《魁拔4》众筹金额超270万,《大圣归来》89位出资人收获3000万,但众筹真的适合中国动画电影吗[EB/OL]. (2015-09-27)[2019-05-23]https://zhuanlan.zhihu.com/p/27472222.
- [5] 钟舒婷.变成公益企业的众筹鼻祖,在创办六年里都改变了什么[EB/OL]. (2015-10-15)[2019-05-23].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16117.html.
- [6] EcoU, Chilton N. Themythofsuperman [J]. Diacritics, 1972,2(1):14-22.
- [7] 朱岳. 动漫产业的一个新视角:形象符号产业[D]. 南昌:南昌大学,2008:102-105.
- [8] Lotman I U M, Shukman A, Uspenskii B A, et al.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e[M]. Michigan: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45-50.
- [9]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04-106.
- [10] Dell' Era C, Marchesi A, Verganti R. Linguistic network configurations: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in design-intensive fir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8,12(1):1-19.
- [11] 王众托,王志平.超网络初探[J]. 管理学报, 2008, 5(1):1-8.
- [12] 施茜. 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D]. 苏州:苏州大学,2012:21-25.
- [13] 赵小波. 欧洲动画产业发展模式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9:67-68.
- [14] Chao T. Transmutation of worlds: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Fullmetal Alchemist the Movie: Conqueror of Shamballa[J]. Studies in Comics, 2013,4(1):159-170.
- [15] 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0.
- [16] Verganti R, Öberg Å. Interpreting and envisioning: A hermeneutic framework to look at radical innovation of meaning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3,42(1):86-95.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张 洁

(安徽三联学院就业创业处, 合肥 230601)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日渐升温,尤其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其研究也随之兴盛。学术界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划分为肇端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研究均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肇端期主要关注海外贸易研究,发展期的研究逐渐扩展到文化交流层面,兴盛期则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演变、贸易状况、文化交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尽管以往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在断代史研究、贸易对象、贸易产品、文化交流方面仍存在不足,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89-09

Research review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ZHANG Ji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has been rising day by day,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since "the 21 century Marine Silk Road" was put forward.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is also flourishing day by day.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beginning stage,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prosperity stage. The research in each stage has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the study of foreign trade is mainly concerned. The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gradually expands to the level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prosperity stage involves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arine Silk Road", trade situ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resourc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previous study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dynastic history, trade objects, trade produc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tudy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Key words: Ningbo; Maritime Silk Road; research review

宁波位于中国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北临杭州湾,西接绍兴,南靠台州,东北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宁波东临沧海,向西则是广阔的内陆腹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宁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早在 7000 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已活

跃于海上,并创造了河姆渡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句章港(宁波)是中国九大著名军港之一。在唐代,明州(宁波)是中日交流的重要港口。北宋时期,中央政府于明州(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市舶司,宁波为官方指定的开放港口之一。元代,庆元(宁波)仍然是中国的“三司”之一,继续承担着对外开放的任务。明朝嘉靖之前,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便是宁波。可以说在明清政府推行海禁政策之前,宁波一直是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

得益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提出和实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讨论与研究的重要主题,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综述已有学者进行总结,其中不乏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概述。如,陆芸^[1]以包括宁波在内的八个城市为中心,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了简要梳理;戚文闯^[2]对宁波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性著作也进行了罗列。上述研究对本文的综述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截至目前,学界尚缺乏专门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系统总结性论文。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以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开展国际性的综合研究与2000年以后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部分港口城市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两个重要事件为节点,大致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史分为三个阶段,并探讨各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肇端期(1987年以前)

1987年以前,只有少数中国学者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题进行相关研究,并且多对古代宁波港的海外贸易情况较为关注。林正秋^[3]将古代宁波海外贸易与交流的发展历史,分为秦至五代、宋元、明清三个阶段进行考察,指出唐末五代宁波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主要输出品是青瓷。宋元时期,宁波的海外贸易达到繁盛阶段,宁波除了继续同日本交往外,逐渐发展了与朝鲜、东南亚、南洋、阿拉伯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通商贸易,输出的货物品种日益增多,贸易额不断扩大。明清时期为宁波海外贸易的挫折期,明初宁波作为堪和贸易的唯一指定港盛极一时;嘉靖以后,受海禁政策的影响,宁波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倪士毅等^[4]对两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做了研究,认为两宋政府

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社会经济的繁荣、造船业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宋与高丽得以往来贸易的重要原因。徐明德^[5]通过对海外贸易机构的设立、日本遣明使团迎送的礼节、海外贸易航线和公私贸易概况、“争贡事件”和双屿港贸易商场的出现等进行分析,指出明朝宁波海外贸易的扩大,促进了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丝绸和青瓷外销是宁波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内容。忻鼎新等^[6]对明州港的丝绸贸易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源于明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旺,浙江丝绸业得到大力发展。在林士民^[7]看来,从明州港输出的青瓷,通过“瓷器之道”涉足五洲,促进了中国对外的友好贸易关系。

宁波的海外交通史同样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王泰栋等^[8]以时间为线索对宁波港的对外关系史进行了简单概括和梳理,指出在“瓷器之道”的开辟和中日交往过程中,宁波港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丁正华^[9]从航海史的角度,对明州港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指出因明州航运经济地理上的优越性,以瓷器和丝织业为代表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佛教传播的重要发祥地等条件,使明州港在唐代中日航海史上的重大转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编的《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10],共选录了论文15篇,对宁波港兴起、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宁波的海外交通与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等做了比较系统、详尽的阐述,是研究宁波海外交通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日本学者也关注到了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木宫泰彦^[11]在其著作中呈现了丰富的中日交流史实,其中有许多涉及宁波的部分,具有很强的资料价值。藤堂明保等^[12]指出宁波是遣唐使进出中国的大门。

1987年以前学术界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外贸易方面,对丝绸、瓷器等商品的外销,海外贸易航线、对象及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宁波的海外交通史同样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部分日本学者对宁波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有一定研究。然而,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较少,研究面窄且深度不足,可将该阶段称之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肇端期。

二、发展期(1987—1999年)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

开展国际性的综合研究。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兴起,并进入了新的阶段。

除了对官方贸易继续进行考察外,有学者开始关注宁波的私人对外贸易情况。葛国培^[13]指出,尽管明代宁波的私人贸易非常繁荣,但是朝廷并不允许。海商被迫走私,继而同倭寇、西方殖民者勾结骚扰沿海地区,其中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分外激烈。

商人和商帮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对这一群体的考察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黄约瑟^[14]简要考证了唐代明州商人李延孝的生平事迹,强调了商人在9世纪的中日两国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虞浩旭^[15]指出,唐宋时期,以明州商人为主要成员、以明州港为基地、以日本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明州商帮应运而生,这一群体曾在宁波的海外贸易史上发挥重大作用。

有关丝绸和瓷器的对外贸易研究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俞敏敏^[16]通过对浙江丝绸生产、外销与对外技术交流等问题的研究,论证了浙江是中国重要的“丝绸之府”,宁波在浙江丝绸外销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林士民^[17]通过对宁波出土文物的考察,指出宋元时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宁波)实现的。明州港是“陶瓷之路”的集散地与始发港。虞浩旭^[18]则认为,中国瓷器作为商品大规模外销始于晚唐,发展于南宋,极盛于元。他以唐宋元时期明州港海运码头遗址出土的四大窑系(长沙窑、越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产品为依据,对照世界各地的出土物,分析了四大窑系产品的主要外销港,认定明州港为中国唐宋元时期瓷器对外贸易重要和最主要的输出港。傅伯模^[19]谈到了明州与阿拉伯交往的情况,指出自隋唐时期开始,阿拉伯人就来到杭州、明州等城市经商,出售阿拉伯特产,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运往阿拉伯和欧洲。

这一阶段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到宁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林士民^[20]通过对历史资料与遗址、遗迹的调查考证与研究,证明了唐、吴越时期浙东明州港不仅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通商要埠,而且也是中韩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陶瓷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与纽带。方祖猷^[21]叙述了高丽名僧义通在明州传播佛教文化的事迹,并阐述了其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林正秋^[22]介绍了宁波育王寺、天童寺、普陀“不肯去观音院”等寺院与日本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指出明

州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

相关研究专著的问世,标志着这一阶段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始向着纵深发展。郑绍昌主编的《宁波港史》^[23]从经济、技术两个方面阐述了宁波港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港口发展的规律。林士民撰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24]一书详细论述了宁波的形成、发展、繁荣和演变过程,生动地再现了该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信仰、造船、航海等情况,并探讨了明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贡献。

纵观这一阶段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对海外贸易的讨论,开始涉及文化交流方面,并出版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专著。尽管相关研究数量略少,研究广度和深度尚有不足,但是这些研究逐渐形成专门的领域,并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期。

三、兴盛期(2000年至今)

21世纪以来,随着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部分港口城市联合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广泛,针对“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段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可将此阶段的研究划分为四个方面:

(一)历史阶段演变过程

与前两阶段不同,2000以后学术界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阶段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认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东汉,发展繁荣于唐宋,衰落于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的观点。林士民^[25]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分为古越海上丝路的启蒙期、汉晋海上丝路的开通期、唐代海上丝路的发展期、宋元海上丝路鼎盛期、明清海上丝路禁滞期、鸦片战争前后至建国前的海上丝路萎缩期、新海上丝路腾飞期共七个时期加以论述。时间跨度从河姆渡先民稻作农业开始,直到今天。后来,林士民^[26]又撰文修正了之前的观点,认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东汉时期的吸纳开通期,二是隋唐五代的交融发展期,三是宋元时期的输出鼎盛期,四是明清时期的持续发展至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宁波开埠后的吸纳期。鲍志成^[27]提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

时间上限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其时间下限应以学术界传统的帆船贸易结束到鸦片战争前后为限,不能无限的延长,他把近代西方列强以武力战争为先导的所谓“文化交流”成果也纳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中去。李英魁^[28]在对造船与航海技术、丝绸生产状况、现存文化遗产与遗物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东汉晚期至东吴赤乌时代,最终形成于唐显庆年间。林浩^[29]则认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东汉晚期,发展于唐代,繁荣于宋元,后续发展于明清,并就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学者们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界定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基本一致,仅在一些时间节点上略有差别。

为配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开展,2005年底,“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和日本等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30]。该论文集共收录了47篇论文,从港口贸易、多元文化等方面揭示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轨迹与兴衰过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始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化”的研究课题,来自中国港澳台和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为中国大陆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思考维度。

(二)贸易状况

这一阶段,传统的对宁波港海外贸易研究继续推进。车垠和^[31]分析了从明州出海的大唐商人在9世纪后期主导对日本贸易的原因。张伟^[32]指出,明州作为连接宋丽两国往来的窗口与纽带,在两宋时期双方官方贸易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李蔚等^[33]通过对考古资料等的研究,揭示了明州与博多分别为唐宋时期中国与日本交流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并有着悠久的贸易交往历史。李鑫^[34]通过对爪哇海域印坦号、井里汶号、黑石号三艘唐到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研究,结合宁波地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以及明州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资料,阐释了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与贸易模式。袁晓春^[35]通过对朝鲜李朝官方实录《备边司誊录》记载的两艘宁波商船孙合兴商船、“顺茂号”商船的海洋贸易史料的分析,再现了清代宁波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基本情况。张继军^[36]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对宁波双屿港对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指出葡萄牙商人利用双屿港延伸了欧亚新航路,并与东亚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日贸易、东南亚贸易等传统的贸易路

线相沟通,建立起全球贸易网。

对明朝在宁波进行的中日勘和贸易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是这一阶段贸易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小法^[37]通过考察宁波历史人物宋素卿渡日后的活动以及在勘合贸易中的表现,指出“宁波争贡事件”使得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但并没使得明朝政府对日本采取闭关绝贡的政策,而只是更加严格地执行日本来贡与国内海禁政策。童杰^[38]认为所谓“宁波争贡事件”破坏明日关系、导致明日勘和贸易终结的说法站不住脚,导致中日间的勘合贸易失去支持并告断绝的根源是作为掌权者的大内家的意外陨落。徐永杰^[39]指出“宁波争贡事件”最终使明日堪合贸易走向终结,走私贸易盛行。戚文闯^[40]也认为“宁波争贡事件”是其后猖獗的走私贸易和“嘉靖大倭寇”的发端。万明^[41]指出明代宁波在西方扩张东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长江下游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以及作为重要的走私贸易中心,其港口贸易体现了中外海上贸易中官方与民间矛盾冲突,反映了明代官方朝贡贸易即将终结和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盛发展的历史走向。王慕民^[42]指出16世纪初浙江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内部因素是明代中后期作为宁波港腹地的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外部因素则是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的东来以及“宁波争贡事件”后中日官方贸易渠道的不畅通。王慕民^[43]从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宁波在明代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据的中心地位,同时研究分析了上述两种贸易方式转换的原因。王立诚等^[44]提取宁波地区相关地方志中的碎片化信息,结合相关中日文献,对于“宁波争贡事件”的前因后果予以了探求。

宁波的海外贸易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学术界在这一阶段贸易研究方面的另一个热点。陈晔^[45]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同时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海上丝绸之路”。李小红等^[46]则认为海外贸易与唐宋时期明州地区区域地位的提升、商贸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海外贸易是唐宋时期明州地区发展的外在推动力。丁雨^[47]则主要通过考古材料对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情况进行辨析,其认为以往的研究夸大了明州的早期繁荣和陶瓷贸易在其中的地位。在朱爱武^[48-49]看来,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范围的不断扩大、制陶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以及市镇的兴起和大都市的繁华;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受到

繁荣的海外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舶司的设立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刘莉^[50]指出,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饮茶之风的开启也是宋代明州对外海上贸易的一个副产品。乐承耀^[51]分析了明代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制定的各种行政政策对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并以史为鉴,对当代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除丝绸、瓷器外,该阶段对茶叶外销的研究格外关注,并于宁波多次举办“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宁波茶文化促进会编写的《宁波:海上茶路起航地》^[52]收录了第三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与会海内外专家及学者的15篇论文,认定宁波是“海上茶路”起航地,并深入研究了宁波“海上茶路”的历史。竺济法编写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53]系统论述了宁波不仅为中国茶与茶文化对外交流通商的重要茶路与茶港,还很早就已开始种植茶树、烧造越窑青瓷贡茶具和拥有丰富的饮茶文化。竺济法^[54]认为“海上茶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茶路”启航地与禅茶东传门户是独特的宁波元素,其内涵极为丰富。林士民^[55]也认可“海上茶路”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海上茶路”早在唐朝就已通过明州港将茶与茶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

(三)文化交流

宁波不仅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的大埠,还是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一阶段,关于宁波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数量众多。在综合研究方面,刘恒武^[56]以文化遗存为原点,考察了宁波对外交流的历史实态及其变迁轨迹,全面地再现了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情况。谢安良的《丝路听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57]一书阐述了宁波繁荣的海外贸易史和海外丝绸之路的远期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佛教文化海外交流、日本遣唐使制度、青瓷文化等切面。林士民^[58]进一步指出,古代宁波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明州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带去的佛教、艺术、思想、建筑等文化对日本及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依据对外文化交流对象的不同,可将相关研究分为三类:

1. 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日本是通过宁波与中国进行交流最为频繁的国家,因而学界对宁波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研究十分关注。董有华等出版的专著^[59]汇集了历史上宁波与日本在友好交往中的大量史实。王慕民等^[60]阐述了从上古到明清时期宁波地方对外交流的发展情

况,并指出在中日交流史上,宁波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孙一敏^[61]指出明州商人团为明州成为唐中后期中日交流最主要的港口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李广志^[62]对日本遣唐使往返明州的航线做了系统的考论,指出在日本实际前往大唐的16次使团中,从明州港登陆的有3次(共6船)。另外,遣唐使从明州返航也有3次(共4船)。王心喜^[63]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吴越国通过明州与日本交往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张岩鑫^[64]通过介绍两幅地图——《舆地图》和《鄞县县境图》以及一幅绘画《入宋日僧荣西茶禅并修》,并结合丰富的史料阐述了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孔媛^[65]通过石刻这一独特视角展开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南宋时期特别是在明州中日交流情况的既有认识,还原南宋时期中日交流的实态。毛阳光^[66]指出元代的宁波不仅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与枢纽,而且也是对日战略进攻与防御的前沿,这给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刘恒武^[67]以日藏15—16世纪有关代表性的书画作品为焦点,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阐释文物本身包含的历史信息,以此考察明代宁波文人群体与旅华日本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实态。范金民^[68]和黄晓星^[69]以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入明经历为例,从不同角度探讨日本遣明使在宁波的文化交流活动。

此外,日本也是与宁波进行佛教文化交流最深入的国家。刘恒武^[70]认为宁波故城寺院的对外佛教交流开始于晚唐,兴盛于宋代,并延续到明代,其交流的主要范围是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佛教界。张德华在介绍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的文章^[71]中还顺带讨论了明州港作为日僧出入中国的主要海路门户的情况。其它研究文章,如董贻安的《唐宋时期的明州茶禅文化与“海上茶叶之路”》^[72]、江静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73]、李广志的《明州吉祥院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之渊源》^[74]和《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75]、刘磐磐的《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宁波天童寺》^[76]、何卯平的《东传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馆藏陆信忠笔〈十王图〉为中心》^[77]、刘恒武和陈竞翹的《萨摩塔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78]、冯晓霞《宁波寺院文化的理念与对外交流》^[79]也对这一方面进行了讨论。

2. 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朝鲜半岛是通过宁波与中国进行交流的主要国

家和地区之一。李容准^[80]研究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增进了学界对北宋与高丽交往情况的了解。刘迎胜^[81]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高丽著名史家金富轼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强调了金富轼在宋丽交往中的作用。杨古城等^[82]认为:高丽(新罗、韩国)的佛教禅宗正脉始于中国禅宗第九代唐代明州的大梅法常,由其继嗣新罗迦智在新罗弘扬;在五代期间再由明州子麟向高丽弘传明州佛事法会;在宋代时期,则由新罗坦然在浙东明州得中国禅宗第十七代之禅法正脉始成韩国禅宗之基础。

3. 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宁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一定的关注。傅亦民^[83]探讨了波斯陶出土情况、波斯陶外貌以及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文化交流概况。金国平^[84]着重探讨了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宁波双屿港的活动。廖大珂^[85]通过对Liampo(宁波)在欧洲地图的演变过程的考察,阐述了宁波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欧洲人记载中的Liampo的地理范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演变的,集中反映了欧洲人对宁波港的认识变化过程, Liampo与双屿港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

(四)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具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资源。关注对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也是该阶段的一大亮点。

宁波市文化局编著的《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86]一书主要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图录、文化遗产的描述、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关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陈艳^[87]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宁波部分的内涵、地位与价值,并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及保护方面将来要做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2016年11月22日,宁波市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办法》,给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以法律上的保障,该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对宁波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作用,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戴东生^[88]提出: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要加快依托宁波港口所具备的优势,打造港口经济圈,向内连接沿海的各个港口,并通过江海联运与海铁联运,覆盖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辐射广袤的中

西部地区;对外通过联结东南亚与日韩黄金航道,辐射东亚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以形成“一带一路”海陆联运枢纽。王倩^[89]着重研究宁波地区海商文化的发展现状,全面剖析宁波海商文化产业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并以此为依据,对海商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对策。斜晓东等^[90]认为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宁波帮作为活跃在中国商界的最大商帮之一,两者的关系是始终相辅相成的,两者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都占据着重要作用。此外以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索研究了宁波及宁波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地位、当下功能和未来使命,使其在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中争做桥头堡。

21世纪以来,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呈现井喷的趋势,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有了明确的界定,研究数量更多,研究涉及面更广,也更有深度,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最重要的是,学界开始关注到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问题,并就如何继续发挥现实作用提供智力支持。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兴盛期。

四、结 语

回顾学术界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理论及方法日趋完善。从一开始的纯文献分析到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研究,特别是考古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在有关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重要课题上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其次,研究内容由单纯的对外贸易扩展到涉及港口发展、海外贸易、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并已出版了大量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专著。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更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最大的学术亮点。再次,宁波当地政府及学术界举办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论坛、研讨会及博览会等重要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化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广阔平台。此外,宁波地区新设立了一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机构,如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共建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的成立,就为推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和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宁波大学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中一直“身先士卒”,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并已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以往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第一,断代史研究方面,学术界往往更多地关注文献和资料丰富的唐宋时期,对唐宋之前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关键期研究较少,少有的相关研究也略显薄弱,唐宋以后的研究也略有不足。第二,在贸易对象方面,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及与日本、高丽的关系研究用力颇多,而对相对弱势但也非常重要的南线、西线的关注较少甚至空白。第三,在贸易产品方面,对于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大宗商品较为关注,对药材、书籍和铜料等其他许多小额贸易商品的关注不够,实际上这些小额商品也是构成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对象的重要内容。第四,在文化交流层面,佛教文化交流始终是讨论的重点,但是诸如文字、绘画、雕塑、建筑等其他门领域的研究涉及较少。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对已有材料的深入挖掘,在新方法和新思路的指导下,未来有关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丰富的成绩。

参考文献:

- [1] 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丝绸之路,2013(2):13-16.
- [2] 戚文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80-88.
- [3] 林正秋.试论古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J].杭州商学院学报,1981(4):45-49.
- [4] 倪士毅,方如金.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81-91.
- [5] 徐明德.明代宁波港的海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3(2):56-63.
- [6] 忻鼎新,高汉玉.明州港的丝绸外贸与技术交流[J].海交史研究,1982:15-21.
- [7] 林士民.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J].海交史研究,1983:98-104.
- [8] 王泰栋,李政.宁波港对外关系史略[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2,4(2):99-104.
- [9] 丁正华.论唐代明州在中日航海史上的地位[J].中国航海,1982(2):114-118.
- [10]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M].出版者不详,1983.
- [11]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2] 藤堂明保,赵安博.宁波:遣唐使进出的大门[J].日语

- 学习与研究,1984(2):83-85.
- [13] 葛国培.明朝宁波的私人对外贸易[J].浙江学刊,1991(3):49-52.
- [14] 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J].历史研究,1993(4):47-60.
- [15] 虞浩旭.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J].浙江学刊,1998(1):77-80.
- [16] 俞敏敏.古代浙江丝绸的生产、外销与对外技术交流[J].海交史研究,1998(1):68-72.
- [17] 林士民.从明州古港(今宁波)出土文物看景德镇宋元时的陶瓷贸易[J].景德镇陶瓷,1993(4):40-43.
- [18] 虞浩旭.试论唐宋元时期明州港的瓷器外销及地位[J].景德镇陶瓷,1999(2):51-54.
- [19] 傅伯模.唐以来我国浙江海上与阿拉伯的交往[J].阿拉伯世界研究,1997(4):48-52.
- [20] 林士民.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之研究[J].海交史研究,1993(1):13-23.
- [21] 方祖猷.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9(3):35-44.
- [22] 林正秋.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J].海交史研究,1997(1):53-60.
- [23] 郑绍昌.宁波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 [24] 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 [25] 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
- [26] 林士民.浅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与分期[C]//李英魁.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8-58.
- [27] 鲍志成.试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及主要特征[C]//李英魁.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59-72.
- [28] 李英魁.试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历史上限[J].东方博物,2004(4):115-119.
- [29] 林浩.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各个时期特点的探讨[J].东方博物,2005(2):60-65.
- [30]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31] 车垠和.明州出海唐商的兴起与东亚贸易格局[J].社会科学辑刊,2008(5):139-143.
- [32] 张伟.略论明州在宋丽官方贸易中的地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13(4):50-55.
- [33] 李蔚,董滇红.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时期博多地区与明州间的贸易往来[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0(3):81-85.
- [34] 李鑫.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J].故宫博物院院

- 刊,2014(2):25-38.
- [35] 袁晓春.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宁波海商[J].民族史研究,2017(辑刊):223-238.
- [36] 张继军.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J].浙江学刊,2012(4):34-39.
- [37] 陈小法.明代“潜入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杂考[J].海交史研究,2005(1):51-61.
- [38] 童杰.从明日勘合贸易的历史进程看“宁波争贡事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26(6):68-72.
- [39] 徐永杰.宁波争贡事件再研究[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11):64-69.
- [40] 戚文闯.宁波“争贡”事件与中日海上走私贸易[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34(6):7-12.
- [41] 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J].海交史研究,2002(2):60-69.
- [42] 王慕民.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238.
- [43] 王慕民.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兼论官、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大倭乱”的起因[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5):23-28.
- [44] 王立诚,孙立春.明代宁绍地方志中的“宁波争贡”与中日官方贸易[J].现代商业,2017(16):182-184.
- [45] 陈晔.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交往[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14(2):124-127.
- [46] 李小红,谢兴志.海外贸易与唐宋明州社会经济的发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5):8-12.
- [47] 丁雨.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6):32-44.
- [48] 朱爱武.海外贸易发展与宋代明州经济结构的变迁[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8,20(4):38-42.
- [49] 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2(1):62-66.
- [50] 刘莉.宋代明州与高丽海外贸易发展因素分析研究[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37(2):115-122.
- [51] 乐承耀.论行政权力对明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6(1):81-84.
- [52] 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宁波:海上茶路起航地[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
- [53] 竺济法.“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 [54] 竺济法.宁波成为海上茶路启航地与禅茶东传门户的三大要素[J].农业考古,2011(5):268-271.
- [55] 林士民.明州港与朝鲜半岛“海上茶路”之研究[C]//沈善洪.韩国研究.第九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12):96-108.
- [56] 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 [57] 谢安良.丝路听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
- [58] 林士民.明州港在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4(3):34-37.
- [59] 董有华,李建树.宁波与日本航海交往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 [60] 王慕民,张伟,何灿浩.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1.
- [61] 孙一敏.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唐日贸易为契机[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0:37.
- [62] 李广志.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J].南开日本研究,2016:139-152.
- [63] 王心喜.论五代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J].海交史研究,2004(1):29-38.
- [64] 张岩鑫.谈宁波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由两幅地图和一幅绘画谈起[J].艺术教育,2018(23):147-148.
- [65] 孔媛.南宋时期中日石刻文化交流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5.
- [66] 毛阳光.元代宁波在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性格[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5):17-22.
- [67] 刘恒武.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的书画交流[J].文博,2008(4):72-80.
- [68] 范金民.从《入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流活动[J].史林,2013(3):60-69.
- [69] 黄晓星.明代嘉靖年间日本遣明使在宁波的文化交流活动:以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J].大众文艺,2018(1):241-242.
- [70] 刘恒武.宁波故城佛寺对外文化交流史实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3(5):75-80.
- [71] 张德华.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J].东方博物,2005(2):66-72.
- [72] 董贻安.唐宋时期的明州茶禅文化与“海上茶叶之路”[J].海交史研究,2005(1):43-50.
- [73] 江静.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 [74] 李广志.明州吉祥院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之渊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25(3):28-30.
- [75] 李广志.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3(5):81-85.
- [76] 刘磐磐.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宁波天童寺[J].黑河学刊,2011(2):55-57.
- [77] 何卯平.东传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馆藏陆信忠笔《十王图》为中心[D].兰州:兰州大学,2013.
- [78] 刘恒武,陈竞翹.萨摩塔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5):100-106.
- [79] 冯晓霞.宁波寺院文化的理念与对外交流[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7,30(6):52-55.
- [80] 李容准.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J].东南大学学报,2003,

- 33(4):526-528.
- [81] 刘迎胜.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J].海交史研究,2015(1):1-10.
- [82] 杨古城,曹厚德.古代明州与高丽的佛教禅宗交流[C]//金健人.韩国研究:第四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48-153.
- [83] 傅亦民.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J].海交史研究,2000(2):66-70.
- [84] 金国平,吴志良.试论双屿港起始年代[C]//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舟山工作站.舟山双屿港国际论文集,舟山,2011:168-178.
- [85] 廖大珂.世界的宁波:16—17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宁波港[J].世界历史,2013(6):43-55.
- [86] 宁波市文化局.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M].宁波:宁波市文化局,2002.
- [87] 陈艳.线路遗产与“海上丝绸之路”个案研究: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宁波段)为例[J].世界遗产论坛,2009辑刊:107-116.
- [88] 戴东生.“一带一路”海陆联运枢纽发展研究:以宁波为例[J].城市观察,2014(6):30-36.
- [89] 王倩.宁波地区海商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海洋大学,2016:2-3.
- [90] 斜晓东,蒋金坤,黄秀蓉.“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协同:宁波及宁波帮的功能使命[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9(2):65-69.

(责任编辑:陈丽琼)



从“平民文学”到“底层文学”的反思与追问

范家进, 金丽娜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五四时期周作人、胡适、鲁迅等人围绕“平民文学”各自提出了不同见解,周作人倡导“普遍与真挚”,胡适主张“田野的文学”,鲁迅则指出“平民文学”尚未存在,论争导致“平民文学”这一概念产生了较大的歧义。新世纪出现“底层文学”论争,其中关于概念界定、写作主体、底层经验等的论述,可以在鲁迅、周作人等人“平民文学”的理念中找到潜在关联。从文学的作者、受众和精神品质三个方面来考察新世纪“底层文学”乃至“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必须有勇气正视这样的现实:真正的“平民时代”尚未到来。

关键词: 鲁迅;周作人;胡适;平民文学;底层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98-08

Reflection and questioning from "civilian literature" to "lower-class literature"

FAN Jiajin, JIN L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ou Zuoren, Hu Shi, Lu Xun and othe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opinions on "civilian literature". Zhou Zuoren advocated "universality and sincerity"; Hu Shi advocated "field literature"; Lu Xun pointed out that "civilian literature" did not exist yet, and the controversy led to the great ambiguity for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there was a debate on "lower-class literature". About the discussion on concept definition, writing subject, and bottom-level experience,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s could b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literature" proposed by Lu Xun and Zhou Zuoren. "Lower-class literature" and "network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hree aspects: literature author, audience and spiritual quality. New century literatur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up to such a reality: the real "civilian era" has not yet come.

Key words: Lu Xun; Zhou Zuoren; Hu Shi; civilian literature; lower-class literature

新世纪之初,“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在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众多学者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学讨论中,包括“底层文学”的概念、创作主体、“底层文学”所继承的思想资源以及美学观念、道德倾向等众多议题。后随着相关争论的渐渐降温,面对“底层文学”存在概念分歧、对底层叙事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质疑、对其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失衡的反思等问题,有一些评论者重新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剖析了

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与偏离,给新世纪初这股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潮流寻求思想文化资源,以图为之开辟新的文学生存空间。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20世纪20年代鲁迅等人对“平民文学”的阐述来观察并思考新世纪有关“底层文学”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并简要反思鲁迅等人“平民文学”理念在考察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一、五四时期关于“平民文学”的讨论

五四时期,在新文学阵营的内部,也曾一度出现过一场讨论“平民文学”的小小潮流,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郑伯奇、俞平伯等人都曾参与其中。各人对“平民文学”的概念的界定及具体的内涵外延,都各有自己的理解而很难达成一致。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新世纪围绕“底层文学”的讨论有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关于“平民文学”的概念。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1]5-6}而胡适认为“但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一班人规定的只是那庙堂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庙堂的文学之外,还有田野的文学。”^[2]鲁迅则指出“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3]161}此处所引周作人、胡适、鲁迅三人关于“平民文学”的论述,足由此可见他们对“平民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就连周作人自己在《平民文学》的开篇也承认,“平民文学这四个字,字面上极易误会”^{[1]4}。可以这么说,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是在各自不同的概念界定下进行的论争,导致这种论争在某种意义上难以成立,三家各抒己见,最后却发现他们讨论的对象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整一场有关“平民文学”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错位的论争,下文将具体分析。

(一)周作人:普遍与真挚

“平民文学”首倡者非周作人莫属。早在1918年12月,周作人写成《平民文学》一文,指出“平民文学”是与“贵族文学”相反的文学。无论是“贵族文学”还是“平民文学”,在作者方面、写作对象方面、受众方面都是不拘泥于字面的,“平民文学”并非只能是由平民自己创作的、专讲平民的生活、专门做给平民读者看的文学,它与“贵族文学”区别的关键在于文学的精神,即“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周作人认为,“贵族文学”是“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而与之相对的“平民文学”则应该是内容充实的,也就是普遍与真挚的^{[1]5-6}。不应该写只占人口少数的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而应该写更为切己的世间普通男女;不应该只写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而应该写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不应该只追求文辞雕琢、以美为主,而应该表达真情实感,“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同时他还指出,“平民文学”虽

比古文更为通俗,但它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不必做到让田夫野老都能理解,“平民文学”也绝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伪善的慈善主义包裹着傲慢与私利,与他所倡“平民文学”的精神无法相容。^{[1]4-8}在该文中,周作人将其所倡导的“平民文学”纳入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时代大潮,又特别强调文学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能承载普通男女的生活和精神,能表达普通大众的所思所想所喜所爱,不事雕琢而淳朴自然,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努力做到“普遍与真挚”。

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理念在此显示出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平民文学”的作者、读者、描写对象并非必须为平民,言外之意是包括周作人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可以是“平民文学”的创作者及表现对象,乃至贵族生活也可以成为写作的题材,贵族本身也可以是这种文学的表现对象或阅读受众之一。换句话说,“平民”不是“平民文学”的关键,在整个创作与接受的过程中,“平民”群体是可以缺席的。作家创作一种与先前“贵族文学”相对的非部分、非修饰、非享乐、非游戏的文学,并命名为“平民文学”,可这种文学的核心却不在“平民”本身,而关键核心恰恰在于创作的主体——包括以周作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平民精神”,是否通过作品传达了他们这种在此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代“平民精神”。这其中不免透露着周作人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新文学倡导者的某种知识和道德优越感。他们站在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汇处,倡导一种理想形态的“平民文学”,敢于自作主张自标新帜,这确实需要一点前无古人的勇气。

(二)胡适:田野的文学

同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对“平民文学”与周作人的理解迥然不同。胡适的“平民文学”概念注重与传统和民间的联系,基本上等同于源自民间的文学。如果说周作人“平民文学”的核心在于创作主体的“平民精神”,那么胡适“平民文学”的核心则在于文学作品的“民间性”。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平民文学”的作者、读者以及内容。在周作人那里缺席的平民,在胡适这里成为了主角。胡适认为,“平民文学”的作者和读者(或许可以称为听者)就是来自民间的平民百姓,他们大都不识字;内容上则是反映民间生活,表现民众的生活现实和思想感情;另外在形式上,大多采用民间的形式,包括民歌、儿歌、故事等平民百姓能快速接受的形式,具有极强的民间性和极广的传播空间。胡适认为,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一班人是庙堂文学和贵族文学

的代表,而另外一些“平民文学”则是“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是“庙堂的文学”之外的“田野的文学”^[2]。

表面上看,胡适的“平民文学”观弥补了周作人“平民文学”观中平民缺席的不足,将平民群体置于“平民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关键地位,启蒙知识分子则暂时退出现场,不直接涉入此种文学的良性发展。但进一步思考推敲,胡适这种“民间主义”的“平民文学”观念也存在明显的漏洞。

第一,平民在场并不等于平民成功发声。按照胡适的思路,百姓创作和传播(传唱)的作品,反映的就是百姓的生活和精神,表达的也是百姓的心声与愿景,但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出于当权者的政治文化高压,或者受上层文化文学及乡绅趣味等的影响,平民百姓在创作山歌民歌的时候不免会有各种不纯粹的因素混杂其中,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平民文学”也在人生理想、构思取意及表现手法上袭取统治阶层的思路和格调。正如鲁迅所言:

“……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3]161}

第二,胡适理解的“民间文学”易于稀释“平民文学”。胡适从温和的改良主义视角出发,将白话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脉络打通,试图从“古已有之”的传统古典文学中为新文学寻找资源,这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路。但是在五四新文化大背景之下,若将“平民文学”置换为“民间文学”,这无疑消解了“平民文学”一词所蕴含的时代性与革命性。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之风吹进了腐朽的中国大地,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平民”一词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革命意义,而用“民间”范畴来为“平民”作注脚,无疑是稀释了“平民文学”在那个年代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平民的出场一方面弥补了周作人“平民文学”主张中平民缺席的不足,但从时代意义上看,胡适侧重“民间性”的平民文学观念更多地偏向于形式,从而在思想境界与深度方面与周作人关注“平民精神”的主张相去甚远。武斌斌^[4]指出,胡适对平民文学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为了寻求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民间文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戏谑、反抗也并不具有时代特征,它所承载的“伪道德”更是周氏坚决反抗和抵制的。

(三)鲁迅: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

面对人言人殊的“平民文学”,鲁迅在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发表著名演讲《革命时优的文学》,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他有关于“平民文学”的理念。鲁迅清晰地给自己所处时代定位,认为“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因为“工人农民还没有解放”^{[3]160}。在鲁迅看来,工人农民一天不解放,这世界上就一天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平民文学”的诞生是与工人农民阶级的解放息息相关的。鲁迅对周作人那种顾影自怜式的书斋里的“平民文学”显然不表认同,也对胡适那种将古典文学中的民间文学等同于“平民文学”的乐观思路不以为然。他站在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大转型的特殊时代语境中,为“平民文学”的概念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和创造意味,这一概念自此鲜明地打上了思想家鲁迅的独创意味和特有风格标签。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指出: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3]160-161}

鲁迅认为现在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做给上等人看的,就算是以平民为创作材料的作品,它们也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另外,如前文所述,鲁迅指出由平民创作和传播(传唱)的山野歌曲等,其实也并非真正的“平民文学”,因为老百姓受古书和乡绅的影响很大。鲁迅否认“平民文学”已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农民还没有解放,他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3]161},换言之,鲁迅所理解的“平民文学”,乃是由解放了的工人农民创作的、反映工人农民思想的文学。鲁迅这篇在黄埔

军校的演讲，以前被引用得最多的无疑是其中一句比喻性的说法：“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3]162}。

对鲁迅关于革命不同时期文学的不同处境和形态的高屋建瓴的洞察和预见，批评界总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加以轻忽。它蕴藏的信息量其实非常丰富。就本文话题而言，鲁迅是对同时代一些文化人关于“平民文学”的种种议论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回应，表达方式不是批驳他并不认同的他人论说，而是干净利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彻底否认中国乃至全世界已存在真正“平民文学”的说法——“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3]160}。

除了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现状这一显然与周作人、胡适都迥然有异的判断，在该演讲中，鲁迅还根据自己对中外文学发展历史和掌故的熟稔，简明扼要地区分了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可能出现的文学的不同性质、特点和发展形态。也即革命前的“鸣不平文学”“怒吼文学”，革命过程中的“文学沉寂”“没有声音”以及革命后的“讴歌文学”“挽歌文学”，“再往后去”则是“平民文学”^{[3]157-160}。考之鲁迅演讲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他的观察和预言基本上可以得到历史的证实，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分别能找到与鲁迅命名相对应或大致相符的发展阶段。只是他演讲时关于“再往后去”的对“平民文学”的期待和预测，与实际发生的文学情状之间，显然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按照鲁迅的思路来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项需要更多投入的学术任务。本文暂无暇于此，而只是将眼光跳到新世纪初一场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上，看看它在概念的提出、论题的展开及探讨的面向和深度等方面，跟鲁迅当年的思考与预测之间，是否可以做点跨世纪的分析与比较，以便为考察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现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思路。

二、新世纪初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时期文学”总体说来多姿多彩、富有活力，且伴随一些虽未充分展开却也具有一定热度的话题争论。1990年代开始酝酿、到了新世纪初的一些年份一度蔚为大观的“底层文学”思潮，也可视为这种活力的表现。它跟多数“新时期文学”话题一样，忽然一度备受关注，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一时间歧义纷呈。各家莫衷一是，未能出现高屋建瓴、海纳百川的理论概括或是足以显示这一旗号创作实绩的富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故而也免不了很快偃旗息鼓的命运。本文自然也无意系统考察

这一文学现象的起与落、兴与衰，也无暇展开对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分析，而是主要针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代表性论点，简略考察一下它们的理论资源、思考方向、话题展开方式、各自使用此一概念时在内涵与外延上的歧异，以及话语背后的思想文化诉求，等等。当然本文也试图借此观察一下这些议论与1920年代鲁迅的“平民文学”表述与设想之间，是否可以寻找到某些理论关联，两者之间是否也能达成一次相距80来年的间接的隔空对话。

(一)“底层文学”的论争内容

跟“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数论争一样，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也显得凌乱和含混，而且免不了自说自话，并没能经过一定的讨论形成一种被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广泛认可的共识^[5]。所以如果用一种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充其量也只是具备了某些“思潮”的外观或样态而已。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归纳。

第一，有关“底层文学”的概念界定。同五四时期“平民文学”一样，“底层文学”也因“底层”一词的复杂内涵和宽泛外延而难以赋予其某种单一的意义，什么是“底层”？“底层”的范围在哪里？哪些文学作品可以被定义或归入“底层文学”？对于这些问题，众多评论家各执一词，终未能就“底层文学”的概念问题达成一种共识。

国内文学评论界最早究竟何人使用这一概念似乎尚无定论，郭文元在《周作人“平民”文学精神与新世纪“底层文学”论争》一文中指出，“多数评论者是从社会学属性来界定‘底层’的，甚至有人把‘底层’具体窄化为‘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6]人是社会中的人，应该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关注和书写“底层”，而从这一维度出发，其关注焦点便自觉地集中到了“底层”在物质层面的压抑与困境。但同时他也指出，“但文学……仅仅停留于对主人公物质权利境况的关注，有可能带来对‘底层’所受精神困境的忽略和遮蔽。”^[6]事实确实如此，物质生存水平不能等同于精神境况，贫穷不能用作“底层”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底层”的现实境遇中不单单只有“贫穷”一个关键词，仅用它来叙述“底层”未免显得以偏概全。文学的任务除了揭示物质生存现状之外，更要关注在此种现实困境之下的精神困境，以期寻找摆脱这双重困境的方式与途径，这才是“底层文学”应有的品格与韧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底层人民”面临的物质困境或生存苦难不值得作家去书写，也不是说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之间互不相干，恰恰相反，人的

精神空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做基础支撑(除非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已经特别独立而发达,那又另当别论)。因此,我们所期待的“底层文学”,应该是能够正视与发现这种“双重贫困”并且予以准确描绘的。

第二,有关“底层文学”创作主体的界定。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在确认“底层文学”的书写权。由谁来书写“底层”? 怎样的作家可以被划归为“底层作家”? 是精英知识分子代替“底层”发声,还是由“底层”自己发言? 如果是由“底层”自己发言,那么当该作家作为“底层代表”发言的时候,他的“底层”身份是否又有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他是否还属于纯粹的“底层”? 若不是,那么所谓的“底层文学”是否就陷入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怪圈?

围绕这些问题,评论界有过不小的争论,有些论者认为“底层文学”由知识分子代“底层”发声无可厚非,且应该由掌握学识的知识分子来为之“代言”。之所以被称为“底层”,是因为这一阶层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最低端,往往没有足够的书写能力来表达自己,从而沦为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日常谋生方式是从事物质生产或服务,虽然识字能力已普遍提高但还不能够准确而完整地表达自己。作为一个阶层,他们需要由“底层关怀”的知识分子来为其代言,代他们发出心声和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分论者的观点与上世纪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理念相近,有良知的作家秉持着“平民精神”创作,写“平民”之不能写,说“平民”之无力说。

也有另一部分批评家认为“底层文学”不该由知识分子横插一脚,“底层文学”就该由“底层”自己来做。他们的理由是,知识分子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们看到的“底层”必然有限,因而对“底层”的叙述终不免成为一种“脑补式”的虚构,对“底层”的认识大多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不能拨开诸如“贫穷”、“愚昧”、“粗俗”此类外在标签或既有惯性认知,单刀直入地深刻剖析“底层”人民的真正精神困境或精神创伤。“前者‘代言’出的世界只能是‘代言者’想象出的‘底层’世界,其与真正的‘底层’世界是相‘隔’的……”^[6]但这一部分论者所面临的尴尬正如上文所说,当某个“底层民众”作为“底层代表”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她往往已被冠上“作家”的名义,而在人们的主流认知概念中,一旦跻身于“作家”行列,即刻与“底层”相距甚远。在创作主体这个问题上,“底层文学”掉进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陷阱。郭元文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即使是‘底层’出身的打工作

家,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属的阶层。”^[6]。这正印证了上面所述的“底层”身份的悖论。张光芒在他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底层”身份的荒谬之处,他认为“‘底层’其实就是一个大分母,许多人自以为是已经跻身于更高层级的‘分子’,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幻像。”^[7]

(二)“底层文学”的悖论

“底层文学”概念确实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针对这一悖论,王晓华提出“作为公民的写作”^[8]这一概念,目的是能够弥合“作家”与“底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与鸿沟,即在讨论“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之前,先人为地预设一种“众生平等”的大背景。“作为公民的写作”消除了“叙述者”与“被叙述对象”之间的不平等性,从“被叙述者”转变为“叙述者”的过程中,其身份并未发生改变,自始至终都是“公民”,因而“身份认定”这一难题将不复存在。可以说“公民”概念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但是它又带来了另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何界定“叙述者”和“被叙述者”? “被叙述者”都能转变为“叙述者”吗? 倘若能够,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在完成转变的过程中,“叙述者”的精神状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先看前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被叙述者”,“底层文学”中的“被叙述者”到底是什么? 一般都可以想当然地回答:“底层文学”的“被叙述者”自然是“底层”,是“底层”的人与事。但正如前文所述,究竟何为“底层”,“底层”究竟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预见的“平民文学”的创作者和创作对象,确实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3][161]}。但近百年过去,当“平民文学”逻辑上的隔代继承者“底层文学”登上文坛的时候,人们却无法给鲁迅一个想象性的明确回复,这些写作者和表现对象究竟是否就是当年鲁迅所期待的“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都很难跟鲁迅当年的演讲构成有效的对话。

再看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从“被叙述者”转变为“叙述者”这一过程中人精神状态的变化。“公民”强调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平等,但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各式公民之间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平等,也无法实现公民在知识、精神、信仰、价值观等层面的整齐划一,甚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个人心理价值层面的多元多向局面就更为显著。这样一来,“作为公民的写作”也只能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强调“众生平等”,实际上同样无法弥

合各式各样的“公民”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上的极大落差。而“被叙述者”一旦得以跻身于“叙述者”行列，其外在生活方式及内在精神心理方面的诸多变异和转移，都是不言自明的。简言之，今天这个“公民”早已不是昔日的那个作为“被叙述者”的公民了。

另外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公民的写作”消除了“底层”与“上层”这两个词汇，“公民文学”取代“底层文学”，“底层文学”也就不复存在，那么试问我们现在讨论的还是“底层文学”吗，是否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连讨论对象都丧失了，讨论本身就失去了价值意义。因此在笔者看来，用“作为公民的写作”来阐释或者说取代“底层文学”是颇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与五四时期胡适混淆“民间文学”与“平民文学”两个概念有类似的偏颇之处。

三、“平民文学”的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

一个是“平民文学”的命名与展望，一个是“底层写作”的讨论；一个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期的1920年代，一个发生在新世纪初年。尽管两次不同形式和热度的讨论之间相隔了80多年，两个时代之间的具体语境以及参与者之间也存在天悬地隔，可它们还是可以引发人们对于文学史上这些同类或相似概念或范畴的对比和思考，并借此窥探文学史的某种发展路径和曲折而又艰难的演进轨迹。不妨首先从文学的作者、受众和精神品质方面做些比较分析，然后简略打量一下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

（一）文学的作者问题

按鲁迅的理解，是否平民自己来“开口”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有能力自己来“开口”或写文章的毫无疑问是“总比农民富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职业写作者。以“修辞立其诚”、文学忠于自我的要求来看，作家或知识分子对其他阶层人物的描写不太可能完全摆脱居高临下、悲悯同情的姿态，“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即便是鲁迅，对于笔下的农民也只能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存在着“双向隔膜”的现象^[9]。茅盾写农民、老舍写北平市民、巴金写旧家族中的仆女丫鬟，也基本上只能采取这样的现代启蒙者姿态和笔墨。要他们彻底置身真正的平民中间，完全感同身受，这是脱离文学史发展实际的高蹈的要求。而事实上在中外文学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一批从统治阶层叛逆出来的为平民说话代言的“忏悔的贵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

众接受教育的程度得到了普遍提升，大众的书写能力普遍有所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也为鲁迅当年所展望的“平民文学”书写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但一般的应用性书写与文学书写或文学创作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所谓“诗有别裁”，“文学”书写有其独特性，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更丰富细腻的情感、更敏锐独特的生活发现能力以及更高超的文本形式创造能力，这些都并不是只要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能具备的。从理论上说，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大家理应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或者别的具有丰富“底层经验”的各类人士。但这些人群中具有较高文学书写能力的人所占比例不会很高，甚至一旦具备了这种能力而且通过写作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后，也往往很快不再继续在底层求生存。因此，倘若说“平民文学”或“底层写作”一定只能由平民或底层人物自身来从事并且作为其中的主体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事实上，有过或长或短的底层经历、或是建立在一定时期底层观察体验基础上的写作，甚至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底层调查报告等，都应该可以归入广义的“底层写作”。换言之，以较高行业标准为前提的“代言式写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当然，依旧置身底层的人们能尽可能多地自己开口、自己说话，无疑是越多越好。它自然也需要别的外部条件与其配套，譬如发表空间等方面。

（二）文学的受众问题

五四新文学的精英性和先锋性已被学界公认。鲁迅的母亲就从来不会阅读鲁迅本人创作的白话小说，鲁迅为她老人家购买邮寄的是张恨水等人的通俗小说。赵树理在1930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训练时，发现新文学根本进不了农村识字人的视野，所以他称新文学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是仅能用于文人之间相互交换阅读的“交换文学”。更多的新文学工作者在抗战当中有缘进入乡村社会时，终于发现农村所流行的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传统读物。所以，即便是新文学倡导者主观意愿上竭力要为工农大众写作，普遍不识字的工农大众也无缘接触新文学作品，更不用说熟悉、亲近或喜欢。伴随着政治革命而展开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文艺活动，在某个层面上试图面对或解决这个问题，但它们与鲁迅、周作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之间所存在的落差和歧异不可以以道里计。那么，新世纪初“底层文学”的阅读者是否大有改观呢？是否符合鲁迅等人当年的期待呢？情况其实也不容乐观。工农阶层及其子女识字

率的普通提高是毋庸置疑的,但具备阅读能力以后未必就是文学的热心读者,在诸多可供选择的各式读物当中(当然包括很多实用性读物和非虚构类读物)，“平民”或“底层”身份的读者有太多的理由去选择非文学类读物。更何况随着电子科技的发达,影视作品、电子游戏、智能手机上应有尽有的各式娱乐消遣产品,都远比一般文学作品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对大众的进入门槛显然都更低更简易轻松。进而言之,平民在物质生活水平和识字率都普遍提高以后,还拥有旅游、购物、健身、电竞等林林总总的似乎更有趣也更轻松便捷的打打工余时间的选项。这么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平民读者关心和阅读表现平民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一美好想象也终将属于某个时代文人雅士的一厢情愿?但同时还必须承认,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定比例的文字文学产品爱好者总是存在的。

(三)文学的精神品质问题

周作人认为“贵族文学”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他提倡与之相对的内容充实的“平民文学”,强调作家要带着“平民精神”来创作“普遍与真挚”的文学^{[10]5}。“平民文学”的作者与受众都不限于“平民”,而是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他在另一篇文章《人的文学》中说过,他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学^{[10]13},其中蕴含着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的特有尊重。“力求文学启蒙的同时保存个人发展的个性,在两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的位置。从这方面来说,‘人的文学’观念成为提倡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的思想基础。”“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就是‘人的文学’”^[11],其“平民文学”观念是超越阶级的、一种广义的“人类爱”。在鲁迅那里,“平民文学”则是由彻底解放了的工人农民阶级创作的、表达他们自身思想的文学^{[3]161}。这里的“工人农民彻底解放”,指的就是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不再受到任何压迫与剥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解放”指的是工农的解放,而非工农阶级斗争胜利以后重新建立新的政权,开启新一轮阶级斗争。如此看来,虽然鲁迅与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有各自的关注点,但他们的文学理想还是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点,即关注“人”本身,不但关注“人”所处的具体生存环境,也关心“人”在精神上的健全与平等。而浏览新世纪有关“底层文学”的论争,大多围绕“底层”的概念界定、创作主体能否代言、“底层作家”身份可信度等问题,涉及的范畴基本上停留于外在层面,而关于这类写作

的内在精神品格与艺术品格等内部问题的探讨却相当不足。不得不说,新世纪这场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在思想深度和知识眼界上比起当年“平民文学”论争是有很多欠缺的。关于它的一些讨论很快偃旗息鼓而难以持续深入,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可否视为“平民文学”的一种替代品?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网络的日趋普及,一种全新的小说创作模式和形态也应运而生,那就是“网络文学”。世界的发展总是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现象。这样一种完全出乎五四先贤们的想象的、全新形式的网络文学,是否也可以借助“平民文学”的理念来审视一番呢?因为至少它在形式上具备了“平民写”、“平民看”的可喜外观,理论上具备了全民皆可创作的属性。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这里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加以简单讨论。

网络文学,顾名思义,就是网络作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网络写手)以网络为创作平台而发表的作品。相较于传统的纸质文学,网络文学具有创作量大、传播速度快、阅读门槛低等特点。具体地说,网络文学可以拆分为网络 and 文学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网络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文学又是它应有的客观属性。网络的容量巨大,藏污纳垢的能力也很惊人。当文学与如此庞大的网络容量相结合,就注定了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需要背负着文学以外的重任——诸如商业淘金、舆论造势、娱乐炒作等等,它们当然偏离“文学”本身的传统功能。从1998年痞子蔡发表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引起关注至今,网络文学具有居高不下的创作量,它也从最初自成一格的行文模式发展至今天“娱乐至上”的创作观、消费观。网络文学的质量远远跟不上其创作的数量,文学的精神日渐丧失乃至消亡,大尺度不健康的肉欲书写及其他低俗情调和趣味溢满屏幕,“快餐式消费”催生了“快餐式文学”。网络小说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语境下,难以逃脱泛娱乐化、泛商业化的宿命。

毫无疑问,网络文学革新了作家(文字工作者)的创作方式,也改变了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传统习惯(一种自古相传的案头独自静读的方式)。网络的开放性与大众性催生了众多的写作者,鼓舞着更多有着表达欲望的人们参与到“全民写作”中来。与传统的严肃文学相比,网络文学似乎是一条通往“平民文学”的捷径。网络作家通过网络与读者见面,这就意味着任何人只要有一台联网的电脑(甚至一部入

网的移动手机)就可以成为网络写作者,这种全民平等参与、自由创作、开放评论的氛围是传统文学所难以企及的。这是否意味着“网络文学”的诞生使人们提前进入了“平民文学”时代了呢?——在笔者看来显然不是。创作与阅读传播的自由开放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学的进步,相反,网络文学在某些方面可能成为遏制文学进步的绊脚石,因为它们流品不一、泥沙俱下,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作品已基本上无文学精神可言。按照周作人“平民文学”思路,只有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秉承“平民精神”创作的“为人生”的文学才称得上是“平民文学”,它必须是反映最普遍男女的生活,表达最真挚的思想情感的文字。反观眼下海量的网络文学,在“平民写”的道路上越走越偏,非但没有走到“写平民”,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书写达官贵胄、霸道总裁、皇亲国戚等等“部分的”人的生活。现在的网络文学也很少敢于直面现实,反而大多具有越来越强的虚构性和幻想性。这么一种书写路径,难道不是重蹈当年周作人所批判的“贵族文学”、“才子佳人小说”的覆辙?看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轮回,某些网络文学的写作又重新堕入周作人所厌弃的“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泥淖中去了。

面对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传统文学批评总体上还处于失语状态,一时难以给予准确而清晰的定位和描述。但既然冠之以“文学”,就算是将它纳入了文学的大花园,那自然就不能片面强调其技术性而丢失文学本质。网络文学的个性娱乐风习,显然浸淫着“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文化风尚,沾染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种种弊端。而事实上,文学恰恰只有与时代风尚自觉拉开一定的距离,至死不渝地坚持着开掘和反省个体精神与时代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对存在的勘探”^[12],才能在日趋物化的时代里取得继续生存和生长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网络文学也亟需经由鲁迅“平民文学”理念的洗礼,将真正解放的、现代的平民思想融注其中,从而切实提升其应有的精神品位和艺术品格。

四、结 语

从五四时期到新世纪,从“平民文学”到“底层文学”,从鸳鸯蝴蝶派的新才子佳人小说到网络文学,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回环往复”的发展迹象。但当人们沉入到两场争论的底部,却无奈地发现这种“回环往复”不一定是上升的、前进的,当代评论界对“底层文学”的讨论与当年

周作人、鲁迅等人达到的高度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评论界热衷于对概念等外部问题的争论,因过分关注“底层文学”的社会属性而作茧自缚,将精神世界这一亟待开辟、深入的领域悬置一边或浅尝辄止,始终未能正中“底层文学”的靶心。而真正触及“底层”民众灵魂的文学,应该是当年鲁迅、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平民文学”精神的延伸,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作家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去书写被书写者所处的真实处境,在叩问自己内心的同时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审视。同时,评论家也有责任积极促成“底层文学”向良性方向发展,积极呼吁向真正的精神、艺术高塔攀爬,警示作家们突破“比苦比穷比惨”的底层叙事固化模式。我们当然有理由对“底层文学”抱持一种不无乐观的期待。不过对于文学发展的现状,如果不时回顾鲁迅、周作人等人近一个世纪前关于“平民文学”的讨论和期望,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样的现实:真正的“平民文学”时代尚未到来。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平民的文学[M]//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4-8.
- [2] 胡适.国语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8.
- [3]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M]//鲁迅.鲁迅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5-163.
- [4] 武斌斌.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与发展[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3):79-83.
- [5] 范家进.底层叙事:文学界的一场话语自救运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6):47-55.
- [6] 郭文元.周作人“平民”文学精神与新世纪“底层文学”论争[J].当代文坛,2012(1):120-123.
- [7] 张光芒.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J].学术界,2018(8):43-57.
- [8] 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文艺争鸣,2006(4):34-38.
- [9]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84-85.
- [10] 周作人.人的文学[M]//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3.
- [11] 廖宁.“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诉求与差异:以周作人为中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5):88-92.
- [12]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3.



“一带一路”视角下白俄罗斯绿色发展方式及其借鉴意义

周光迅, 高伟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当前, 不仅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 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在此背景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新绿色发展方式是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任务。白俄罗斯共和国(白俄罗斯)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支点国家, 历来对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 形成了生态优先发展的理念, 制订了相对健全的环境法律法规, 坚持区域生态一体化的协同发展战略。这不仅为白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条件, 而且促进了该国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引领者, 白俄罗斯绿色发展的独特经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绿色发展方式; “一带一路”; 白俄罗斯; 生态环保合作

中图分类号: A8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406-08

Green development mode of Belaru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lt and Road" and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ZHOU Guangxun, GAO We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world, not only does 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continue to be weak, bu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lso deteriorating. In this context,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d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and innovating green development methods are urgent tasks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Belarus) is an important fulcrum count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t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med an ecological priority development concept, formulated relatively sound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adhered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gional ecological integration,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the solid guaran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larus, but also promotes enormous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the country. China is an advocator and leader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Belarusian green development has profou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ven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mode; "Belt and Road"; Belar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二十世纪初, 有学者提出了绿色发展方式, 各国纷纷响应。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导向, 追求低能耗、低熵、低排放、高效能的发展方式,

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 中国倡导并推进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

展是当前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议题。那么,如何将绿色发展应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王学峰^[1]提出要从全球的视野看待绿色发展,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践行绿色发展行动。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支撑,将生态环保理念切实融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中。同时生态大数据平台的设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旗舰式窗口、知识技术分享平台和信息支撑平台^[2],有效地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惠益共享。

白俄罗斯共和国(白俄罗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中有着独特地位,不仅是“一带一路”的最早响应者和建设者,而且是沟通欧亚大陆的支点国家,同时还是沿线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国家。白俄罗斯自国家独立以来,在进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一直持有强烈的生态理念,追求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绿色发展方式,将绿色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3]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白俄罗斯生态文明或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根据白俄罗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现状,以及白俄罗斯绿色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总结白俄罗斯绿色发展方式的独特经验,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激发绿色发展新思路

随着全球贸易的频繁往来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增长需要不断寻求新动力与新方式,“一带一路”为亚欧非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8年中非会议再次召开,“一带一路”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目前“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也是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4],参与的国家 and 国际组织已经达到10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新形势下聚焦新型发展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发展,改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方案。然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看似是一对矛盾,“一带一路”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保问题,传统的工业发展已经不再适合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是大势所趋,绿色发展方式是建设“一带

一路”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一)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期望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契合了生态环保的诉求。在2016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5]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支撑,绿色发展方式是实现“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赤字、生态治理赤字是这些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沿线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大多处于初级阶段,以粗放型、高耗能、高污染、低效能的传统工业发展方式为主,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同时,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原本非常脆弱,陆地通道的国家很多区域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气候干旱且水资源短缺。而海上之路大多经过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着低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尤其是海洋生态问题,加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治理难度。

其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生态领域方面存在发展阶段差异大、环境制度缺失、合作制度壁垒严重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生态环保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6]“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处于东西方多种文明交汇的地区,各国政治、历史、文化、信仰、地理环境等有很大差异,生态环保理念也不尽相同,如经济发达的欧洲地区对生态环保的重视程度普遍高于自然条件恶劣的非洲地区,社会稳定的东亚地区生态环境优于战乱不断的中亚地区,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诉求——改善民生、建设美好家园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

再次,“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需要高科技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同时也是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有责任贡献“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科技创新发展方式传递到沿线需要的国家,帮助沿线国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合作共

赢是“一带一路”的宗旨,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唯一目的,坚持对话协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的国家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共享福祉。如今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是要保护当地生态环境,遵守当地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二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中主体作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利用先进技术实现绿色低碳生产,将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推广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二)绿色发展是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

绿色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保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继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绿色革命成为另一个可以改变全球经济的催化剂。^[7]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生态系统失衡的问题,联合国在2012年全球里约会议中提出“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与传统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绿色发展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期,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转变为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环境、经济、社会三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为存在、互相作用、互促发展的统一体。多数国家已经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恢复和重建生态环境系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国家战略,同时这也是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倡导的发展方式,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循环使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同时保障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导向,以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容量为前提,以自然资源的可再生速率作为资源使用的衡量指标。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战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辩证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绿色发展方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也不是片面追求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忽略经济发展,而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相互促进,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经济发展转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产业结构,必须要坚持

绿色发展优先原则,通过绿色创新、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白俄罗斯搭乘绿色“一带一路”顺风车

白俄罗斯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也是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白俄罗斯与中国建交26年来,两国领导高度重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白中两国建立了强劲、牢固和可靠的国家关系,决定发展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取得显著成就;‘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倡议,将为世界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8]白俄罗斯是经济开放型国家,位处欧洲腹地,因其地理位置可为“一带一路”发挥物流枢纽和商品集散地的作用,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现在,中白两国之间已经架起有陆上、水上、空中、网上四条丝路,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白俄罗斯的发展方式有着相似的理念。中国大力推进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加强生态环保相关工作,这与白俄罗斯绿色经济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同时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作为两国最大的投资合作项目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是目前中国在海外层次最高、占地面积最大、政策条件最为优越的工业园区,园区按照苏州工业园的生态标准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园区人民提供了工作与生活的物质基础。中白工业园区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双方正共同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开放共赢、绿色环保的国际化产业合作平台,打造成集生态、宜居、兴业、活力、创新的样板园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标志性项目。自工业园建立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先后进入园区,总投资已经超过3亿美元,工业园区已取得初步成效,逐渐成为双方互利共赢、绿色环保的平台,为白俄罗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二、白俄罗斯绿色发展现状及特点

当全球经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低迷时,白俄罗斯由于发展绿色经济,避免了大量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平稳度过了这一时期。绿色发展带给白俄罗斯新的经济增长点。白俄罗斯的绿色发展与传统工业发展有本质区别。传统工业发展是以生态环境为资本,以资源的肆意使用为代价,通过高消耗、高成本的发展方式,追求最大

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不可持续发展。白俄罗斯绿色发展是以高效能、低碳、循环为主的发展方式,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压力,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白俄罗斯积极响应联合国里约会议主题,以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当前国家发展的方向,以绿色发展为基本原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为基础,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为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方式过渡,实现国民经济的逐步转型。同时,白俄罗斯认为发展绿色经济是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发展绿色经济以达到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白俄罗斯重视绿色发展与其具有深厚的生态理念、完善的生态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区域环保合作是分不开的。白俄罗斯绿色发展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

白俄罗斯的生态环境一直能够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部分归因于其国内的生态理念形成较早。白俄罗斯的生态理念源于苏联著名学者布哈林提出的“平衡论”:在没有外界力量影响的情况下,某种体系能够维持自身状态不变,人们就认为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9]。苏联最初的生态理念源于此理论,自然界和社会属于两个稳定的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界过度施加外力,就会破坏自然界内部的平衡。这为白俄罗斯的生态环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二十世纪中期,苏联科学家维尔纳茨基提出了“生物圈”和“智慧圈”^[10]。他认为,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智慧圈表示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概念。社会与自然界同属于生物圈,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同时,社会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反作用于社会,两者相互影响,人和自然相互依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物质保障。人类在认识和实践的活动过程中与自然发生相互关系,智慧圈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圈的组织要协调一致^[11]。智慧圈是生物圈发展的新阶段,人类运用先进的技术,有组织有计划地改变生物圈,形成地球上新的现象。智慧圈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科学思路。

白俄罗斯重视生态理念,与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白俄罗斯早期经济依靠畜牧业和农业,农牧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因此该国一直以来十分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变成白俄罗斯生产力的一部分,促进其经济

的发展,为居民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阻碍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影响其经济的发展,所以生态环保理念在白俄罗斯代代相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曾给白俄罗斯带来巨大灾难,由于当时风向的关系,约有60%的放射性物质落在白俄罗斯的土地,导致白俄罗斯近20%的农业用地废弃,100多万居民受到核辐射影响,对当地的居民生活、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此事件之后,白俄罗斯政府及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尤其在白俄罗斯独立之后,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与核事故的治理。

目前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维持原有的自然状态,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享有“万湖之国”的美称,当地形成了众多的生态保护区和特殊自然保护区,这对国家的绿色发展非常有利,同时整个欧洲生态也由此受益良多。目前,白俄罗斯已经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公民受教育程度较高^[12],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得到高度发展的城市,人民普遍具有良好的环保理念。此外,白俄罗斯正在建设绿色城市,在此过程中可以将能源、水、食物和废物等生活必要品的需求量降到最低限度,持续满足几代人的需要。

(二)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

白俄罗斯在环境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比较有成效,保障了国家的环境保护和治理需要。白俄罗斯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是成立于1960年8月29日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环境保护委员会,主要负责白俄罗斯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测等工作。白俄罗斯从上至下建立了健全的环保机构,保证了法律的有效执行。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下属6个州级环境保护委员会与明斯克市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委员会,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还下辖一些附属机构,包括国家“生态投资”国际生态项目、认证与审计中心,“白俄罗斯生态研究”国有生态科学研究院,白俄罗斯环保领导与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中心,水资源综合利用科研中心等,他们的主要功能是依法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矿产资源保护与利用、水文监测等国家统一政策,对生态环境系统情况的审查,协调其他国家政府机构、地方行政机关、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组织等有关部门的工作,确保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参与制定和实施动植物的繁育工作办法,宣传环保知识,参与建立环境保护教育体系,以及开展生态环境系统相关的研究^[13]。

白俄罗斯主要通过法律框架和经济手段两种重要方式来支持绿色发展和实施,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白俄罗斯的环保立法主要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通过新法律来扩大立法范围,二是直接修订法律。目前,宪法和《白俄罗斯环境保护法》是白俄罗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法律。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每一位公民享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和因环境破坏而遭受损失时获得赔偿的权利。《白俄罗斯环境保护法》是1992年白俄罗斯独立以后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法律,到2012年该法律大大小小共修订了18次,其宗旨是确保公民环境权得到落实,保障健康和优良环境的可持续性。此外,白俄罗斯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涉及多个领域,如农业、建筑、能源(供应)、渔业、林业、工业、旅游、运输、废物和水资源等,针对白俄罗斯具体面临的问题,实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水法》(1998年)、《白俄罗斯共和国矿场资源法》、《白俄罗斯共和国节能法》(1998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臭氧层保护法》(2001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废物管理法》(2007年)、《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空气保护的律》(2008年)等^[14]。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收取空气和水污染费用、工业和家庭废物处置费用、环境损害赔偿和塑料包装废物后处理费用等。但在白俄罗斯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手段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国有企业仍然是主要的工业污染源。

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皆有助于绿色发展。白俄罗斯的生态法律法规有显著的成效,引导公民和社会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循环利用资源。比如,白俄罗斯2015仅有7辆新能源汽车,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使用新能源汽车,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将达到3.27万辆^[14]。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国家形成更好的生态治理能力,为绿色发展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生态的法律法规制度特别是监管体系不仅促进了绿色生产模式的发展,还促进公民形成了健康环保的消费模式。

(三)区域生态一体化协同发展

白俄罗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优先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白俄罗斯位处于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重要地理位置,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外市场,在国际合作中,以经济合作和生态环保合作为主要内容。白俄罗斯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绿色发展是当前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环境为绿色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区域生态环保合作是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战略,促进双

边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的建设、创新传统的生态治理模式,是实现区域经济绿色经济的基础。白俄罗斯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现实特点,就是核辐射污染比较严重,这也是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的区域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核辐射影响了这些区域的生态和经济的发展,白俄罗斯与周边的国家共同研究与合作,共同治理核污染,采取了包括疏散人群、建立生态保护区和大规模植树等治理方法,在核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外,白俄罗斯与邻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还涉及到保护跨界河流的水资源,以及建立边界地区的生态网络,如正在进行的政府间跨境河流的保护项目,监测和管理第聂伯河流域(连同乌克兰和俄罗斯)、萨帕德纳亚德维那河(连同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和萨帕德尼臭虫河(连同波兰)的水资源等^[15]。目前,白俄罗斯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正朝着与欧盟立法相一致的方向发展,一些重要法律法规已经通过或即将通过,如在2010年12月,白俄罗斯通过了一项关于可再生能源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并对相关的环境法律进行了更新;水和空气的排放要经过技术的处理达到国家标准才能排放等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白俄罗斯与欧盟立法趋向一致的体现。

白俄罗斯生态环保合作逐渐走向世界。近年来全球面临生态危机,生态治理是当前各国最紧迫的任务。白俄罗斯不断扩大国际合作范围,先后加入了约20项关于生态保护合作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这些公约和议定书涉及气候变化、大气空气污染、防止沙漠形成、运输和清除有害废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如《巴黎气候协定》、“市长协议”等多边合作条约,为了履行在这些方面的承诺,白俄罗斯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方案和计划,目前已经开始执行。执行这些公约和议定书表明白俄罗斯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愿意为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巨大贡献。白俄罗斯在经济方面的对外合作,大多是以绿色发展、高科技新型技术为优先合作对象,如中白工业园已经有34家企业入园,多数企业以高科技研发为主或者为园区提供服务。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白俄罗斯绿色发展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巨大成果,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面临众多困难。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建设美好家园,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的迫切需求。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来,绿色发展理念逐渐被人民接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白俄罗斯在生态环保方面独具特色,借鉴其绿色发展经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树立生态环保责任意识

白俄罗斯的早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畜牧业和农业,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白俄罗斯本国居民一直以来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利生产力,形成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来促进畜牧业和农业发展的观念,这体现了白俄罗斯有较强的生态环保意识。

相对于白俄罗斯的生态环保意识,中国公众在这方面意识极其淡薄。中国自建国以来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物资匮乏、人口压力大、经济和技术落后等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主题,是首要任务,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重视经济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然而,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运动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态系统失衡,矿产资源不断减少,雾霾日渐严重,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很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情况来衡量政绩的大小,不顾当地资源环境情况,急于取得成绩,盲目开发项目,浪费有限的资源;部分企业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向江河湖海排放未处理的废水,向空气中排放废气,肆意堆放和掩埋生产垃圾;一些公民也缺乏环保意识,任意砍伐森林树木,生活污水排至河流,垃圾随手乱扔等。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公众的目光开始转向环境,逐渐有了环保的意识。虽然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较以前有了大大的提高,但相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修复和重建生态系统,必须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为基础。公民是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也是良好生态环境的直接受益者,公民环保意识强弱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好坏,同时生态环境好坏影响

着公民生活的质量。目前,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仍任重道远。首先,很多公民缺乏生态知识,很少接受系统的生态知识体系和规范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学习或培训。因此,要加强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在学校教育中设立系统的生态环保课程,且从小培养环保意识;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引导公民形成环保意识和习惯。其次在生态环保的监督和执行中,公民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性和对政府的依赖性。在以往众多的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日常生活,很多公民都置身事外,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成为生态环境破坏者的帮凶,然而出现了生态问题时,一些公民将责任归咎于政府的监管和执行不到位。生态文明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政府要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树立正确的生态环保责任意识。再次,改善宣传方法方式。目前中国有很多从事生态研究的专家和学者,通常他们只是做学术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公众日常生活的环保行为,缺乏具体实践的指导和宣传。将生态理论与环保实践相结合,使广大企业和公民认识与学习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必须整合学术界、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力量。

(二) 建立健全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

白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在生态环境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涉及气候、水资源、废物处理、动植物保护等方面,除此之外还设有特别保护区、许可证制度。白俄罗斯设立了大量的特殊自然保护区,对其土地保持原有的自然状态起到重要作用。许可证制度也是白俄罗斯的生态法规的一方面,如2008年12月19日公布《关于破坏臭氧层物质回收资质的决定》^{[13]341},这都为白俄罗斯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标准和依据。

相比白俄罗斯,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立法和执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需要法律法规的调整和规范,受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尤其在面对经济利益的诱使下,执法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和环境侵权现象仍然十分常见,生态法治建设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17]近五年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一系列符合当前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和修订,涉及空气污染、污水排放标

准、濒危稀有动物和自然保护区保护等,生态文明制度框架日益完善,生态治理能力持续增强。目前,中国生态环保法制化总体上较以前有所改善,建国以来第一部环保法在实施 25 年来首次修订完善,于 2015 年 1 月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成为“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法。同时,中央也从 2016 年开展了覆盖全国 31 个省全方位的环保督察巡视工作,确保了环保法律法规落到了实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中国的生态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仍存在缺陷,不够完整。在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中,要逐步建立起由政府政策的引导、行业企业的践行和社会公众的参与等多方主体构成的较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原有生态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陆续出台和修改更加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顶层设计,如《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修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政府从政策方面进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宣传,能够逐步引导社会公众的生态理念。在中国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企业是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主要践行者。中国制造业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以高排放、高消耗、低效能为主,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些企业应积极创新绿色发展,通过科技创新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同时,加强与完善企业践行生态文明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和推行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如 2018 年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此外,社会公众是生态环境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每一位公民都有遵守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如《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 号)、2015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公众有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查问卷、听证会、意见反馈、12369 环保热线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公众参与。

(三)推进区域生态治理

白俄罗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与周边国家合作密切,在核污染治理、建立边界生态网络和跨界河流域治理等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立法趋于与欧盟相一致,白俄罗斯与邻国通过双边和多边

合作,逐渐形成区域生态一体化。近年来白俄罗斯不断扩大国际合作范围,响应联合国号召,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与白俄罗斯成熟的区域环保机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在区域生态治理方面情况复杂。中国最北面有广袤的沙漠,面临着土地沙漠化问题;东面和南面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面临着海洋生态污染问题;西面存在大量干旱的土地,面临严重缺水问题。针对不同生态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不同决策,如中国与蒙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沙漠化治理和煤炭清洁利用的合作;中国与日本、韩国就区域海洋生态问题,建立水质监测站、共同合作研究海洋生态问题。在区域环保合作中中国积极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生态环境合作,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特别重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绿色产业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近年来,中国对区域生态环保合作的重视程度逐渐地提高,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合作,如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环境合作,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等。

然而,相对于当前全球的严重生态危机,区域生态合作的力度仍有待提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有不少企业在国外投资失败,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在生产发展过程中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或者废气废水等污染物不符合当地的生态环保政策,未能处理好在东道国的生态环保问题。可见,生态环保在跨国区域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今世界面临着气候变暖、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污染等问题,生态危机不是哪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环境保护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合作。区域生态环保合作就是要凝聚这些行动和合作的纽带,使各国之间交流更加频繁,互信不断,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区域建设之中。

区域生态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绿色是“一带一路”的底色,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建设的有效途径。在“一带一路”生态合作中,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多双边合作,积极参与对话协商,做好生态环保的顶层设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平台;同时企业在国际合作中要积极主动地践行生态保护,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口碑,将生态环保理念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中。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导者,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促进“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的共建共享,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必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丝绸之路,推动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迈上新台阶。

四、结 语

“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走绿色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白俄罗斯在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其绿色发展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白俄罗斯有着深植于本土文化中的生态优先观念,这是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亟需重视和树立的环保理念。其次,白俄罗斯有着比较完善的环保法律体系环保制度,是其国内良好生态环境的坚实制度保障,这为中国加强建设生态环保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最后,白俄罗斯在区域生态合作方面有着成熟的机制,而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更应该在在区域合作中积极践行生态一体化,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王学峰.绿色“一带一路”将引领全球一体化的4.0时代[J].区域经济评论,2017(6):14-16.
- [2] 国冬梅,王玉娟.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研究及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2017,9(3):15-19.
- [3] Kadatskaya O V, Sanets E V, Bykova N K, et al.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 in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R]. Minsk: Institute of Natural Management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 of Belarus, 2010.
- [4] 俞懿春.“一带一路”是可持续的公共产品[N].人民日

报,2017-04-16(003).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45.
- [6]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6-01-22(003).
- [7] 胡鞍钢.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A].国情报告第十六卷2013年//[C].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15:13.
- [8] 张晓东.“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一带一路”·高端访谈):访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EB/OL].(2017-05-05)[2018-11-01].<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7/0505/c1002-29257376.html>.
- [9]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李光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76.
- [10] P.巴兰.维尔纳茨基:生平·思想·业绩[M].孙佩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89.
- [11] 周光迅.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17.
- [12] 科瓦列尼亚.白俄罗斯简史[M].赵会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56.
- [13]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沿线重点国家生态环境环境状况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337.
- [14] Zenchanka S, Korshuk E. The “green economy” concept in Belarus: Today and tomorrow[J]. Progress in Industrial Ecology, 2015, 9(1):33-43.
- [15] Palonik S, Smaliarova M.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green economy of Belarusian regions[J]. Journal of the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2017(1): 22-26.
- [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26.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4.

(责任编辑:陈丽琼)



中国园林造园理念的源流与发展

袁 梦, 俞楠欣, 陈 波, 卢 山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中国园林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哲学审美思维等传统文化背景下, 显示出不同的发展历程与艺术风格。其中,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三个派别的宗教文化思想都对 中国园林造园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与由这三种思想所延伸出的“天人合一”思想、隐逸思想、风水学说、神仙思想等共同构成中国园林造园理念的哲学思想源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愈加明显, 在西方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形成了融贯中西相关学术思想的多重现代生态造园理念。而贯穿中国园林发展史的各种造园理念都以不同方式与内容阐述了“师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共同精神内涵,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园林的设计方法与风格特色。研究表明, 中国园林的理想表现形式是将自然的存在与人文精神的需求融合起来以达到“近自然”的理想状态。因此, “近自然园林”是今后应当大力发扬的核心造园理念。

关键词: 风景园林; 哲学思想; 造园理念; 师法自然; 近自然园林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8-0414-09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 gardening concept

YUAN Meng, YU Nanxin, CHEN Bo, LU Sh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pecific social environment, philosophical aesthetic thinking and other trad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hinese garden shows diffe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rt style. Among the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ligious cultural thoughts of three faction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garden building concept. And,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ity", "reclusion thought", "traditional geomantic omen theory", "immortal thoughts" and other thoughts extended by the three ideas constitute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Chinese garden building concep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obviou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ecologism, diversified modern garden building ideas which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ideas have been formed. All the garden building idea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s have expounded the common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Learn from nature and integrate man with nature" in different ways and contents, which has brough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sign method,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garde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deal expression form of Chinese gardens is to integrate the existence of nature and the demand of humanistic spirit so as to achieve the ideal state of "nature approximating". Thus, "nature-approximating garden" is the core garden building concept which should be strongly developed.

收稿日期: 2018-09-27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8

基金项目: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科研项目(17050068-J)

作者简介: 袁 梦(1993-), 女, 广东广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园林植物景观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陈 波, E-mail: bochen2008@126.com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hilosophical thought; garden building ideas; learn from nature; nature-approximating garden

中国传统园林是中国优秀文化、思想与艺术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美的深刻理解与鉴赏。中国传统园林由人所构建,旨在再现自然,同时渗透着传统文化,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等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体现。长久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园林是道家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也有研究认为传统园林更多地受到儒家、禅学思想的影响。如赵晓峰等^[1]认为在儒家形成的自然审美观与礼乐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园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模仿与形象化,诠释了儒学的人生理想目标;涂强^[2]认为中国传统园林在哲学、美学等方面受到禅学影响,并在园林形式与意境营造方面留下了烙印。而后,也有一些研究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派思想探究中国园林的思想渊源。如吴隽宇等^[3]认为中国传统园林是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学思想共同作用下文化发展的产物;彭巧等^[4]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儒家、道家、禅宗、风水等哲学思想对园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园林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追溯儒、释、道这三种主流思想,而对

这些哲学思想影响下的造园理念缺乏研究。此外,现代园林造园理念的形成,与西方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目前尚未有人加以论述。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西方生态主义思想两方面入手,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园林造园思想进行梳理,旨在系统探究中国园林造园理念的源流与发展,挖掘中国园林造园理念的共同精神内涵。

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传统园林造园理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释(佛)、道三种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并渗透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哲学自然观。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相互吸收和融合。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情趣,由此产生了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园林造园理念(表1)^[5],进而对于中国园林的内容、形式、结构、艺术手法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表1 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的造园理念

传统哲学思想	核心内容	造园理念	
儒家思想	“仁义”、“礼乐”、“君子比德”,“中庸思想”、“尽人事,听天命”,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启发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尊重	崇尚自然之美,重视筑山、理水;注重秩序感;讲求园林的“和谐”之美	
主流思想	佛家思想	“众生平等”、“人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中,人与自然两者是浑然如一的整体”,强调“顿悟”与“自解自悟”	崇尚“淡”、“雅”之风;将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重视意境的营造
	道家思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出世、回归自然的境界	师法自然,合理、适当地改造自然;在园林中蕴含着对自然美之中“道”与“理”的理解
	“天人合一”思想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在儒、道思想中均有体现,人类不能悖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崇尚“天人谐和”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园林应顺应自然,彰显自然天成之美
衍生思想	隐逸思想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归园田居”,残酷的政治环境、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使得隐逸成为文人思想的寄托与归宿	寄情山水,喜爱在名山大川结庐营居;注重物景与意境的营造,发扬“自然美”为核心的美学观
	风水思想	天、地、人合一是中国风水学的最高原则,察天观地、择吉避凶,选择适合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	“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等,对园林选址、规划有较大影响,目的是将“天成”与“人为”的关系始终整合如一
	神仙思想	老庄学说与原始的神灵、自然崇拜融揉在一起产生了神仙思想,是古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死亡时表现出的强烈反抗意识	“一池三山”模式的产生,注重情境的体现

(一)传统哲学主流思想及其影响

1.儒家思想

儒学以“仁”为基础,以“礼”为中心,崇尚“入世”的价值观,是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被统治阶级视为治国之道。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园林中体现并积淀了理性思想的感性审美境界,在布局与设计上都体现了儒家的观念,重视天地万物的意义与内涵,赋予自然界一切以人的风度和品格,主张人与万物融为一体;注重均衡自然生态美与人文生态美,以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礼乐思想”的指导下,园林风景式自由布局中蕴含着一种秩序感和强烈的生活气息^[6]。在儒家“君子比德”理念的影响下,“人化自然”的哲理启发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尊重;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园林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筑山、理水与植物配置,为园林风景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中庸之道”和“以和为贵”等思想更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园林造园,使得园林的各元素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园林整体呈现出和谐的状态。

2.佛家思想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佛家提出“众生平等”的思想,宣扬重来生的“彼岸世界”、不重现世的“此岸世界”等消极出世的人生观。在修行方法上重视人的“悟性”,重视个体内心领悟,通过自然来探寻自心之“悟”,以求自然现象与内心的统一,看空自然,自然成为假象或心相。另外,禅宗所倡导的自然,其精神往往以自然山水的形象表达。因此,在禅宗精神影响下的造园实践中更强调意境,以期达到情景与哲理融合的境界。

3.道家思想

道家学说以自然天道观为主旨,如《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如大地般厚德载物,大地如天般宽广无边,而道则要像自然那样顺应规律地自然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以自然美为核心的美学思想,达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7]。在中国传统园林中,造园设计不仅是功能与意境的体现,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思考,在处理同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倡“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这种观念在园林中首先表现为对自然山水的崇拜与模拟,要求人类要以自然天地为法则,去适应自然界并且合理、适当地改造自然。中国传统园林正是以“道法自然”思想作为造园设计的指导原则,同时道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观念、空间概念和造园法式上的方法论依据,

使得园林景观中能将自然雅致的景观与人工造园艺术形成内外时空流动统一的整体。

(二)传统哲学衍生思想及其影响

儒、释、道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主要思想,也是中国造园理念的主要哲学源流。此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融合或衍生于儒、释、道这三种思想的一些观点、学说与此三家思想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园林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背景。其中,“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学说、隐逸思想、神仙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园林造园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

1.“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指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合一,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普通百姓对于帝王王权的崇拜逐渐减弱,天命神权思想受到冲击,思想家提出“天道”和“人道”的哲学范畴,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逐渐被人们接受,如《易经·乾卦》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它强调了“天道”和“人道”的相通、相类和统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随着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的不断丰富而发展。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从“天道”的角度为“天人合一”哲学观确立了宇宙观基础,庄子对其进行了延伸发展,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认为要达到天地合一的境界,必须消除一切差异。与道家不同的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从“人道”的角度为“天人合一”哲学观奠定了基础,后孟子进一步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寓天德于人心,将封建社会制度外化为天法^[8]。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天人合一”思想延伸出“天人和諧”的概念,继而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园林文化,它对传统园林中空间营造、风水文化、意境审美等多方面都具有较大影响,体现了古人回归自然、天地共融的自然观。

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造园艺术的最高追求目标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传统园林艺术的表现形式始终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在布局、建筑、山水、植物方面都追求顺应自然,彰显自然天成之美,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园林盛景,以求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2.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基础是老庄思想。中国封建社会里,在体现士人意趣和精神追求的文化艺术领域内,蕴含着隐逸文化体系。“崇尚隐逸”与“寄情山水”是紧密相连

的,远离尘嚣、风景绝美的山河大川等自然环境是产生隐逸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士人避世山林、隐居世外的重要场所。从中国发展历史来看,在东汉时期,不少落魄文人因才华不得赏识,空有理想抱负却无法施展,只能在游山玩水中表现出自己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高远襟怀。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起,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频繁,时局动荡不安,一些官吏、富商、文人为了逃避现实,纷纷隐迹,“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到了元、明、清时期,人们内心对于政治的渴望和对于自然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仕途不顺的有志之士和知识分子多会选择归隐^[9]。至于隐逸方式的选择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唐代诗人白居易总结出“中隐”的方式,他提出“隐在留司官”,并且将“中隐”与私家园林联系在一起:“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作为文人士大夫隐逸的理想载体,园林既解决了出世与隐居的矛盾,又能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拟求幽僻地,安置疏慵身。”自此,“静念园林好”,徜徉泉石、盘桓林木便成为文人的传统心理沉淀和稳定追求,这也使后人在审美上相对于人工美更加崇尚自然美,也是对当时归隐思潮的解读。多数文人认为天然去雕饰的“出水芙蓉”之美是一种比富丽繁华、雕梁画栋的人工雕琢之美更高的造园理念和境界。

3. 风水学说

风水为中国人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几千年来生活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结晶。如张载的《正蒙》中所言:“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风水学通过察天观地,寻找“生气”以选择适合人类生活的最佳环境,从而达到阴阳调和、天人和諧的目标。风水又称堪舆、青乌术,原为相地之术。风水学说以自然环境为研究对象,旨在适应自然、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达到“天人和諧”的理想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风水学说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整合了古代哲学、宗教、美学、民俗等诸多学科,形成了内涵丰富、综合性强、实践性强的理论体系^[10]。

风水学说将自然美与人文美和谐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特征。风水学说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和交互感应,其中很多见解与当代生态学理论不谋而合。风水学说中,运用得较多的是阴阳八卦、五行四象之说,这对中国传统园林“风景式”风格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风水学说也被西方科学家称为“东方文化生态”。

4. 神仙思想

宗教典籍中的天堂乐园、仙山神水是人们梦想中最美的园林化环境。原始宗教中出现了“昆仑神话”与“蓬莱仙岛”;佛教中所说的极乐世界便是具有灵山圣水的优美园林,虹桥卧碧波,廊外山林美景,天上吉祥天女,众僧潜心修炼,达到涅槃的安乐境界;中国道教以崇尚自然、返璞归真为主旨,其理想境界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道家学说在现实世界中建立的理想王国,另一种则是超越现实的仙境。最终老庄学说与原始的神灵、自然崇拜杂糅在一起产生了神仙思想。据《水经注》、《山海经》和《淮南子》等记载,昆仑山通达天庭,如果人们能在山顶找到天庭的入口,就能长生不死。另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无垠的大海中,有三大神山:方丈、瀛洲、蓬莱^[11]。这些神话故事表达了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美好向往,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仙境为主题的中国园林传统景观布局——“一池三山”模式得以形成。中国传统皇家园林及私家园林都喜欢挖池筑岛,摹拟海上仙山,如秦朝的“兰池宫”,西湖、颐和园等均是这种布局。这也满足了一些统治者长生不死的愿望,在园林中享受“神仙”生活,脱离世俗生活的束缚,获得精神的愉悦。因此,园林的主要目的不是“客观地模仿”山川之美,而是强调和表现自然景观所引起的“情感的释放”,即人与自然的融合、舒适与亲和的状态。

综上所述,造园理念是中国园林的核心,造园过程中,各造园要素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中国传统园林中独有的理念。深受儒、释、道哲学流派及其衍生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园林形成了以“天人合一、师法自然”为主旨的造园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传统园林体现出四个方面的造园特色:一是道法自然,万物一体。中国园林在营构布局、配置建筑、山水、植物方面力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努力突出自然美,避免形式上的齐整,力求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创作境界^[12]。二是巧于因借,虚实相生。造园家运用“借景”、“虚景”等造景手法使得园林曲折回环而变幻莫测^[13]。借景是借景言情,它将自然与生活紧密相连,这种手法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美的层次,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贯通境界。三是文景相依,诗情画意。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又以诗画入园,诗情画意,互为渗透,融二为一,形成“园中有诗画”的境界^[14],使得游人在游览过程中,体悟出“人在画中游”的感受^[15]。四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唐代著名画家张璪提出的绘画

理念。画理如此,园林建造亦是同理。中国园林是感性的、主观的写意,通过对自然及其景观元素的类型化、抽象化使得造园者所赋予园林的精神传递给游园者^[16]。人们复杂的情感与自然景物的朝夕变化产生共鸣,自然美景与生活图景交融,形成融合了社会生活、自然环境、诗画意境的可居可游的园林空间。

二、中西方哲学思想共同影响下的现代园林造园理念

(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现代园林造园理念

表2 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代表性现代园林造园理念

造园理念	代表人物	核心内容
“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理念	孟兆祯 ^[17]	人是自然的,是社会的,两者的结合就是对宇宙论的诠释,即“天人合一”。充分尊重自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天地一人一神和谐”理念	俞孔坚 ^[18]	景观设计应遵从自然规律,遵从人的需求,遵从地方历史文脉,追求天地、人、神的和谐
风景园林“三境论”理念	孙筱祥 ^[19]	中国文人园林的创作过程是:首先创造自然美和生活美的“生境”;再进一步通过艺术加工上升到艺术美的“画境”;最后通过触景生情达到理想美的“意境”,进入3个境界互相渗透、情景交融的高潮
风景园林“三才观”理念	李树华 ^[20]	由天、地、人三要素共同作用于场地并形成特定的人居环境,在“三才”中一般为天决定地,地决定人,最终表现为天人谐和
风景园林“三元论”理念	刘滨谊 ^[21-22]	风景园林应包括环境生态、空间形态、行为活动三部分,优秀的景观环境效果必定包含着三元素的共同作用。由“风景园林三元论”发展而来的“人居环境三元论”概念,更强调“人居”概念,三大构成要素为人居背景、人居活动、人居建设

1.“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理念

孟兆祯院士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杰出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他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与鲜明地域风格、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景观。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将两者结合,演绎出宇宙观,即“天人合一”。现代社会一切活动均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宇宙观不同于社会观,对自然不能说“以人为本”。应做到充分尊重自然,在此基础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孟兆祯先生坚持现代园林建设的理念应是“人与天调,天人共荣”^[17]。

自然景观包含大自然景观与人造自然景观,后者即园林,因此,园林被称为“第二自然”,它体现了“景物因人成胜概”。“景观”包括物质生态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两部分。园林美是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结合体。所提倡的应是“巧于因借”本地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资源,利用地域植被、山水形胜与文脉融汇,最终营造出“有真为假,作假成真”的园林景观。

2.“天地一人一神和谐”理念

俞孔坚教授自回国任教北京大学起,便呼吁人类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他将自己所创立的公司取

当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对人居环境的精神价值诉求越来越高,体现在园林景观设计方面,即以传承发展优秀传统园林造园理念为根本。传统园林造园理念有着丰富的内涵,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发展,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多有体现。很多学者从传统园林中借鉴吸收其优秀成分并演绎出丰富多样的现代园林造园理念(表2),用于指导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以创造出和谐、自然、符合人们审美需要的“宜人”景观环境。因此,现代园林造园理念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认识和思考,是对传统园林造园理念的扬弃和创新。

名为“土人景观”,其内涵是:景观应是体现人与土地、自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本该是“天地、人、神”合一的。他将其称为“土人理念”,也是俞孔坚始终坚持的景观规划设计的三大原则^[18]。

首先,遵从自然。景观设计应遵从生态规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其次,尊重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景观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与载体,以服务人类、满足人类需求为宗旨:一方面要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另一方面要满足人的社会需求。最后,遵从“神”。俞孔坚将“神”理解为地方的历史文脉。每个城市在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后,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习俗等,它们都反映了某个地域的精神,因而每一个场所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灵魂。文化是人与自然共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自然适应的方式。因此,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应强调场所精神,使人获得认同感。综合来说,追求“天地一人一神和谐”是景观规划设计的最高目标。

3.风景园林“三境论”理念

孙筱祥先生是中国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学科的创始人与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园林之父”。1982

年,孙筱祥先生提出“三境论”理念。“三境论”最初是指应从三个层次评价文人山水园林的艺术效果,也是对于生态、自然、人文、艺术、工程技术等多方面的造园思考^[19]。“三境论”中所指“三境”分别为生境、画境、意境,其内涵如下:

一是“生境”,包含了自然美和生活美的境界。如《红楼梦》所言:“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园林所形成的环境应富于自然美,创造一个可享受生活乐趣、生气勃勃的境界,同时也是“可行、可游、可居”的场所。这也是现代园林中所提倡的“生态美”。

二是“画境”,即游人在园林中感受到的视觉美、布局美以及形式美等。孙先生也提出,造园若只在“画境”终止,则不能称为“园林”,而只能作为美术作品或艺术品的存在。

三是“意境”,指理想美和心灵美的境界。园林是人们贮存情感的一种载体,人们的理想境界、诗情画意等感受都储藏于其中,园林中的“意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精神文明的水平。

1992年,孙先生将“三境论”提升到美学层面再次进行了深入阐述。孙先生认为人的“审美”会由于个体的社会环境、健康情况、受教育程度、历史人文、民族传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进行造园活动时,必须将自然美、艺术美和生活美三者高度统一起来,并融为一体。

4. 风景园林“三才观”理念

2011年,清华大学李树华教授提出风景园林“三才观”^[20]。他将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才之道”进行提炼与发展,探讨“三才之道”在现代造园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三才之道”是指由天、地、人三要素共同作用于场地并形成相应的人居环境。

李树华将“天才”“地才”和“人才”概念在风景园林领域进行了延伸:“天才”指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等因素所决定的空间位置,包括了该场所的地理位置、气象变化等;“地才”指在地形、土壤、水系、动植物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多类型的地形地貌;“人才”指在形成的自然环境中进行适应自然以及适度改造自然后形成的人文景观。风景园林领域中,“三才之道”则是指某场所形成的环境是由天、地、人三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场所环境中三要素占比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景观。人居环境的形成过程中,一般由天决定地,地决定人。在理想状态下,天、地、人三要素之间应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

5. 风景园林“三元论”理念

2013年,同济大学刘滨谊教授发表论文《风景

园林三元论》^[21],系统阐述了“三元论”理念,它强调“三生万物”的宇宙观,即变化万千的风景园林世界是由必不可缺且独立存在的三种要素组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风景园林应从存在、意义、追求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即:环境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空间形态(时间、空间、空间单元)、行为活动(感受、文化、艺术)三要素。这三个要素对环境感知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良好的园林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感受必然包含三要素的共同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园林“三境”融合的综合体现。后又由“风景园林三元论”发展为“人居环境三元论”^[22],这一概念更强调“人居环境”范畴,其三大构成要素为人居背景、人居活动、人居建设,人居背景包括生活环境、农林环境、自然环境三要素;人居活动包括居住、聚集、游历三要素;人居建设则包括建筑、城乡、风景园林三要素。该理念的目标是在人居环境理论指导下解决人居问题,以实现理想环境,促进人类繁荣发展。

(二) 西方生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现代园林生态造园理念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以生态学为学理基础,是人类对有生命的物种之间的联系以及物种与物理、生物环境的系统把握^[23]。20世纪以来,源于对城市快速扩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担忧,生态学和生态主义思想成为园林领域热议的话题,同时也对园林景观设计理念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园林景观从单纯关注美学理念逐渐转向关注生态理念。受其影响,中国园林界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自的生态造园理念。

1. 生态园林

早在1986年,“城市绿地系统、植物造景与城市生态学”学术会议上“生态园林”概念被首次提出,它是中国园林界结合生态学理论和方法提出的新概念,目的是为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发展。生态园林是指“着重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出发,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立城市绿化系统,在单体园林中科学地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植物群落,以达到顺应自然、提高环境质量、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园林绿化方案与措施”^[24]。以程绪珂先生为代表的园林专家学者,在多年来实践经验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生态园林的理念与营造技术,提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园林绿化建设途径。

2. 低碳园林

2005年2月16日是彪炳史册的重要时刻,《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抑制全球变暖。由此,“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等理念逐步发展起来,“低碳园林”的概念也随之提出。“低碳园林”的本质是围绕“碳”展开的,其核心是低碳排、高碳汇,园林是低碳得以实现的基础^[25],目的是通过合理、科学地布置城市绿地系统中各类型绿地,降低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26]。

3. 节约型园林

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2006年8月召开的“全国节约型园林绿化工作现场会”进一步提出建设“节约型园林绿化”的倡议。所谓“节约型园林”,就是指投入最少的土地和金钱,打造对周围生态环境干扰最少的园林绿化模式,包括节地、节材、节水、节土、节能、节力等六种类型^[27]。

综上所述,以上西方生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现代园林造园理念虽有些许不同,但都以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核心,引领着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近自然园林”——现代园林核心造园理念

早在2005年,祁新华等学者针对国内园林建设的一些反自然现象,借鉴“近自然林业”思想,提出了“近自然园林”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特征及理论支撑体系,并探讨了近自然园林的营造原则和实现途径^[28]。十多年来,园林领域专家学者对近自然园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兴未艾^[29-34],但总的来说,创新性的成果不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近自然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园林的经验,在城区和城郊范围内,以园林学、生态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为指导,营造以乡土植物为主、乔灌木相结合,具有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综合效益的,结构稳定、具有自我演替能力的地带性园林系统。因此,近自然园林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以乡土植物为主,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地域特色明显;二是选择和配置植物物种合理,植物群落具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能有效发挥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综合效益;三是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合理,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自我演替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逐渐远离原生态的自然形态,但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钢筋混

凝土森林”中的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之情与回归的期望却与日俱增。“自然”被认为是美的终极标准;“自然”被认为是节约的和科学的;“自然”被认为是环保的和健康的……“如何有效地实现风景园林的师法自然?”这是摆在现代风景园林从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中国核心造园理念“师法自然”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对自然的照搬照抄,园林是人类对自然的模拟和再造,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合理加入人的需求,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体营造一个和谐共处的“近自然”环境,这也是“近自然园林”概念提出的初衷。中国园林的理想表现形式是将自然的存在与人文精神的需求融合起来以达到“近自然”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近自然”应当作为中国现代园林的最重要的造园特色。

上面提到的几种园林生态造园理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般来说,“节约型园林”可能是“低碳园林”,因为在“节约型园林”的建设途径中已经包含了许多低碳的理念和思路。但“节约型园林”不等同于“低碳园林”,它更多地关注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生态稳定等内容。而“低碳园林”一定是“节约型园林”,因为低碳的理念本身就包含了许多节水、节电、节材的举措。但“低碳园林”不仅仅是“低碳排”,它还有固碳释氧的“高碳汇”概念,它更多地围绕碳展开,在低碳排和高碳汇的过程中承载着改善环境、维系生态平衡、构建园林绿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无论是节约型园林,还是低碳园林,两者的共同点都体现在对资源、能源、环境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上,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同时也是生态园林的内涵之一。从三者的关系来看,节约型园林和低碳园林包含在生态园林的范畴之中。而近自然园林与生态园林相比,两者都是通过园林绿地合理的植物选择与配置,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生态园林主要关注园林的生态性,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园林绿地进行全过程调控,且人为痕迹明显。而近自然园林既关注园林的生态性,也关注其艺术性、文化性等方面,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营造园林绿地,且前期人工调控多一些,后期植物定植后,尽可能减少人为调控,利用自然群落的自身力量进行演替,人为痕迹较轻。因此,近自然园林实际上成为生态园林的扩展和提高。前述几种现代园林生态造园理念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或西方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通过“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再现自然”等途径^[35],近自然园林在功能上能够同时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

求与大众精神文化的需求。这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现代园林景观建设应严格遵从、大力发扬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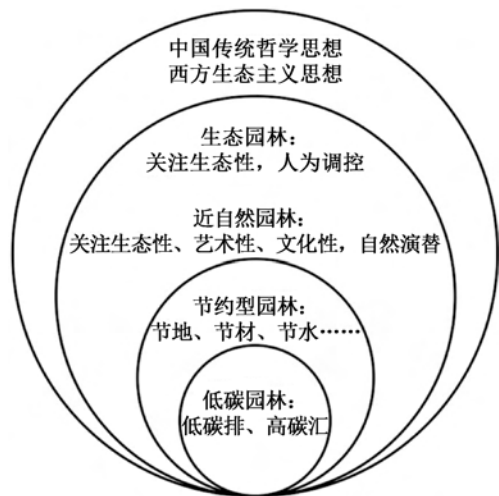


图1 各种现代园林生态造园理念之间的关系

三、结 语

不断发展、延伸的中国园林造园理念展现了中华民族先贤与现代学者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足迹。在长达五千多年的造园历史中,中国园林的发展始终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吸取了西方生态主义思想的精髓,逐渐发展形成现代园林生态造园理念。不论是传统园林或是现代园林造园理念,它们都一直受到生态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尊重自然”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宇宙观。中国园林作为自然与技术的融合,它的美遵循着“以天合天”的原则,人们模拟自然环境,利用山、水、植被与构筑物等要素,按一定的艺术构思而设计形成的人工生态环境,遵循基本的生态法则,以接近自然为目标,以象征性的方式呈现自然。可见,“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熏陶下的风景园林的核心造园理念是“师法自然”,以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有真为假,作假成真”艺术境界。因此,作为中国园林的重要发展方向,“近自然园林”应当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晓峰,梁徽.昆仑神话景观模式的图形化溯源及其对先秦园林的影响[J].中国园林,2015,31(9):110-114.
 [2] 涂强.江南古典园林艺术设计中的禅学意境[J].山东文学,2009(4):141-142.
 [3] 彭巧,傅德亮,徐剑锋.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5,22(1):104-108.
 [4] 吴隽宇,肖艺.从中国传统文化观看中国园林[J].中国园林,2001,17(3):84-86.
 [5] 安运华.园林审美走向初探[J].湖北农学院学报,2003,23(5):337-341.
 [6] 翟树彩.“天人合一”理念予艺术设计创新精神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3:42-44.
 [7] 黄琳惠.山地园林植物景观文化探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0:12-13.
 [8]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人文背景[J].中国园林,2004,20(9):59-62.
 [9] 蒋宇.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2):85-87.
 [10] 盛超赞.风水理论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运用[D].无锡:江南大学,2010:7-17.
 [11] 水源,李静.试析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底蕴[J].安徽农学通报,2006,12(4):60-61
 [12] 韩建华.《园冶》中“因借”思想对构筑人居环境的研究[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7,19(3):63-65.
 [13] 朱志荣,周礼.中国园林的多维阐释:评曹林娣教授的《中国园林文化》[J].建筑知识,2006,26(4):25-26.
 [14] 俞志军.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2:23-27.
 [15] 沈奕.国学公园建设初探[D].杭州:浙江大学,2011:30.
 [16] 牛艳玲.园林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初探:松江方塔园设计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6:14-20.
 [17] 孟兆祯.人居环境中的园林[J].住宅科技,2005(1):3-5.
 [18]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29-138.
 [19] 孙筱祥.生境·画境·意境:文人写意山水园林的艺术境界及其表现手法[M]//江溶,王德胜.中国园林艺术概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20] 李树华.“天地人三才之道”在风景园林建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探解:基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风景园林设计论研究(一)[J].中国园林,2011,27(6):33-37.
 [21] 刘滨谊.风景园林三元论[J].中国园林,2013,29(11):37-45.
 [22] 刘滨谊.人居环境研究方法论与应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17-28.
 [23] 于冰沁,王向荣.生态主义思想对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的影响与趋势探讨[J].中国园林,2012,28(10):36-39.
 [24] 程绪珂,胡运骅.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1-4.
 [25] 王文娟.基于传统造园理念的当代低碳型城市景观设计研究[D].西安:陕西科技大学,2012:4.
 [26] 涂秋风.低碳与城市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8-19.

- [27] 卢山,陈波,周之静,等.节约型园林建设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7:115-130.
- [28] 祁新华,陈烈,洪伟,等.近自然园林的研究[J].建筑学报,2005(8):53-55.
- [29] 李妮,陈其兵,杨玉培.近自然植物群落景观理念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探讨[J].西南园艺,2006,34(3):24-26.
- [30] 杨玉萍,周志翔.城市近自然园林的理论基础与营建方法[J].生态学杂志,2009,28(3):516-522.
- [31] 杨玉萍,周志翔,蔡绍平,等.城市居民对城市近自然园林的态度: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J].应用生态学报,2011,22(7):1849-1856.
- [32] 冯彩云,孙振元,许新桥.近自然理念在园林建设中的应用[J].世界林业研究,2013,26(3):58-62.
- [33] 冯彩云.近自然园林的研究及其植物群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D].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14:25-80.
- [34] 刘盛.试论城市近自然园林的营建以及当前公众认知:以上海为例[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7:5-20.
- [35] 丁绍刚.风景园林概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4-9.

(责任编辑:陈丽琼)



基于体型和身体满意度的年轻女性连衣裙偏好分析

孟利云, 何 瑛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探究 18~28 周岁年轻女性的体型、身体各部位满意度与连衣裙属性偏好之间的关系, 为服装企业的产品开发与生产销售以及个性化推荐提供参考。采用交叉列联表统计分析年龄在 18~28 周岁之间不同体型的女性对连衣裙廓形、合体度的偏好; 用卡方检验、相关分析法分析体型差异、身体各部位满意度对连衣裙廓形、合体度偏好的影响及其关联程度。结果显示: 各体型的女性都比较喜欢合体和较宽松的连衣裙, 不喜欢太紧身或太宽松的连衣裙; 比较喜欢 A 型和 X 型连衣裙, 不喜欢 O 型连衣裙; 合体度偏好与体型和身体各部位满意度都相关; 对 A 型连衣裙的偏好与肩宽满意度相关, 对 X 型连衣裙的偏好与腰部满意度相关。

关键词: 体型; 身体满意度; 廓形; 合体度; 服装偏好

中图分类号: G941.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423-07

Analysis of young women's dress preference based on somatotype and body satisfaction

MENG Liyun, HE Ying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matotype of young women at the age of 18 ~ 28, body parts satisfaction and dress attribute prefere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of apparel enterprises. Cross-contingency tabl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women's preferences for dress profile and fitness. Chi-square test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body shape difference and body parts satisfaction on dress profile and fitness preference and their correlation degre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men of all shapes prefer fitted and loose dresses and dislike too tight or too loose dresses; they prefer A-type and X-type dresses, and don't like O-type dresses; fitness preference is related to body shape and body parts satisfaction; the preference for A-type dresses is related to shoulder width satisfaction, while the preference for X-type dresses is related to waist satisfaction.

Key words: somatotype; body satisfaction; profile; fitness; clothing preference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水平的提高, 服装消费日趋个性化、多样化、品牌化。不同的消费者审美不同, 偏好不同, 服装需求也不同。服装业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还在于包容消费者、迎合消费者的喜好^[1]。服装对人体具有

艺术改造的功能: 一是强化功能, 通过突出或强调人体的优势部位吸引视线, 从而忽略不完美或有缺陷的部位; 二是补偿功能, 即用服装掩饰人体缺陷; 三是塑造功能, 通过服装造型弥补人体缺陷、调整体型, 使体型趋于完美^[2]。消费者希望穿在身上的服

装既能满足自己的审美要求,又能掩盖体型缺陷、弥补体型的不足,不同体型的消费者需要不同样式的服装来适应体型的变化。因此,服装企业在进行产品开发、生产与销售时,只有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的体型特征与服装属性偏好,为消费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服装,才能提高产品销量,减少因库存积压、大幅度降价等带来的损失^[3]。女装具有庞大的市场,女装产品引起了服装企业的高度重视。连衣裙是女性普遍穿着的服装品类,是女性追求美、彰显美的重要媒介,研究女性消费者对连衣裙产品的偏好行为,可为企业连衣裙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贴体的服装能凸显人体曲线,宽松的服装掩盖人体体型,身体满意度与着装用途均能影响消费者对服装合体度的偏好。

学术界关于女性消费者的服装偏好已有一些研究。胡玉琴等^[4]探究了20~39岁之间的女性消费者的性格与服装风格偏好的关系,发现性格影响消费者对服装风格的偏好。陈加好^[5]从着装者自身因素和外界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消费者服装色彩偏好的因素。国内外学者也对消费者的体型、身体满意度、合体度偏好及影响合体度偏好的因素做了大量研究。Newcomb等^[6]研究了体型感知、BMI指数、穿衣尺码对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服装合体性偏好的影响,发现体型显著影响对上衣的合体性偏好。Seo等^[7]探究了体型、身体满意度对服装合体性偏好的影响,发现身体满意度越高越偏爱合体的服装。Tiggemann等^[8]探究了女性消费者的身体满意度、外貌投资与着装用途,发现BMI指数、体重自我分级与用于掩盖体型这一着装用途有关。Tiggemann等^[9]发现,女性消费者对身体哪些部位不满意就倾向将这些不满意的部位掩盖起来。张君浪^[2]探究了针对消费者具体的体型缺陷,如何运用视错觉原理和黄金分割律进行服装设计。张韩等^[10]研究了30~45岁女性对连衣裙裙长和廓形的偏好,发现裙长、廓形偏好都与身体满意度相关。严秦竹^[11]研究了连衣裙廓形对展示人体体型的影响,发现廓形影响人体的视觉高度、宽度和比例。不同体型的消费者对胸、腰、臀部位的满意度不同,而服装廓形的变化正是随着对肩、腰、臀部的强调或掩盖进行变化的,因此不同体型的消费者服装廓形偏好应该也有差异,但是目前对消费者的廓形偏好的相关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8~28周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以连衣裙为例,首先分析不同

体型的女性对连衣裙合体度、廓形偏好的差异;其次以连衣裙的廓形及合体度为变量,采用卡方检验、相关分析确定女性体型、身体各部位及体重满意度与连衣裙廓形及合体度偏好的关系,得到女性消费者体型、身体满意度对连衣裙廓形及合体度偏好的影响。本文旨在帮助企业了解女性体型、身体满意度及产品偏好,有针对性地向消费者推荐适合的连衣裙产品,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and 购物效率。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探究18~28周岁女性的连衣裙偏好消费行为,主要研究18~28周岁不同体型的女性对连衣裙合体度和廓形的偏好,以及体型、身体部位及体重满意度这些因素对连衣裙合体度和廓形偏好的影响。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数据。调研对象为居住在浙沪地区、18~28周岁、穿连衣裙的汉族女性,因为Lee等^[12]发现不同种族之间同一类型的身体尺寸和身体比例各不相同。为了避免种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汉族女性。调研问卷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为筛选题,包括是否穿连衣裙、年龄、是否为汉族3个问题,通过筛选题首先排除部分不符合条件的问卷;第2部分为受访者基础信息,包括身高、体重、工作、体型、购买的连衣裙单价、上衣尺码6个问题;第3部分为身体各部位满意度,包括肩宽、胸部、腰部、腹部、臀部、上下身比例、大腿粗细、小腿粗细、手臂粗细、体重10个条目;第4部分为连衣裙属性偏好,包括合体度、风格、颜色、材质、花色、廓形、领型、袖型、裙长、袖长10个属性。其中,问卷第3部分身体满意度量表参考Alexander等^[13]的量表设计。身体满意度量表最初是由Secord等^[14]研发的,用于评估受访者对自己身体满意或不满意的程度,后来这个量表被广泛用于自我感觉的研究。

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先进行小范围的试调研,根据受访者的反馈对问卷修改调整,再进行正式调研,以免受访者理解有误或不理解一些专业术语导致调研结果的偏差。经试调研发现部分受访者对体型、廓形、领型、袖型分类不清,因此增加了各类体型、廓形、领型、袖型的图片以帮助受访者区分。在网上通过专业的调研平台发放问卷,每个IP只能填写一次,共收到270份问卷,根据筛选问题等判断删除

32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38份,有效率90.9%,其中18~23周岁女性116名,24~28周岁女性122名。

二、数据分析

(一)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量表编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决定了评价结果的可信性和可用性,用Cronbach α 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检测问卷的有效性。其中身体各部位满意度部分的Cronbach α 系数是0.903,内在信度很高;连衣裙属性偏好部分的Cronbach α 系数是0.732,内在信度可以接受。

本问卷是参考前人的问卷设置与研究结果^[7,10,13]进行的改编,并且在正式发放之前进行了小范围的试调研,根据受访者的反馈对调研项目和语言描述进行了修改,因此本文卷的内容效度可以接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第2部分身体各部位满意度部分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贝利特球型检验的概率为0,小于0.05,KMO值是0.871,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由此可知问卷的身体各部位满意度结构效度较好。通过信度与效度分析可知,本研究问卷设置得合理有效。

(二) 不同体型女性的连衣裙属性偏好

人体体型是指由于骨骼起伏、脂肪不均所引起的人体外型轮廓凹凸,反映了人体外型的特征和类型,也反映了身体各部位的比例,包括上下身比例、身高与肩宽的比例以及胸围、腰围与臀围之间的比例等^[10,15]。体型有多种分类法,可按胖瘦程度、胸腰差分类,也可按外形轮廓分类。本研究采用国际上常用的外形轮廓分类法将体型分为沙漏形、矩形、三角形、椭圆形、倒三角形五种体型,让受访者主观判断自己的体型。沙漏形体型特征是肩宽约等于臀宽,有明显的细腰;矩形体型特征是肩宽约等于臀宽,腰部曲线不明显;三角形体型特征是肩宽小于臀宽;椭圆形体型特征是腰腹部凸出;倒三角形体型特征是肩宽大于臀宽^[3,13,15-16]。在问卷中给出五种体型的黑白线图并进行文字描述帮助受访者辨别自己的体型,如图1所示。虽然主观判断体型与采用人体测量的方法判断体型具有一定的误差,但Shim等^[17]发现,消费者对自己体型和身体尺寸的感知,像实际身体测量一样,显著地影响她们的行为及其回答问题的方式,因此由受访者主观判断其体型的方法也具有可行性。

对受访者的体型数据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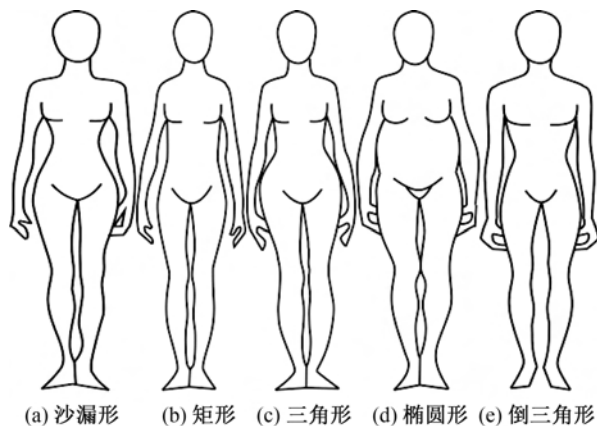


图1 五种体型

行分析,经频数分析得知:18~28周岁的女性认为自己的体型是沙漏形、矩形、三角形、椭圆形、倒三角形的人数分别是73、91、36、14、24人,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是30.7%、38.2%、15.1%、5.9%、10.1%。由此可知,18~28周岁的女性主要是矩形和沙漏形体型,椭圆形体型的人数最少。当今社会,部分女性以瘦为美,尤其是年轻女性追求骨感美,对自己的体重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年轻女性群体中肥胖型的女性较少。张韩等^[10]研究发现30~45岁的女性主要为三角形和矩形体型,由此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体型具有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脂肪堆积、生育等的影响,人体的体型都可能发生变化。人体是服装造型的依据,为了使服装符合人的生理特征,穿着舒适,并具有美感,在进行款式设计时必须充分了解人体体型特征,根据不同的体型进行结构设计^[18]。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产品定位和消费者定位,因此企业在进行服装产品开发时应首先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的体型特征,以生产研发更加迎合消费者体型特征的产品,尽可能减少合体性问题。

1. 不同体型女性对连衣裙合体度的偏好

Newcom等^[6]研究了体型感知对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服装合体性偏好的影响,发现体型显著影响对上衣合体性的偏好。服装的合体度根据放松量的不同有紧身、合体、较宽松、宽松四种。对体型与连衣裙合体度偏好进行交叉列联表统计,分析各体型女性对四种合体度的偏好。经交叉列联表统计,五种体型的女性对4种合体度的偏好率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沙漏形、矩形、三角形、倒三角形四种体型的女性都喜欢合体的连衣裙,偏好率分别为60.3%、50.5%、47.8%、50.0%;沙漏形体型的女性对其它3种合体度的连衣裙偏好率都比较低,矩形、三角形、倒三角形三种体型的女性对较宽松款的偏

好率也比较高,偏好率分别为 36.3%、47.0%、37.5%;椭圆形体型的女性最喜欢较宽松的连衣裙,对宽松和合体款的偏好率也比较高,偏好率分别为 42.9%、28.8%、28.3%;各体型的女性对紧身连衣裙的偏好率都较低,都低于 9.0%。总体看来,各体型的女性都比较喜欢合体和较宽松的连衣裙,不喜欢太瘦或太胖的紧身与宽松款连衣裙,但是椭圆形体型这类比较胖的女性比较喜欢相对宽松的连衣裙。合体款能够较好展现女性的曲线美,但紧身款舒适性较低,也不便于肢体活动,而过于宽松的服装不但掩盖了女性的曲线美还会对肢体活动产生阻碍,因此除椭圆形这种比较肥胖的体型外,其他四种体型的女性都比较喜欢合体款,不喜欢紧身款和宽松款,沙漏形这种比较完美的、理想体型的女性尤其钟爱合体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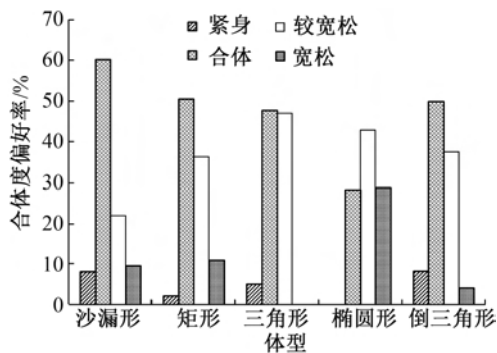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体型女性对各连衣裙合体度的偏好率

由图2可知,不同体型的女性对同一合体度的偏好率差别比较大,对体型与连衣裙合体度偏好进行卡方检验,检验不同体型的女性合体度偏好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0.05。经似然比检验,概率 $P=0.015 < 0.05$,表明不同体型的女性合体度偏好有显著性差异,即体型对连衣裙合体度偏好有影响。

对体型与合体度偏好进行相关分析,探究合体度偏好与体型的相关程度。经相关分析, $P=0.034 < 0.05$,Gramer's 系数即相关系数为 0.177,表明合体度偏好虽然与体型相关但关联程度较弱。

2. 不同体型女性对连衣裙廓形的偏好

服装廓形即服装的外轮廓,是指服装整体外部造型的剪影,其决定了服装的整体效果,体现了服装的款式、风格和结构等^[19-20]。服装廓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肩、腰、底摆这几个部位。服装廓形也主要是随着对这几个部位的强调或掩盖进行变化的,强调或掩盖的部位不同、程度不同,便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廓形。廓形有多种分类方法,比较常用的是字母分

类法,即用字母概括形容服装廓形,如 A 型、H 型、T 型、O 型、X 型、V 型、S 型,其中 A 型、H 型、T 型、O 型、X 型是比较典型的廓形^[19-20],本文主要研究女性消费者对这五种连衣裙廓形的偏好。A 型的特征是上窄下宽,上贴下松,腰部或贴体或宽松,下摆较大;H 型的特征是腰部较宽松,肩、腰、下摆的宽度基本一致;T 型的特征是上宽下窄,扩张肩部、腰部自然放松、下摆收缩;O 型的特征是中间膨胀,下摆收拢;X 型的特征是宽肩、细腰、臀围和下摆较大^[19]。问卷中给出这五种廓形的连衣裙款式如图3所示,帮助受访者分辨各种廓形。



图3 五种连衣裙廓形

对体型分别与五种廓形偏好进行交叉列联表统计,分析各体型女性对连衣裙各廓形的偏好率,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沙漏形、矩形、三角形、倒三角形四种体型的女性都最喜欢 X 型连衣裙,偏好率分别为 78.1%、65.9%、69.4%、91.7%,其次为 A 型,偏好率分别为 41.1%、56.0%、58.3%、50.0%;椭圆形体型女性最喜欢 A 型连衣裙,其次为 X 型;对 T 型连衣裙的偏好率也比较高,偏好率分别为 64.3%、42.9%、35.7%;各体型的女性都最不喜欢 O 型连衣裙,偏好率极低,都不足 8.0%。总体看来,各体型的女性都比较喜欢 X 型和 A 型连衣裙,不喜欢 O 型连衣裙。X 型廓形与女性的优美曲线相吻合,能凸显女性的腰部,掩盖臀部,并且在连衣裙制版时往往将腰线抬高,以便着装后具有拉长下半身使上下身比例趋于完美、身材看起来修长的效果,给人柔和、优雅又不失活泼的感觉。因此,除了腰腹部比较凸出、对腰腹部满意度较低的椭圆形体型外,其余四种体型的女性都比较喜欢 X 型连衣裙。A 型连衣裙给人青春、活泼、充满活力的感觉,因此 A 型连衣裙也比较受年轻女性的喜爱。由此看来,企业在进行连衣裙产品开发时应以 X 型和 A 型连衣裙为主,少生产开发 O 型连衣裙,避免滞销和库存积压。

分别对体型与五种廓形偏好进行卡方检验,检验不同体型的女性连衣裙廓形偏好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显著性水平为 0.05,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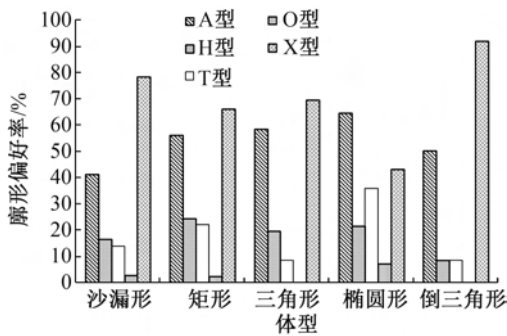


图4 各体型女性对各廓形的偏好率

表1可知:体型与A型、H型、T型、O型四种廓形偏好的似然比独立性检验的概率 P 都大于0.05,与X型廓形偏好的似然比独立性检验的概率 P 小于0.05,表明不同体型的女性对A型、H型、T型、O型连衣裙的偏好没有显著性差异,对X型连衣裙偏好有显著性差异,即体型不影响女性对A型、H型、T型、O型四种廓形的连衣裙的偏好,只影响对X廓形连衣裙的偏好。对体型与X型廓形偏好进行相关分析得, $P=0.009<0.05$,Gramer's系数为0.237,说明体型与对X型的廓形偏好相关,但相关性一般。

表2 受访者对身体各部位及整体的满意度均值

身体部位	肩宽	手臂粗细	胸部	腰部	腹部	臀部	大腿粗细	小腿粗细	上下身比例	体重	整体
满意度均值	4.45	4.02	4.37	4.41	3.88	4.15	3.60	3.84	4.37	3.54	4.12

1. 身体满意度对合体度偏好的影响

对9个身体部位及体重、身体整体的满意度分别与连衣裙合体度偏好进行Kendall's tau-c系数检验,检验女性连衣裙合体度偏好与身体各满意度的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0.05,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

表3 身体部位满意度与合体度偏好的Kendall's tau-c系数检验的结果

项目	肩宽	胸部	腰部	腹部	臀部	上下身比例	大腿粗细	小腿粗细	手臂粗细	体重	整体
P	0	0.027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0.003	0.002	0.001	0
相关系数	-0.212	-0.116	-0.175	-0.165	-0.161	-0.172	-0.169	-0.149	-0.157	-0.161	-0.187

2. 身体满意度对廓形偏好的影响

对9个身体部位及体重、身体整体的满意度分别与五种连衣裙廓形偏好进行卡方检验,检验各部位满意度对连衣裙廓形偏好是否有影响,显著性水平为0.05,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肩宽满意度与A型连衣裙偏好的似然比独立性检验的概率 P 值、腰部满意度与X型连衣裙偏好的似然比独立性检验的概率 P 值均小于0.05,说明肩宽满意度对A型连衣裙偏好有影响,腰部满意度对X型连衣裙偏好有影响。身体各部位满意度、体重满意度、身体整体满意度对H型、T型、O型连衣裙的偏好都没有影响。

表1 体型与五种廓形偏好的卡方检验 P 值

检验方法	A型	H型	T型	O型	X型
皮尔森卡方	0.238	0.454	0.064	0.530	0.009
似然比	0.235	0.406	0.069	0.440	0.007
线性 and 线性组合	0.193	0.493	0.824	0.629	0.908

(三) 身体满意度对连衣裙款式偏好的影响

身体满意度是指消费者对身体各部位满意或不满意的程度,被视为消费者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并被用来评估身体形象。Tiggemann等^[9]发现,消费者倾向凸显自己身体比较满意的部位,掩盖不满意的部位。本研究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法让受访者对自己肩宽、胸部、腰部、腹部、臀部、上下身比例、大腿粗细、小腿粗细、手臂粗细等9个身体部位以及体重的满意度进行评价,从1级到7级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用9个身体部位满意度的平均值表示身体整体满意度,各部位及整体满意度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18~28周岁的女性大体上对身体上半身各部位比较满意,对下半身各部位比较不满意。

3可知,检验概率 P 值都小于0.05,表明连衣裙合体性偏好与这11个满意度都相关,又Kendall's tau-c系数即相关系数都小于0,表明合体度偏好与身体该部位满意度负相关,该部位满意度越高越喜欢较贴体的连衣裙,与Alexander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

肩宽满意度与A型连衣裙偏好进行相关性检验, $P=0.003<0.05$,Gramer's系数为0.290,表明对A型连衣裙的偏好与肩宽满意度相关,关联强度一般。腰部满意度与X型偏好进行相关性检验, $P=0.022<0.05$,Gramer's系数为0.250,表明对X型连衣裙的偏好与腰部满意度相关,关联强度一般。

经卡方检验与相关分析知,女性消费者对X型连衣裙的偏好既与体型相关又与腰部满意度相关。X型连衣裙的特征是肩部稍宽松、腰部收紧、下摆扩张,能凸显人体的腰部,其它四种廓形的连衣裙腰部都比较宽松,掩盖了腰身。沙漏形、椭圆形、矩形、三角形、倒三角形五种体型的女性腰部满意度均值分

表4 身体满意度与廓形偏好的卡方检验 P 值

廓形	肩宽	胸部	腰部	腹部	臀部	上下身比例	大腿粗细	小腿粗细	手臂粗细	体重	整体
A型	0.002	0.238	0.555	0.437	0.527	0.419	0.686	0.966	0.356	0.163	0.708
H型	0.174	0.686	0.587	0.742	0.828	0.931	0.117	0.301	0.590	0.792	0.602
T型	0.369	0.631	0.462	0.370	0.666	0.076	0.278	0.745	0.727	0.537	0.528
O型	0.781	0.246	0.209	0.714	0.566	0.288	0.821	0.623	0.228	0.787	0.511
X型	0.090	0.106	0.019	0.162	0.973	0.550	0.500	0.470	0.088	0.257	0.492

别是 5.25、2.64、3.85、4.72、4.54,沙漏形体型的女性有明显的细腰,腰部满意度最高,椭圆形体型的女性腰部凸出脂肪堆积,腰部满意度最低,也说明了消费者倾向掩盖身体不满意的部位凸显比较满意的部位。

三、结 语

本文对 18~28 周岁女性消费者的体型、身体满意度以及连衣裙属性偏好进行了问卷调研,通过对廓形偏好、合体度偏好、体型、身体满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a)18~28 周岁女性的体型主要为矩形、沙漏形体型,椭圆形体型人数最少。

b)18~28 周岁女性对上半身各部位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下半身各部位的满意度。

c)各体型的女性对合体及较宽松的连衣裙偏好率普遍高于紧身型连衣裙,椭圆形体型女性对宽松连衣裙的偏好率显著高于其它体型。并且,对连衣裙合体度的偏好与身体各部位的满意度都存在相关性,女性对身体各部位的满意度越高对较贴体连衣裙的偏好率越高。女性消费者倾向于突显身体比较满意的部位,掩盖不满意的部位。

d)各体型的女性都比较喜欢 A 型和 X 型连衣裙,对 O 型连衣裙的偏好率比较低,倒三角形体型的女性对 X 型连衣裙的偏好率明显高于其它廓形。并且,肩宽满意度对 A 型连衣裙的偏好有影响,腰部满意度对 X 型连衣裙偏好有影响,但大部分身体部位的满意程度与连衣裙廓形的偏好不存在相关性。

由以上结论可知,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服装偏好也有差异,企业应明确产品定位、消费者定位,在产品开发之前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的特征、产品需求与产品偏好以及影响产品偏好的因素,再进行产品生产开发。销售人员应有针对性地向不同类型的顾客推荐产品,提高成交率,增加销量,减少库存积压。

本文在调研体型时采用受访者自行分辨体型的方法,不能保证每个受访者都能正确分辨、真实填写

自己的体型,后续研究可采用人体测量的方法分辨体型,或同时采用两种方法对调研结果进行对比,并且对研究对象也可根据其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等因素进一步细分。

参考文献:

- [1] Makhanya B P, De Klerk H M, Adamski K, et al. Ethnicity, body shape differences and female consumers apparel fit proble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14, 38(2):183-191.
- [2] 张君浪. 服装对人体体型的修饰设计研究[J]. *山东纺织经济*, 2013 (10):53-55.
- [3] Pisut G, Jo Connell L. Fit preferences of female consumers in the USA[J].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2007, 11(3): 366-379.
- [4] 胡玉琴,钟安华. 中青年女性性格与服装购买偏好的研究[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15, 28(2):40-43.
- [5] 陈加好. 服装色彩影响因素研究[J]. *毛纺科技*, 2017, 45 (6):53-55.
- [6] Newcomb E, Istook C. Confronting stereotypes: Apparel fit preferences of Mexican-American women[J].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2011, 15(4):389-411.
- [7] Seo J I, Namwamba G W. Fit issues in ready-to-wear clothing for African-America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body shap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shion Desig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2018, 11 (2):160-168.
- [8] Tiggemann M, Lacey C. Shopping for clothes: Body satisfaction, appearance investment, and functions of clothing among female shoppers[J]. *Body Image*, 2009, 6(4):285-291.
- [9] Tiggemann M, Andrew R. Clothing choices, weight, and 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J]. *Body Image*, 2012, 9 (3):409-412.
- [10] 张韩,应君雅,杨允出. 30~45 岁女性身体满意度与连衣裙款式偏好分析[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16, 36 (3):252-257.
- [11] 严秦竹. 基于服装造型与人体体型的“人体—服装”系统廓形变化研究[D]. 武汉:武汉纺织大学, 2017:1-29.

- [12] Lee J Y, Istook C L, Nam Y J, et al. Comparison of body shape between USA and Korean wome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ot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19(5):374-391.
- [13] Alexander M, Jo Connell L, Beth Presley A. Clothing fit preferences of young female adult consum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ot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17(1): 52-64.
- [14] Secord P F, Jourard S M. The appraisal of body-cathexis; Body-cathexis and the self. [J].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1953, 17(5): 343-347.
- [15] 丁中娟,杜劲松. 女性体型分类研究概述[J]. *国际纺织导报*,2016,44(12):57-61.
- [16] Manuel M B, Connell L J, Presley A B. Body shape and fit preference in body cathexis and clothing benefits sought for professional African-American wome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shion Desig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2010, 3(1):25-32.
- [17] Shim S, Bickle M C. Benefit segments of the female apparel market: Psychographics, shopping orientations, and demographics [J].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1994, 12(2): 1-12.
- [18] 张莉,沈雷.人体体型特征与服装结构平衡初探[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8,31(4):13-17.
- [19] 傅白璐,李峻,刘晓刚. 女装廓形精细化分类与智能识别[J]. *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4(5): 724-733.
- [20] 陶晨,段亚峰,印梅芬. 服装廓形的识别与量化[J]. *纺织学报*,2015,36(5):79-82.

(责任编辑:陈丽琼)



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教学改革

龚素璪, 张祖品, 岑俊静, 许丽芬, 张孝凤

(浙江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 杭州 310018)

摘要: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广度、深度有待挖掘,课程教学线上与线下结合有待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授课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情况、学生应用网络有效开展泛在化学习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线上线下结合存在的问题。采用“互联网+”构建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和自主学习新模式,提出实现线上、线下有效对接的路径:增强和提升授课教师对加强传统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的意识 and 能力;搭建师生交流网络平台,延伸课堂教学;优化网络学习资源,吸引学生主动开展线上学习。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信息技术;网络学习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430-06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in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GONG Suli, ZHANG Zuping, CEN Junjing, XU Lifan, ZHANG Xiaofeng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by relying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st be explored to improv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By investigating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tudents' extensive learning with network,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were analyzed. The "Internet+" was used to construct classroom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and a new mode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effective path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ation was proposed, namely, to enhance the teachers'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lassroom educ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a networ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xtend classroom teaching; to optimize network learning resources and attract students to actively carry out online stud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learning

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凸显,寝室人际关系紧张,就业、学业压力增大,失恋伤人自伤等心理问题事件屡有发生。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是高校育人的重要方面,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不断提升心理健康素质^[1]。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加强课程教学研究,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充分发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针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逐年增加,内容主要涉及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堂教学手段、教学模式、课程评价体系等方面^[2-9]。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学者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关注点转向了网络^[10],对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移动APP、网络平台在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开展了研究^[11-15]。但相对来说,对传统的课堂教学研究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互联网+”的课程教学研究相对较少,课堂教学依托网络资源线上线下结合的网络化教学模式、课外网络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结合的学习模式研究更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72亿,较2017年末增加1668万人,增长率为10.70%。^[16]线上线下教育相融合是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习者,高校教师需要顺应数字化时代潮流和数字化革命趋势,转变观念,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探寻“互联网+”的课程教学新模式,包括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学生网络化泛在课外自主学习新模式,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与课外网络学习,即线上与线下教学的有效对接,将是提高这一课程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也将是该课程教师的必修课。笔者所在课题组通过调研与分析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授课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情况、学生应用网络有效开展泛在化学习的情况,消化吸收境内外高校先进的课堂教学理论、网络学习平台建设与实践经验,提出课程网络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效对接的方法和路径,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探索增强课程教学的

科学性、实效性,增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的有效方法。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线上线下结合的现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一门开设时间不长、但学生涉及面广泛的课程,笔者所在学校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开发网络教学资源,鼓励教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依托学校4A网络平台,该课程网络平台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但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该课程教学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课堂教学依托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广度、深度有待挖掘,课程课堂教学如何依托网络进行课外延伸有待进一步推进。为深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的线上线下结合情况,课题组对2016级两个班级选课学生,就授课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主要是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情况、学生应用网络有效开展学习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课题组共发放调查问卷106份,收回有效问卷106份。从调查情况来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授课教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学生开展课程网络学习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学生借助网络平台等媒介进行自主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待提高

随着知识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知识传递方式受到挑战,师生互动、课堂网络互动的知识传递方式已成趋势,教师的角色需要由知识传授者、课程教学组织者向学生的学习伙伴转变。但是仍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部分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灌输式”教学模式,网络学习与课堂教学结合度不高,学生还无法有效借助网络平台等媒介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从调查结果来看,对于“您会利用网络进行相关心理课程学习吗?”这一问题,学生回答“经常”的仅占1.88%,回答“偶尔”的占62.27%,回答“从不”的占35.85%。

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有的教师未给学生搭建网络学习平台,或者未对学生网络学习给予引导和指导,或者未把“上网学习”列入课程考核计划,对学生“上网学习”没有明确要求,且有些网络平台本身就缺失“上网监控记录”功能,对学生网络学习他律不足;另一方面是学生在网络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不足,缺乏借助网络平台等媒介有效开展自主学习的意识,自律不够,还未养成网络学习习惯。课题组选取了两个调查班级,其中一个班级授课教师对学生网络学习几乎没有要求,未提供相应的网络学习平台,而另一个班级教师给学生提供了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4A 网络平台学习路径以及网上精品课程的网站链接,两个班级的学生使用网络学习情况由此显示出差异。

(二)教师应用网络资源、网络平台开展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待加强

当前,虽然广大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基本能够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但大部分还只是简单应用,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其主要原因是在于任课教师的信息化素养还不够高,数字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不强,信息化教学创新水平不足。从课题组访谈和调查情况看,以下三个方面主要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网络平台辅助教学功能的充分发挥。一是部分教师不太适应新的课程改革,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法较慢,在课程教学中不主动甚至拒绝使用网络平台等网络资源。二是部分教师还没有将课程资源真正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学习资源,课堂教学无法有效利用网络资源。三是学校对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要求还处于松散型阶段,以奖励为主要手段鼓励教师建设网络课程,教师对学生开展网络学习亦没有刚性要求。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自身建设面临着一项迫切的任务:转变观念,提升教师自身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主动把网络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实践中,在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外学习中都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网络资源以实现有效教学。

(三)课程网络学习渠道有待开拓,网络平台资源有待优化

根据教育部课程平台资源建设标准和要求,网络教学平台必须提供相应的基本资源、拓展资源、特色资源和实践资源,满足资源开放和学生共享的要求。笔者所在学校虽然建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习网络平台,但存在网络资源建设不足、开放性低、个性化差、更新率低等问题。从访谈和调查情况看,使用学校 4A 网络平台的 30 位学生中,对于问题“平时使用学校 4A 网络平台的主要用途”,所有学生都选择了“完成作业”,83.30%的同学选择“看视频资料”,40.00%的学生选择“看 PPT”,

13.30%的学生选择“和教师沟通”。接受访谈的学生指出,网络平台的资源内容还不够轻松、不够贴近生活,平台提供给学生使用的方式应该更新颖,需要多开发能够引发学生对心理健康产生兴趣的应用。学生认为网络学习渠道单一,平台资源不够丰富,内容有些枯燥,与实际联系不够,加之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普遍较差,由此造成了学生不爱上网学习,使用网络平台进行学习的面窄、频率低的局面。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的路径

(一)强化授课教师团队信息素养提升,构建网络教学基础

当前,包括笔者所在高校在内的普通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师资队伍普遍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教师为辅,即在师资队伍中大多数人员为辅导师员^[2],或者从辅导员成长起来的党务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而该师资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性相对其它课程来说更大,加之部分教师承担了党务、行政工作,本身工作任务繁重,对他们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的难度大,教师参与课程有关的培训、外出学习进修机会相对较少。因此,该课程归属部门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情况,依托现代化的教育技术,以团队的形式对师资队伍进行建设。

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归属部门是学生处,2 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专门负责课程建设,其他授课教师基本为兼职教师。面对专职教师少、兼职教师流动性大的实际问题,一方面,学校选派授课教师参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门培训,鼓励教师参加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另一方面,考虑到该课程内容与大学生学习、生活、社会活动以及年龄层密切相关,授课教师既需要具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又需要切实了解当下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规律,教学必须紧扣现实,学校通过团队形式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每个授课班级教师团队的专业水平和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授课的能力。其一,学校对全体授课教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授课的能力进行培训;组建微课制作团队,由两位专职教师负责建设微课,并将微课上传到“易班”平台供授课教师观摩、学生学习,教师之间通过微课程相互学习,提高教学技能。其二,年轻辅导员和年长的教师组合授课,将年轻教师接受新事物及时、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强的优势与老教师教学富有经验、人生阅历丰富的优势有机结合、合

理分工,老教师主要设计课程课堂教学内容和网络学习内容,年轻教师主要负责网络课程建设、指导学生使用4A网络平台、“易班”学习平台。由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团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网络教学的水平得到提升,教师能够主动适应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变革,主动构建“互联网+”的互动式教学模式,为实现该课程网络学习与课堂学习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打下基础。

(二)构建新型“互联网+”的学习模式,有效延伸课堂教学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泛在学习(U-Learning,无缝学习、普适学习、无处不在的学习)^[17]——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都可以获取所需的学习信息和学习支持等已成为趋势。也正由于此,大学生群体获取知识的渠道变得异常丰富,需要教师构建新型“互联网+”的学习模式——网络泛在自主学习模式,引导学生从课堂“被动学习”向课堂与课后网络相结合的“主动学习”转变。要实现学生网络自主学习,实现课程课堂学习与网络学习的有效对接,需要创造一个由学习者、学习内容和学习服务等构建的一个随时随地的学习环境——泛在学习环境^[18]。课题组重视网络泛在学习环境的建设,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重构师生关系,对学生课程网络学习进行有效干预,架构好课堂教学和网络平台学习的桥梁,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让互联网成为知识的“增幅器”,实现“智慧学习”。

首先,充分发挥微信这一新型社交平台的作用,搭建师生交流平台。微信群作为多人聊天交流的一个平台,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已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交流平台。鉴于此,基于泛在学习理论,课题组授课教师着力构建网络泛在学习环境。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课之初,教学班级(2017级海洋资源专业班级)就建立了“海资心理”课程微信群,教师根据授课内容,在微信群陆续推荐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网络学习渠道和网络学习资料。例如,课题组授课教师发现,2017级海洋资源专业新生进校不久,绝大部分学生计划继续深造——考研或申请出国,但他们对硕士毕业之后是否继续读博比较困惑,针对此情况,授课教师选取了和课程教学中“大学生涯规划”相关的网络帖子“我为什么鼓励你读博士”推送到微信群,供学生借鉴。又如,授课教师在微信群中推荐名言警句辅

助教学。如在讲到“挫折应对”这一章前,教师将“尽管失败和挫折等待着人们,一次次地夺走青春的容颜,但却给人生的前景增添了一份尊严,这是任何顺利的成功都不能做到的。——梭罗”等有关失败与成功的关系、挫折应对等方面的名言警句推介到微信群中。

其次,做好网络精品课程的推介。网络环境下,新知识源源不断地产生,大学生群体面临着信息化学习环境的挑战,需要授课教师对其选择网络学习资源进行有效指导,学会网络化的知识管理。网络上已存在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一系列视频公开课、慕课和微课等心理课程,课题组对网上海量信息进行遴选,向学生推荐网络精品课程,引导学生有效开展泛在网络自主学习。课题组教师通过对网络课程的观摩,推荐示范性课程给学生,让学生利用课外碎片化的时间先学先修,或者开展课后的复习巩固。如课题组教师以“心理学”为主题词检索,对“爱课程网”(http://www.icourses.cn/home/)进行检索,搜索到52项视频公开课,通过观摩,选取清华大学樊富珉教授、东北大学张平教授讲授的心理健康教育视频公开课推荐给学生;对2018级选课学生,教师在“爱课程网”的基础上推荐“学堂在线”(http://www.xuetangx.com/)中南大学叶湘虹副教授的视频公开课。从访谈来看,学生对于教师推介网络精品课程普遍反映良好,认为其对心理健康知识学习有促进作用。

再次,课题组教师基于网络泛在化学习理论、成效为本教育理论,着力构建以“网络学习先行”自主学习为基础的互动式课堂教学模式,促动学生有效开展网络学习。一方面,对学生明确“上网学习”的要求。针对当代大学生学习自觉性普遍较差、不爱上网学习、网络课程点击率低的实际情况,课题组教师把“上网学习”列入教学计划,并作为课程考核依据之一,明确“上网学习”的要求;精心设计路径,督促、引导学生“积极上网”,如对学生“上网学习”进行跟踪、监控、记录,并将之与课程考核评价挂钩。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学生使用网络学习平台,有效与课堂教学对接。如,课题组教师让学生对网络课程先修先学,尝试让学生上讲台分享知识。具体做法是,提前三周通知学生自由组成4~6人的小组,选择“爱是自我成长的过程——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与“让心灵自由飞翔——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两章中的任意一节进行备课,包括制作PPT,选择一位组员进行课堂讲授,授课时长15分钟;每组抽取一位

组员担任评委组成评委会,对所有学生小组的授课情况进行随堂评分,分数作为该课程平时成绩之一。在备课过程中,学生既借鉴学校4A网络平台中的课件、“爱课程网”等网站的视频公开课,又寻找了其它参考资料进行准备,由此对这一章节进行了充分的学习。由学生担任评委,学生在课堂上基本能做到专心听讲。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其他同学积极配合,课堂氛围相当活跃。课后,学生们认为借助网络学习进行自主备课是一种能激发他们学习主体性、积极性的好形式。网络学习及学生备课授课,赋予了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改变学生学习的被动性与强迫性,让学生自主学习,从“不教不懂”向“无师自通”转变,让其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优化课程网络平台资源,吸引学生自主开展线上学习

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课程网络平台日益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要的教学辅助资源和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从文献资料及课题组的学经验、学生访谈情况来看,网络平台至少有四方面作用:一是学习可以拓宽教学渠道,使教学不受时空限制,学生可实现远程自主学习;二是可以以丰富的网络资源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增强课程内容吸引力,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三是可以促进教师教学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不断探索课堂与网络平台结合的教学新模式;四是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个性的培养和发展。因而,积极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并有效运用到课程教学中,是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效对接的基础。

课题组以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四大作用为目标,基于两方面考虑优化平台:一方面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教学资源,增强平台课程网络学习的实效性——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和内容要符合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另一方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网络平台的形式和内容要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学习平台,吸引学生作为教学的参与主体,接受并主动参与网络平台学习。由此,课题组以学校的4A网络平台为依托,结合课程特点、网络学习行为特征和学生的需求,在4A网络平台重点开发了课程资源、讨论交流、作业管理等功能。为了培养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时间紧、任务重的矛盾,使学生能够将课堂教学的部分任务通过4A网络平台自主学习完成,实现网络平台课堂教学时空的延伸功能,将集

体备课的课件、或教师个人课件上传到“课程资源”区;为了增加平台的吸引力、教学内容的时代感,授课教师对课件及时更新。同时,课题组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和课后学生交流情况,设计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上传到“内容讨论区”,并提醒学生参与讨论。如,对2017级海洋资源班级学生,授课教师在4A网络平台上传了与课堂教学、与大学生生活相关的“情绪”“人际交往”和“挫折应对”等讨论话题。2018年9月,笔者所在学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启用“易班”平台。这一平台基于4A网络建设的经验,增加了习题模块、网络考试模块,其中习题随机生成,学生可以反复练习,习题内容与课程考试内容相关联,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课外学习,增强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三、结 语

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课堂教学依托网络资源、线上线下结合开展教学情况,以及学生课外网络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结合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以网络泛在化学习理论、成效为本教育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以“互联网+”课堂互动教学模式、“互联网+”网络泛在化自主学习新模式的构建为目标,提出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线上线下教学有机结合的有效路径:提升授课团队信息素养,促进教师团队有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将“灌输式”教学模式向“互动式”教学模式转变;搭建课程师生交流网络平台,创建网络泛在自主学习环境,有效延伸课堂教学;建设网络化的学习资源,优化课程网络平台资源,引导学生从课堂“被动学习”向课堂与课后网络学习相结合的“主动学习”转变。

通过教学实践,课题组在创新课堂教学互动模式、课外学生网络自主学习模式上获得了第一手的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经验。根据2017级海洋资源班的教学改革实践情况来看,学生对课程的认可度提高,对教师的教学评价成绩比往届学生高,更重要的是通过线上线下教学结合,能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困惑,既帮助大学生提高了心理素质,又帮助他们培养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引导其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由此可见,本文提出的经验和观点值得推广。限于时间因素,在教改实践中对于研究点之一的网络平台建设研究还存在不足,今后课题组将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9(01).
- [2] 薛春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特点及其反思[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4):66-67.
- [3] 于成文,史立伟,王艳.体验式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探索与应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5):136-138.
- [4] 于丽玲,张斌.从医学生的心理需求现状探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模式[J].卫生职业教育,2018,36(2):40-41.
- [5] 李艳鸽.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研究[J].校园心理,2018,16(2):157-158.
- [6] 邓志平.心理行为训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影响[J].教育观察,2018,7(5):15-17.
- [7] 张建兴.团体心理辅导在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应用[J].教育现代化,2018(11):105-107.
- [8] 刘军,陈璟明.基于实效性的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探究: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7,33(6):19-22.
- [9] 游英会,王志琳,郑爱明,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50-252.
- [10] 谭咏梅,张界平,蒋玄.基于易班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思考[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8,27(4):83-86.
- [11] 冯淑丹,刘洋,张介平.“慕课”时代下体验式教学在地方医科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7(8):71-72.
- [12] 钱乐琼,曹石珠.MOOC·翻转·体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新探索[J].湘南学院学报,2017,38(6):106-109.
- [13] 孙慧.翻转课堂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可行性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37(3):38-40.
- [14] 陆建兰.微课程视阈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7(12):207-209.
- [15] 徐玉兰.心理健康教育微课程 APP 建设策略探[J].思想理论教育,2017(1):91-95.
- [16]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8-08-20)[2018-11-20].
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yzbg/hlw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
- [17] Chen Y S, Kao T C, Sheu J P, et al. A mobile scaffolding-aid-based bird-watching learning system [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2002:15-22.
- [18] Yang S J H. Context 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peer-to-peer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06, 9(1):188-201.

(责任编辑:陈丽琼)



结合电子设计竞赛的“电力电子技术” 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杨俊秀¹, 姚青¹, 赵文来¹, 张寅孩¹, 周高峰²

(1. 浙江理工大学信息学院, 杭州 310018; 2.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电子设计竞赛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加强创新设计能力、增进团队合作等能力的有效手段, 同时也能促进高校相关课程的改革。“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涉及电子技术、控制技术和电力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电力电子器件、整流电路、逆变电路、直流-直流变换、交流-交流变频、PWM 控制技术及其软开关等, 课程实践性和工程性都很强。根据“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课程教学改革思路并加以实践, 包括将“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与电子设计竞赛结合, 把电赛题目带进课堂, 通过案例式教学讲授知识点, 积极动员学生参与电子设计竞赛, 积累好的作品反馈于课程教学等。结果表明: 结合电子设计竞赛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选课学生数有明显提升, 参与电子设计竞赛的学生人数和获奖比例有一定提高。

关键词: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直流-直流变换; 电力电子技术; 电赛赛题; 课程;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TN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436-07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based on National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s Design Contest

YANG Junxiu¹, YAO Qing¹, ZHAO Wenlai¹, ZHANG Yin Hai¹, ZHOU Gaofeng²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College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s Design Contest (NUEDC)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operation ability, strengthen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mprove team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motes the reform of relevant courses.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urse involve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ower technology. The main contents contain power elements, rectifying circuit, inverter circuit, DC-AC converter, AC-AC variable frequency, PWM control technology and soft switch. The course has strong practice property and engineering property.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course teaching reform idea was put forward and practiced, including combining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with electronics design contest, introducing contest questions into class, teaching knowledge points by cases, mobiliz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NUEDC and accumulating excellent works in course teach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number of students choosing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urse which combines National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 Design Contest increases obviously, and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NUEDC and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inning the awards improves.

Key words: National Undergraduate Electronics Design Contest; DC-DC converter; Power and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ntest questions; course; teaching reform

收稿日期: 2018-06-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杨俊秀(1976-), 女, 河南开封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电子技术及射频通信等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赵文来, E-mail: zhwlai@126.com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简称电子设计竞赛或电赛)从1994年试点到2017年已成功举办13届。该竞赛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点考察参赛学生的动手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等。同时,竞赛内容紧密联系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为大学生提供了实践成果的展示平台,也促进了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电子设计竞赛赛题大致包括七类,即电源类、信号源类、高频无线电类、放大器类、仪器仪表类、数据采集与处理类、自动控制类。“电力电子技术”属电源类题目相关的主要课程,该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技术基础课,覆盖了电子技术、控制技术和电力技术,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被列为电子信息类专业难学难教的课程之一。近年来,很多高校对该课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比如,巫付专等^[1]提出从电力电子教学内容及仿真和实验平台入手进行课程改革;房美丽^[2]提出从教学内容分类,课堂案例教学及课程考核方式改变方面进行改革;赵涛等^[3]在课程中引入PSpice仿真软件,建立电路模型并进行仿真,结合理论教学使学生增加感性认识;牛天林等^[4]引入Matlab/Simulink仿真系统,基于软件建立仿真流程,结合案例,将仿真技术应用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动态比较、疑难解答、系统认知、实验拓展等;周凯等^[5]结合仿真软件Saber,探讨了仿真技术在功率器件驱动控制教学中的应用,Saber软件的引入使课程原理与概念形象化,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相关高校的教学改革多从课堂理论教学及实验教学展开,且多从仿真软件入手,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课程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及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在课程教学和指导竞赛的过程中,将电子设计竞赛的电源类赛题引入“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能够积极推动课程的教学改革^[6-7],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改善教学效果。近年来,笔者既参与“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又参与电赛赛指导,因此,本文结合电赛,根据“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将适合的电子设计竞赛赛题作为案例应用于课堂教学,使学生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旨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电赛赛题分析

(一)电赛赛题类型及所占比例

电子设计竞赛强调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相关理论知识,能够熟练地进行实验操作,并掌握综合运用课程知识的技能。

电赛涉及的主要课程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通信电子线路、单片机、电子测量、电力电子技术等^[8-9]。截至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共举办了13届,赛题大致分为7类:其中,电源类共12题,约占16.5%;信号源类共4题,约占5.5%;高频无线电类共13题,约占17.8%;放大器类共6题,约占8.2%;仪器仪表类共18题,约占24.7%;数据采集与处理类共3题,约占4.0%;自动控制类共17题,约占23.3%。其中,电源类赛题主要有:1994年(第一届)A题简易数控直流电源、1997年(第三届)A题直流稳定电源、2005年(第七届)F题数控恒流源、2017年(第十三届)A题微电网模拟系统,等等。

(二)电源类赛题内容与趋势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中,与“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相关的题目特点表现为^[10]:“大”电流、安全电压、常以电源形式出现、技术指标涉及负载能力、负载、电压调整率、基本变换电路、效率、功率因数问题、波形、谐波测量等。涉及到的有关“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主要知识点有:线性直流稳压电源,功率器件,整流滤波,PWM控制,电流、电压采样及真有效值检测,过压、过流保护,功率因数校正,高频变压器相关技术,隔离技术,微控制器最小系统及外围接口等。相关赛题类型有^[10]:基本电力电子电路、各类电源(开关电源、UPS等)、新能源发电(太阳能、风能发电等)、多重化、多电平化(串、并联等)、谐振软开关、其它应用(无线电能传输、电子负载)等。如1994年考题“简易数控直流电源”及1997年考题“直流稳定电源”,涉及到电源的基本常用指标包括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等。2005年考题“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涉及到负载能力、对称、波形、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保护、检测显示、变频技术及电源效率,紧跟变频家电的提出及应用。2009年考题“光伏并网发电模拟装置”涉及到负载能力、效率、波形、保护、检测、最大功率点、相位及频率跟踪,应用于光伏产业的迅速膨胀;“电能收集充电器”涉及到旧电池的有效利用及充电技术,与电池的回收与再利用密切相关。2011年考题“开关电源模块并联供电系统”涉及到并联均流技术,表现为负载能力、效率、波形、功率分配、保护、检测,与电源负载均衡及控制策略相关。2013年考题“单相AC-DC变换电路”涉及到负载能力、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保护、检测显示、高功率因数、功率因数测量及校正,与提高电源效率相关。2015年考题“双向DC-DC变换器”涉及到电流控制精度、效率、充放电(双向)、保

护、检测、重量,与电源双象限技术,电能的存储与利用相关。2017年考题“微电网模拟系统”涉及电压源并联技术及变频,与光伏电源变换及并网相关;“单相用电器分析监测装置”,涉及电压、电流采样及负载判断等,与人工智能、负载识别相关^[9-11]。

电源类相关赛题的总趋势是技术指标要求越来越高,考查的知识点越来越细,如负载能力、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效率、功率因数、保护、波形、检测显示等,电源结构越来越复杂,且常常结合电源发展的新技术或应用,预期考查方向表现为高频化、高压、低压降器件、大功率、低功耗、小体积等方面^[10]。这要求参赛学生布局不仅具备扎实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基础知识,而且能对其熟练地综合运用。以笔者所在学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例,专业前期课程教学计划中只有“电力电子技术”一章详细介绍电源相关技术,但不够全面,且理论知识落后于实际要求。

二、“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及教学存在的问题

“电力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程,以模拟电路、单片机、控制技术等先修课程为基础,结合了电子技术、控制技术和电力技术^[7]。课程内容包括各种电力电子器件、整流电路、逆变电路、直流-直流变换、交流-交流变频、PWM控制技术及软开关等,繁杂多样,抽象、实践性和工程性都很强^[11-12],实践操作少的学生大多未掌握有效的电子技术分析方法,对波形分析、相位关系接触甚少,外加电磁知识欠缺,对磁路的概念理解和掌握不到位。结合国内其他院校“电力电子技术”相关课程^[13-16],并以笔者所在学校的电子专业为例,发现该课程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学生对先修课程掌握不够。“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以电子技术、电力技术及控制技术等先修课程为基础,为适应专业教学计划调整,该专业的先修课程学时被压缩,导致学生先修课程基础不扎实,动手能力少,不易从模拟电路的低频率、线性分析方法转变出来;因为学时有限,课程中不涉及半导体材料、电磁基础、磁路定律相关知识,底层相关理论原理的缺失影响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例如,2014年电竞赛题F题——无线电能传输装置^[17],要求参赛学生设计并制作一个无线电能传输装置,其结构如图1所示。传统的有线电力输送以电缆线为传输媒介,在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传输损耗,同时线路老化、尖端放电等因素易导致电火花,降低设备供

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电缆线供电方式带来了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大量的电器供电势必会导致多种电源线的交叉,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该题需要功率驱动、谐振、磁路等的相关知识,而“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内容基本不涉及。先修课程中相关内容因学时有限被简化,甚至被任课教师在教学中予以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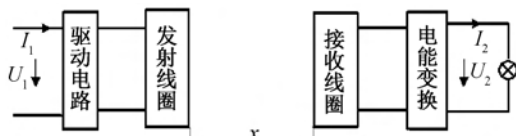


图1 无线电能传输装置结构图^[17]

第二,器件种类多,内容抽象。课程主要内容是电力电子器件及各种变流技术应用电路的分析,要求学生将器件、电路及实际应用三者结合,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电路器件涉及到电阻、电容、电感、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场效应三极管、功率管等,类型不多,但可构造种类繁多的电路结构,调整电路器件参数时经常“牵一发而动全身”。电路工作频率的选择、功率器件的选取、效率及功率要求、电感选择等,需要学生对器件使用有一定的经验,且对磁性材料及磁路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例如,在制作满足一定指标的稳压电源模块时,学生经常出现空载指标良好,带载输出电压下降(甚至大大下降),纹波增加等情况。

第三,教学思路与手段欠佳。国内多数高校对于“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一般按照“先器件、后电路”的模式讲授,教学基本围绕单元电路进行,缺乏整体电路或系统的概念,理论有余,实践不足。教师虽然借助多媒体课件教学,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感性认识仍然不足,波形多样尤其增加了理论的抽象性,实际调试时由于电路各模块排版布局、各分布参数的影响、理论计算时的各种假设及忽略,各测试点通常不会是理想波形,学生容易陷入困境。

第四,对实践环节不够重视。教学改革前,笔者所在学校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计划共48学时,其中8个实验学时,每个基本实验内容需2个学时,学生如果理论知识预习不到位,很难建立系统思维。专业教学计划修订后,由于实验设备老化及投入经费不足等原因,目前无实验学时安排,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无法应用到实践中,动手能力得不到锻炼。参与了电子设计的学生有机会动手验证测试一些课程内容,而未参与电子设计的学生收获的只限于零散的理论。

第五,考核存在问题。课程教学计划修订前,成绩评定采用期末笔试、平日成绩、实验成绩按一定权重相加的方法,有的学生考前突击、多做模拟题取得高分,但试题具有出题者的主观选择性,且通常不能真实反映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的水平,包括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课程教学计划修订后,课程考核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作为选修课程,该课程不参加集中笔试,任课教师主要依据学生课程出勤情况、作业完成质量等从理论学习情况方面评定学生成绩,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水平评判未必客观全面。

三、课程教学改革措施及实践效果

现行的课程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及提高能力,将“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与电子设计竞赛结合,将电赛题目带进课堂,以电子设计赛题项目为引导,采取案例式授课。针对课程中要讲授的知识点,选择相关的电赛赛题,根据赛题技术指标的要求分析系统的顶层原理框,结合可行性引导学生构思原理框图中各模块的实现方法或方案,从而引导课程相关知识点。案例式授课有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增加学生对课程及知识点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热情,改善教学效果^[18]。同时,积极动员选课学生参与电子设计竞赛,长期坚持,参赛生源质量提高,教师积累好的设计作品反馈于课堂教学,进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以电子竞赛为驱动,以实验项目为基础“按需学习”,引导学生参与、思考,养成自主学习、专研问题的习惯。教学改革思路如图2所示。

根据图2,任课老师结合指导电子设计竞赛的情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电赛赛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知识点进行讲解,分析系统预期测试波形或输出输入关系,通过实验或作品测试观察现象,并持续改进形成更新的作品,教师通过理论与实际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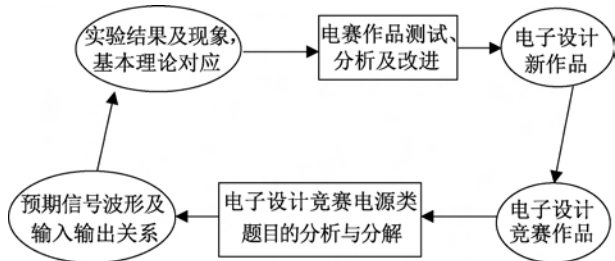


图2 结合电赛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项目式教学改革思路

用的结合,跟进时代对相关技术的需求及应用前景,同时将好的作品带进课堂,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并增加其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 新增“现代电源技术”课程

“电力电子技术”作为选修课,以理论教学为主,缺少相应的实践环节。调整专业教学计划后,新增32学时的“现代电源技术”课程,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各16学时,由参与指导电赛的老师亲自授课。其中,电源技术概述4学时,包括电源技术的现状、发展及研究热点,要求学生掌握常用拓扑的分析方法;电源中的电力电子器件与基础电路4学时,包括电源关键器件特性类型及应用;电源新技术4学时,包括各种电源先进技术;电子变压器及电磁兼容理论4学时,要求学生掌握变压器设计与计算方法,了解电磁兼容理论及设计原则。该课程扩展了“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相关知识,增加了电源的核心知识,拓宽了电源发展的新技术及实际应用。

2. 基于电赛题目引入项目式授课

自电赛开赛以来,历年赛题中的电源类题目有12题,约占总题数的16.5%,赛题中的很多功率类题目来源于课程知识,又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给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如讲解DC-DC变换这一知识点时,任课教师可从2015年赛题中的双向DC-DC变换器为例引入,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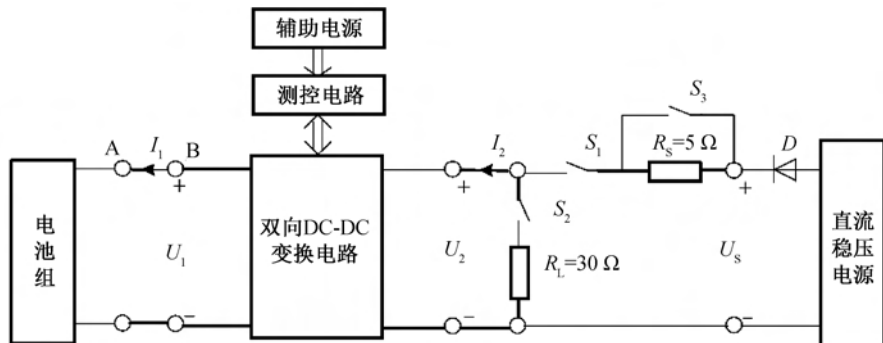


图3 双向DC-DC变换器系统结构图

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按如下过程分析此赛题:首先,电池充电是降压过程,反向放电是升压过程,DC-DC 直流变换中 Buck 变换和 Boost 变换与之对应,结合此案例,可讲解 DC-DC 基本变换中 Buck 降压斩波电路和 Boost 升压斩波电路。其次,装置要实现双向传输功能,与双向工作模式知识点相关。第三,功率器件需要 PWM 信号来驱动,可选择硬件电路产生 PWM 信号控制,或微控制器控制,此处涉及 PWM 控制原理及实现技术知识点。第四,降压过程要实现恒流,升压过程要实现恒压,是系统工作的两个主要过程,装置闭环和引入相关算法对提高控制精度和装置稳定性具有一定优势,此处涉及闭环控制技术及反馈方式知识点。第五,装置需要闭环反馈,Buck 变换时充电电流较大,采样电流最好进行隔离闭环,与电流电压采样及反馈控制方式有关。最后,装置对效率有要求,与变换模式及电流续流方式有关,可优化变换器工作方式和电路结构,降低损耗,提升应用价值^[11]。双向 DC-DC 变换器在锂离子电池充放电应用电源结构设计时基于两点:一是保证充电时电流的恒定,二是供电时保持电压输出的稳定。因此,充电恒流闭环和放电恒压闭环是两个必须的环路,同时电池负载充电时,充电电压不能过高,而且应注意电池是否过充,

避免造成安全事故,故系统需存在一定的过压和过充保护功能。

学生可以通过此赛题学习 Buck 降压斩波、Boost 升压斩波、双向 DC-DC 工作模式、恒流、恒压、电流、电压采样检测等内容。由于 DC-DC 部分知识点及性能指标相关,故可以该题为例,展开分析恒流、恒压、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再根据指标要求选择合适的电路参数,引导学生一步步建立系统的概念。下面将对变换器系统的电路结构进行展开。

电流双象限电路可实现输出电流随控制电压变化,但输出电压的极性始终为正。电流双象限原理电路如图 4 所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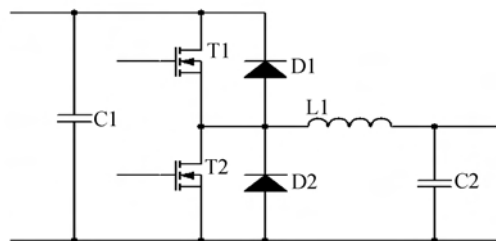


图 4 电流双象限电路图

双象限电路可以实现信号的双向传输,展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点包括各测试点信号理想波形。结合相应的驱动,以 IR2110 为例,驱动部分结构如图 5 所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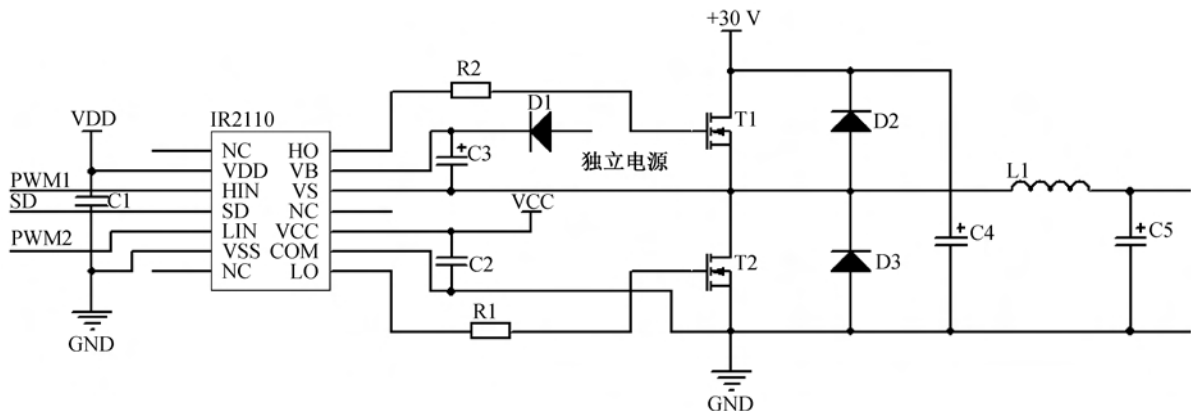


图 5 电流双象限电路驱动结构图

由于开关管不能被微处理器输出的 PWM 信号直接驱动,故单片机输出的信号需要驱动电路控制功率管的开或关。电流采样可选择专用采样芯片 INA282。

采样电阻选择受温度影响较小的康铜丝,康铜丝阻值为 20 mΩ。电压采样直接通过简单的电阻分压即可。系统电路如图 6 所示。

可见,基于 2015 年电赛的电源类赛题可讲解关于 DC-DC 的大部分知识点,且能够举一反三,抛砖

引玉,引导学生学习不同问题的分析方法和处理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欲望^[6]。

3. 引入电赛作品实物

电力电子技术主要是器件、电路、应用的组合,设计出来的电路需要调试与测试,才能判定是否满足系统各项指标的要求。对于 2015 年电源类电赛题目,学生很容易混淆恒压、恒流、浮地、实地、模拟地、数字地等方面,要加强系统、接地及电磁干扰等电力电子设计中常涉及到的应用。选择竞赛作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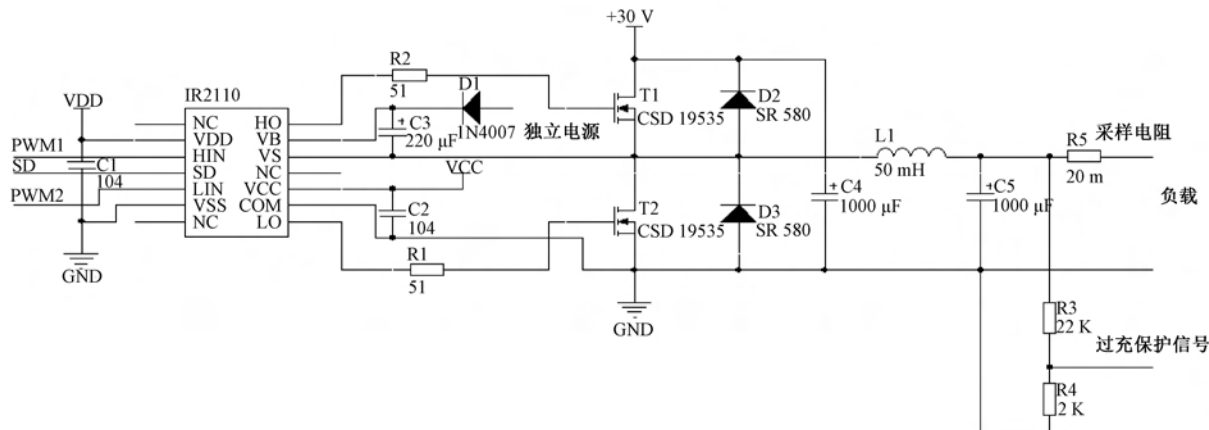


图6 系统电路图

课堂上有针对性地演示,图7为图6电路原理图的实物结果,可以借此帮助学生逐渐建立对器件、电路及应用的认知^[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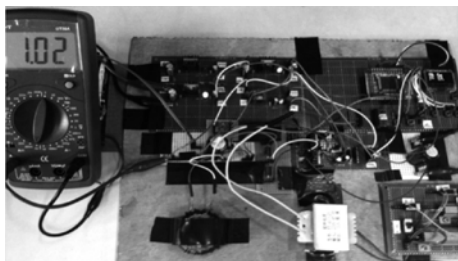


图7 电池恒流充电图

同时,通过效率测试分析损耗产生的原因,对应于电路结构中的位置及如何改进。其中,开关损耗是影响变换器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开关过程中器件电压和电流错位的软开关技术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4. 实验室教学

基于电子设计竞赛试题及作品进行项目式授课,有利于学生处理理论知识学习与实际应用的关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积极投入电子设计竞赛,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理论授课使用实验室是很好的教学场地补充,让学生动手接触相关电路及熟悉相关仪器设备,通过实际现象及感性的认知帮助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和理解^[13]。

5. 成绩评定

教学改革还包括由面向结果的成绩评定改为面向过程的成绩评定。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在每次学生动手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反应及测试数据对其能力评估,结合学生课堂出勤及作业情况,加权得到第一部分基础成绩,第二部分成绩主要通过根据学生完成具有一些附加项目的情况而定,附加项

目涉及电赛题目、自行设计题或小论文等。

6. 教改成效

结合电子设计竞赛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简化了学生对单元电路的学习,学生更愿意参与到竞赛当中,而且越来越多的参赛作品与项目可用于课堂教学,形成了良性循环。笔者所在团队2015—2017年开设的“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主要面向本校2013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结合电子设计竞赛进行授课,结果显示,2015年专业人数99人,课程选课人数30人;2016年专业人数106人,课程选课人数48人;2017年专业人数98人,课程选课人数56人;选课人数和比例逐年上升,而且学生评教分数保持优秀。此外,该教学改革实施后,增加了学生竞赛参赛队伍和电源类题目选题数量。笔者所在学院2011年有13支学生队伍参赛,2016年24支队伍参赛,其中选择电源类题目有12支队伍,2017年25支队伍参赛,其中选择电源类题目有13队。电源类参赛队伍的获奖情况也有所改善,2016年获得浙江省二等奖2项、省三等奖4项,获奖队伍占电源类参赛队伍的比例为75%;2017年获得省二等奖3项、省三等奖8项,获奖比例达85%。

四、结 语

本文将“电力电子技术”课程与电子设计竞赛结合,增强课程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联系,课堂理论知识在实际项目应用中得到验证,强化了学生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参赛生源质量,改善了教学成果。不足之处是电赛赛题与课程理论知识点的结合还需要更细致,两者对应的知识模块和具体内容关系还需进一步梳理。同时,应尽可能进行实验室现场授课,提高实践性环节在课程教学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 [1] 巫付专,王耕,彭圣.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8(1):32-34.
- [2] 房美丽.浅谈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几点体会[J].课程教育研究,2017(20):286.
- [3] 赵涛,张丽华,徐开芸,等.PSpice在电力电子技术教学改革实践中的应用[J].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2009,21(6):123-126.
- [4] 牛天林,樊波,张强,等.Matlab/Simulink仿真在电力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34(2):84-87.
- [5] 周凯,那日沙,王旭东.Saber在电力电子技术仿真中的应用[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32(3):126-128.
- [6] 王峰.关于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对电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学法教法研究,2016(14):47-48.
- [7] 黄智伟.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技能训练[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387.
- [8] 马莉,符晓玲.电力电子技术在智能电网中的应用研究[J].工程技术研究,2017(12):36.
- [9] 刘进军.电能系统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电力电子技术的挑战[J].南方电网技术,2016,10(3):78-80.
- [10] 潘再平.电力电子类题目分析与应对[R/OL].(2017-08-08)[2018-06-03].<https://wenku.baidu.com/view/6a73cb15773231126edb6f1aff00bed5b9f3738b.html>.
- [11] 王兆安,刘进军.电力电子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8.
- [12] 黄智伟.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制作实训[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387.
- [13] 冯元,海鹏博,吴宏岐.电力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改革模式与探索[J].高教学刊,2018(9):121-123.
- [14] 苏玉香,沈晓群,叶继英.多种教学模式下电力电子技术教学改革与探讨[J].山东工业技术,2017(20):253.
- [15] 张红娟,路秀芬,孟海涛.“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工程实践的教学改革[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6,38(3):127-132.
- [16] 侯志坚.高校《电力电子技术》课程实践教学研究[J].高教学刊,2018(3):101-103.
- [17]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官网.2014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题-F题 电能无线传输装置[R/OL].(2015-01-03)[2018-06-03].<http://www.scnuedc.uestc.edu.cn/>.
- [18] 李晓英,李恒杰,魏祥林,等.问题引领式教学设计在“电力电子技术”微课中的应用浅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8(8):197-198.

(责任编辑:陈丽琼)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第十届编委会

主任 陈文兴 常务副主任 陈文华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佐华 王 健 李加林 李良玉 杨 杨 何庆机
邹奉元 汪亚明 张瑞林 陈本永 陈改玲 陈爱喜
武传宇 季晓芬 周 超 郑今欢 郑旭明 胡旭东
胡觉亮 胡剑锋 姚菊明 唐志荣 盛 清 渠长根
梁宗锁 程 华 傅雅琴 熊 杰

主 编 陈文兴
执行主编 郑今欢
副 主 编 唐志荣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ZHEJIANG LIGONG DAXUE XUEBAO

月刊 (Monthly)

逢双月 社会科学版

第42卷 第4期 2019年8月

Aug. 2019, Vol.42 No.4

(1979年9月创刊)

(Started Publication in Sept. 1979)

主管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

出 版: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

社 长: 郑今欢

编 辑: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

电话: (0571)86843739 (兼传真)86843152

电子信箱: Journal@zstu.edu.cn

网址: <http://xuebao.zstu.edu.cn/>

地址: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浙江理工大学(310018)

主 编: 陈文兴

印 刷: 山西同方知网印刷有限公司

订购发行: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19年8月10日

Authority in Charg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Sponsor: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Periodicals Agency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dited by: J.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ditorial Dept.

Address: Xiasha Higher Education Zone, Hangzhou 310018, China

Tel: (0571) 86843739 86843152

E-mail: Journal@zstu.edu.cn

Website: <http://xuebao.zstu.edu.cn/>

Editor in Chief: Chen Wenxing

Printed by: Shanxi Tongfang Knowledge Network Printing Co., Ltd.

Issue Date: Aug. 10, 2019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3-3851
CN 33-1338/TS

定价: 20.00元

ISSN 1673-3851



9 771673 385190

08>

